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Textbook Series for 21st Century

毛泽东思想概论

(第二版)

主编 田克勤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毛泽东思想概论

（第二版）

王康 傅学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
Textbook Series for 21st Century

毛泽东思想概论

(第二版)

主编 田克勤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内容简介

本书是教育部“高等师范教育面向 21 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毛泽东思想概论》的修订版。本次修订,坚持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为依据,在研究毛泽东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著作和党的文献的基础上,充分反映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新成果,特别是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毛泽东诞辰 110 周年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的精神,并注意考虑高师本科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学特点及《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两门课程分别设置的实际。修订版新增写了“导论”,集中阐述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意义;重新撰写了第五章“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部分章节或目做了较大调整,并对全书做了认真的修改,使之更充分地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

本书既可为高等师范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学生使用,也可供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及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相关学科专业的研究生和其他社会读者学习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思想概论/田克勤主编.—2 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04-025679-6

I. 毛… II. 田… III. 毛泽东思想-概论-师范大学-教材 IV. A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5196 号

策划编辑 周亚权 责任编辑 陈 晨 封面设计 杨立新
版式设计 王艳红 责任校对 殷 然 责任印制 尤 静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免费咨询	800-810-0598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总 机	010-58581000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raco.com
经 销	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http://www.landraco.com.cn
印 刷	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畅想教育	http://www.widedu.com
		版 次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2 版
开 本	787×960 1/16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7.5	定 价	21.80 元
字 数	320 000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25679-00

目 录

导论	(1)
一、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1)
二、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意义	(7)
三、学习《毛泽东思想概论》的方法	(11)
第一章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和历史地位	(12)
第一节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	(12)
一、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提出	(12)
二、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内涵	(15)
第二节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17)
一、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主要内容	(17)
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特征	(21)
三、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23)
第三节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25)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25)
二、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旗帜	(27)
三、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28)
第二章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30)
第一节 毛泽东思想产生的条件	(30)
一、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	(30)
二、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	(32)
三、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实践基础	(33)
四、毛泽东思想产生的文化底蕴	(34)
第二节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35)
一、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35)
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形成	(36)
三、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的曲折	(39)
第三节 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40)

一、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条件	(40)
二、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标志	(44)
三、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在全党的确立	(47)
第四节 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发展	(48)
一、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48)
二、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51)
三、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思想的曲折发展	(53)
四、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的恢复及其新发展	(56)
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58)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58)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和对象	(58)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和动力	(60)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62)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	(64)
一、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	(64)
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	(66)
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	(68)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道路	(69)
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	(69)
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思想	(72)
第四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80)
一、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80)
二、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	(81)
三、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82)
第四章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84)
第一节 过渡时期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84)
一、过渡时期的社会性质和主要任务	(84)
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86)
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和实质	(90)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93)
一、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	(93)
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	(96)
三、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经验	(97)

第三节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99)
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初步确立	(99)
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的重大意义	(102)
第五章 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103)
第一节 人民民主专政理论	(103)
一、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103)
二、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主要内容	(107)
三、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114)
第二节 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	(117)
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117)
二、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	(120)
三、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121)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	(123)
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和指导方针	(123)
二、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各种关系	(128)
三、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有益探索	(131)
第四节 国际战略和外交方针	(135)
一、国际形势判断与国际战略思想	(135)
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139)
第六章 人民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	(142)
第一节 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	(142)
一、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	(142)
二、人民军队建设的原则	(144)
第二节 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	(148)
一、无产阶级的战争观	(148)
二、人民战争的思想	(151)
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	(155)
第三节 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思想	(161)
一、建设一支正规化的、现代化的、强大的人民军队	(161)
二、大力发展国防工业和国防技术	(163)
三、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	(164)

第七章 政策和策略理论	(166)
第一节 政策和策略重要性的思想	(166)
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166)
二、制定政策和策略的主要依据	(168)
三、贯彻执行政策和策略的正确方法	(170)
第二节 政策和策略理论的主要内容	(171)
一、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	(171)
二、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	(177)
第八章 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理论	(184)
第一节 思想政治工作理论	(184)
一、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	(184)
二、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	(186)
三、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	(188)
第二节 文化工作理论	(189)
一、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189)
二、文化工作的基本方针	(190)
三、科技工作的方针	(192)
四、教育工作的原则和方针	(196)
第三节 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政策	(198)
一、知识分子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198)
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一部分	(200)
三、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201)
四、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202)
第九章 党的建设理论	(205)
第一节 党的思想建设和政治建设	(205)
一、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特点	(205)
二、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	(207)
三、党的建设要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	(209)
第二节 党的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	(211)
一、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	(211)
二、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	(215)
三、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218)
第三节 党的团结和党内思想斗争	(221)

一、党的团结是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重要保证·····	(221)
二、党内思想斗争的正确方针·····	(222)
三、整风是解决党内矛盾的基本经验·····	(225)
第四节 执政党建设的思想·····	(227)
一、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	(227)
二、加强执政党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229)
第十章 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234)
第一节 实事求是·····	(234)
一、实事求是思想的形成·····	(234)
二、实事求是的科学涵义及其基本内容·····	(236)
三、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240)
四、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坚持和发展·····	(243)
第二节 群众路线·····	(247)
一、群众路线思想的形成·····	(247)
二、群众路线的科学涵义及其基本内容·····	(249)
三、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根本作风和基本领导方法·····	(253)
四、群众路线的坚持和发展·····	(256)
第三节 独立自主·····	(260)
一、独立自主思想的形成·····	(260)
二、独立自主的科学涵义及其基本内容·····	(262)
三、独立自主是革命和建设必须坚持的原则·····	(264)
四、独立自主原则的坚持和发展·····	(267)
再版后记·····	(270)
2001年版后记·····	(271)

导 论

毛泽东思想概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等内容的概要论述。学习毛泽东思想概论,可以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了解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规律,了解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艰辛历程。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不仅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而且,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具有普遍的指导作用。认真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可以提高学生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的能力,并有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一、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在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时代就呼唤着这样伟大的人物。正是适应时代的需要,一批中华民族的卓越人物如:洪秀全、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等相继走上历史舞台。在这些人物中,站得最高、看得最远、最为准确地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从而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为新中国的创立、建设与巩固作了最为突出贡献的,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毛泽东表现出了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和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壮丽历史画卷中,在祖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锦绣大地上,都留下了他作为一代伟人的风采。他不仅赢得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敬仰,而且也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的敬佩。

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邓小平曾经这样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①他又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②江泽民也深刻指出:“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他的伟大品格具有动人的感染力,他的科学思想具有非凡的号召力。”^③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10 周年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他早年投身革命,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成长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振兴、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为古老的中国赶上时代发展潮流、阔步走向繁荣昌盛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胡锦涛还指出: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他的战友们缔造了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战的人民军队、一个团结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统一战线。我们党依靠这三大法宝,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顽强奋斗,终于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④。这些评价是非常中肯的,可以说在近代中国历史上除了毛泽东还没有人能够担当起这样的评价。

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

(一) 为建设一个全国性的、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是建立新中国的领导力量。“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充分说明了党对新中国的至关重要性。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48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44~345 页。

③ 《江泽民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46 页。

④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40 页。

中国共产党建立时仅有五十多个党员,大革命开始时也才有四百多人,1927年大革命高潮时达到五万余人,但随后由于大革命的失败而锐减为一万人。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建设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任务相当艰巨。特别是1927年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更增加了困难。一方面党不得不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中吸收党员;另一方面,大量农民、小资产阶级入党又不可避免地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到党内来。毛泽东从井冈山开始,就看到这个问题,到了古田会议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就是提出了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到延安时期,又创造性地用整风形式加强党的建设,克服了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从而提高了党的理论水平,保持了党在思想上的先进性。正是由于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和路线,中国共产党才能在遭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经过长征仅剩3万党员的情况下,经过抗日战争发展到120万党员,从而为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不仅如此,在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培育下,党还逐渐形成了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为主要内容的优良传统作风。“三大作风”从总体上体现了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党自身这样三大根本性问题,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形象,这是当时中国任何一个政党所无法比拟的。

(二) 为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胜利进行人民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毛泽东认为:在中国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是由中国革命中武装斗争是主要的斗争形式、军队是主要的组织形式这一基本特点所决定的。

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共同建立了国民革命军。大革命失败后,党经过无数次武装起义和革命斗争建立了自己的军队。但是,党领导的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党所进行的武装斗争在很长时期内是游击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建立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毛泽东提出了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开展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坚持革命纪律与民主制度统一等为主要内容的人民军队建设理论,解决了人民军队建设这一重大问题。由于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从而使人民军队不仅完全克服了旧式军队的影响,而且真正发挥了执行革命任务的武装集团的作用。毛泽东政治建军的思想十分突出。正如有人所说,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勇敢。红军就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了就被融化。毛泽东所提出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以及优待俘虏等政治工作的原则,使人民军队在对内、对外以及对敌等方面都是完全处于主动的地位,这也是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

真正原因。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战术,是中国革命战争在长期处于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情况下,不断取得胜利并最终战胜敌人的思想武器。毛泽东不仅提出了人民战争要以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基础、要建立野战军地方部队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实行全体人民总动员等重要的战争理论,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诸如: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的地位、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战略战术原则和作战方法。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令敌人也为之叹服。毛泽东因此成为伟大的军事家。

(三) 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实际上面临两个问题:一是要不要坚持革命?除少数动摇分子以外,大多数共产党人都是要求坚持革命的;二是怎样革命?在这一问题上,党经历了从以“城市为中心”的苏联革命模式到“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艰辛转变。在这条道路的开辟中,毛泽东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实践上,毛泽东提出要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建立根据地,并亲自创建了井冈山根据地,赣南闽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理论上,毛泽东逐步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解决了中国革命必须和能够走这条路以及走这条道路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一理论摆脱了当时教条主义的束缚,成为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志。这一创造性的理论成果曾被讥为“狭隘经验论”,而实践证明,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把这一理论运用于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战争中。在华北、华中、华南等广大地区,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了十几块抗日根据地,控制了广大乡村,使其成为坚持民族抗战的战略基地,并赢得了广大人民的信任,使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人们刮目相看。

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采取“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在广大东北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并巩固在华北、华东、西北等地的根据地,为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基础。中国革命从局部胜利到全国胜利的伟大历程,充分证明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正确性。

(四) 深刻揭示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为新中国的创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怎样认识和解决革命的动力、对象、性质、前途等基本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从建立时就面临的艰巨任务。“一次革命论”或“二次革命论”的实质都是没有认清中国的基本国情及革命的历史特点,没有认清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抗日战争时期,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蒋介石提出“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主张,推行“防共、溶共、限共”的

方针,企图从思想上、政治上剥夺共产党、共产主义存在的理由。王明从共产国际回国后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苏联领导人也反对中共独立自主的抗战路线。毛泽东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叫嚣,澄清了党内和革命队伍内的糊涂认识,正确回答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并通过在陕甘宁边区进行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实际上把一个新中国的蓝图摆在人民的面前,使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前夕国共两党关于“两个中国之命运”的论战中处于主动的地位。

坚持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实质是坚持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其关键是要处理好同农民和资产阶级关系的问题。毛泽东通过开展土地革命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通过与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保持党的独立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解决了同资产阶级关系的问题。

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初,经过三大战役,中国革命胜利已成定局,毛泽东开始着手建立新中国。这时毛泽东考虑最多的是如何避免重蹈李自成的覆辙。所以,他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意味深长地说:我们这是进京赶考,希望考个好成绩,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其实,早在七大前后,毛泽东已经考虑了如何准备革命胜利、避免革命失败的问题。他当时指示重印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并在回答黄炎培关于共产党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时,提出靠民主解决问题的思路。建国前夕,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制定革命胜利后党的纲领。随后又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召开新政协会议,发表五评白皮书,等等,都是为建立新中国做准备。历史事实表明,毛泽东不愧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奠基人。

(五) 开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从此永远结束了;标志着我们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中国人民从此在地球东方真正站起来了。随后,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带领下,中国共产党依靠全国人民高涨的革命积极性和巨大的创造力量,迅速医治了长期战争的创伤,迅速恢复、发展了国民经济和教育、科学、文化等事业。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又适时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庄严地宣布:我们早就选择了社会主义,现在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走这条道路。在实践中,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顺利地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消灭了剥削制度,铲除了造成社会不平等、不公正的主要社会历史根源,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

的社会变革,为我国今后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①。与此同时,我国工农业生产高速健康地发展,经济效益良好;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显著改善和提高;科学技术、文化教育长足进步;人民当家作主,各项民主权利得到保障;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党群关系密切,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声誉;整个社会安定团结,全国上下同心同德,新中国完全是以一种新的生活、新的制度、新的形象、新的力量出现在世界的东方。邓小平后来曾经对这段历史作过重要评述,他说:“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②

(六) 为探索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带领人民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并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我们不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积累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这一时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遭受过严重挫折,但是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3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从1965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立起来。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大规模地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全国农业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6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为前7年的4.9倍。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科学技术工作也有比较突出的成果。

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和探索中积累的正确的东西,都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取得的。在党中央领导人中,毛泽东无疑起了最重要的作用。许多正确的思想和决策都是毛泽东提出的,得到中央领导集体的支持;其他领导同志提出的正确意见,也是在得到毛泽东支持的情况下作出决定、付诸实施的。而对这十年中的错误,毛泽东无疑也要担负主要的责任。这不仅因为他是中央主席,而且因为一些重大的错误思想和决策是由他提出或由他支持的,有时甚至是由于他的个人专断,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压制了比较正确的意见的结果。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9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页。

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①这是一个恰当而正确的评价。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以决议的形式，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所作出的最有权威性的科学评价。俗话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我国今天已经取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辉煌成就，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千秋大业，都和毛泽东的名字，和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毛泽东最伟大的历史功绩！

二、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的科学指导思想，主要是回答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要不要领导和怎样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把这个革命引向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问题。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有许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写的，但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基性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其基本精神不会因为时代主题的转换和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

历史条件的变化而过时,而是具有恒久的魅力。新世纪新阶段,学习毛泽东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学习毛泽东思想,有助于准确地理解党和国家的历史。

始于19世纪中叶的中国近代史,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进行反抗斗争、寻求国家出路的历史。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不断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提出了各种形式的救国方案,并为实现这些方案进行了多次不屈不挠的斗争。然而,中国人的多次奋斗最后总是归于失败,各种救国方案无一不以破产而告终。辛亥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结果也没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没有完成用资产阶级共和国代替封建专制制度的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因而也就未能成为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变革。辛亥革命的失败,给了中国先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使人们逐渐觉悟到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不可能的,必须另外探索新的道路来求得国家的独立富强和人民的自由幸福。

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进而,又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一切都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前提和基础。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我们国家的历史。学习毛泽东思想,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党和国家过去几十年奋斗的历史,理解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有助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不学习毛泽东思想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不能正确地认识中国共产党,而否定毛泽东思想,则必然会涣散全党的团结,导致思想混乱,政治不稳定。所以邓小平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①

第二,学习毛泽东思想,有助于科学地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质。

毛泽东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学习毛泽东思想,不仅需要了解那些曾经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过重大指导意义的思想理论观点,更要努力把握其基本精神实质,把握其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毛泽东思想中的有些内容,可以说已经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比如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如何进行革命战争,如何建立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页。

根据地,怎样开展土地革命等等,以及围绕着这些问题形成的一些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已失去其具体的指导意义。但是,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所体现的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和思路,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正如邓小平所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①

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要思想理论观点,比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的思想;关于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和提高生产力的思想;关于我们的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发展生产的思想;关于我们的基本方针就是把国内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关于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关于中国必须建立自己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保证经济安全的思想;关于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的思想;关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指导来组织国民经济建设的思想;关于中国的建设必须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思想;关于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努力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思想;关于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思想;关于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关于保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先进性和永不变质的思想等,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思想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永远也不会过时。这些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集中体现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其中,实事求是是最根本的观点。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时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呢?这种根本观点有没有过时,会不会过时呢?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那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很明显,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②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也强调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③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8页。

③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第三,学习毛泽东思想,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在毛泽东建立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探索适合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础上创立并不断向前推进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内在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党的十七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脉相承的。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相结合;从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道路;从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夺取政权到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到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历史任务,具有不同的相对独立的内容体系,但是都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贯穿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基本精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构成了不断创新的完整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

在当代中国,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集中表现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伟大旗帜,这是全面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需要,是我们继续前进的需要。因此,准确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对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四,学习毛泽东思想,有助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精神是思想意识、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品格风范和文化传统的总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既珍惜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又紧跟时代步伐,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别具特色的精神品格。其内容极其丰富深刻,包括了立党为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俭建国,以及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等等,表现出了共产党人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顽强不屈的斗争品质。它们是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成功的保证,也是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振兴中华的强大精神支柱,具有很高的价值。毛泽东的革命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他的伟大品格具有动人的感染力,他的科学思想具有非凡的号召力。他的思想和精神永远鼓舞着中国共产党和各族人民,继续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前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进的道路不可能没有困难和风险,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挖掘毛泽东思想中蕴

涵的精神财富,从中吸取智慧和力量。

三、学习《毛泽东思想概论》的方法

学习理论,方法至关重要。毛泽东曾指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应当确立以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理论联系实际,废除静止、孤立地学习和研究的方法。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不能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这些观点,为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提供了基本的方法。具体地说,学习《毛泽东思想概论》的方法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把学习《毛泽东思想概论》教材和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及党的重要文献结合起来。《毛泽东思想概论》是编者在对毛泽东思想内容进行全面概括和把握的基础上,适应教学需要撰写出来的。通过学习教材,可以比较概括地了解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毛泽东的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结合教材学习原著的必要性,不仅在于可以通过读原著准确把握这些原理本身形成、发展、完善的脉络,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读原著学习毛泽东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深刻领悟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风格,把握其理论的特色,提高学习兴趣,增强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党的重要文献是对历史的真实记录,集中反映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内容。这些重要文献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我们了解历史的一把钥匙,也是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参考。

第二,要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毛泽东思想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事业的基础上,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而进行的理论创造。只有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联系起来,才能准确完整地掌握中国共产党的科学指导思想。

第三,要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际以及个人的思想实际结合起来。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学习毛泽东思想,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着眼于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在历史上与现实中的运用。要紧密切联系中国近现代历史、联系当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努力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自觉性。

第一章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和历史地位

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概念的出现,是近代中国历史演变和思想选择的必然结果。这一概念,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结晶的总称。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奠基性的理论成果,具有极为丰富的理论内容和科学的体系结构。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人民不仅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而且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并初步探索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第一节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

一、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提出

由于种种原因,一种思想理论的形成发展与人们对其的认识往往并不完全同步。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的一个科学概念,其提出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毛泽东在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在反对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的同时,已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后来被作为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内涵的重要思想。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率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科学命题,从而深刻揭示了毛泽东所代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向的科学内

涵。但是,直到这时,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的概念还没有明确提出来。

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概念的提出,经过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理论”、“毛泽东主义”“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到“毛泽东思想”的过程。1941年3月,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最早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强调“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典型的结晶体”。翌年2月,他又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的文章,明确提出“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策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1942年7月,邓拓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1周年的专题文章中,使用了“毛泽东主义”这一概念,并指出全党要“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与此同时,随着整风运动的展开,全党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1943年7月,刘少奇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写了《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指出:“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①

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明确提出并多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他还初步分析了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本质特征,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较为系统的阐述。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提出后,很快被全党所接受。1945年5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第一次在全党范围内正式提出并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②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在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提出和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的过程中,毛泽东

^① 《刘少奇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0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页。

本人一直保持着谦虚谨慎的态度。1943年4月,毛泽东在致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何凯丰的信中指出:“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①当中央政治局决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称为毛泽东思想时,毛泽东明确指出:“如果同志们要把这种思想找一个人的名字作代表,我可以接受。但是,必须说明,这不是我个人的思想,这是中国革命的产物;是中国革命长期斗争的经验教训的结晶,是很多同志的正确思想集合而成。”^②直到建国前夕,毛泽东仍然保持着同样的态度。1949年1月,毛泽东在修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时,又将草案中的“毛泽东思想”,一律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改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反复强调“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③。

毛泽东思想从提出到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条件。

第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熟,是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提出并确立为全党指导思想地位的重要理论前提。毛泽东思想是对近百年来中国革命经验,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的科学总结。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深入发展,毛泽东思想逐步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不断趋于完善。这一时期,毛泽东科学论证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战略,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此外,党的建设理论特别是党的思想建设理论、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统一战线理论、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理论等也逐渐得到科学总结并达到成熟。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也有了更加自觉和清醒的认识。这就形成了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来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并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条件。

第二,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提出并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1943年,在国际反法西斯主义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即将转入战略反攻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90页。

② 彭真:《继续发扬延安精神和延安整风》,载《红旗》1986年第18期。

③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0页。

的重大历史关头,蒋介石抛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以共产国际解散为借口,矛头直指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鼓吹在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从而拉开了思想上反共的序幕。1945年召开的国民党六大则进一步制定了独裁和内战的方针,企图独占中国人民艰苦抗战的胜利果实,扼杀中国革命力量,把战后中国重新引向黑暗的前途。在决定战后中国历史命运的关键时刻,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并把它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就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利于驳斥和回击蒋介石的反共叫嚣,而且有利于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统一。

第三,毛泽东个人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卓越贡献,是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得以提出并被确立为全党指导思想的主观条件。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用毛泽东的名字,而不是用党的其他领导人的名字来概括自己的指导思想,是与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分不开的。正如邓小平指出:“我们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①如果没有毛泽东正确的政治领导和杰出的理论创造,那么“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②。因此,用毛泽东的名字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命名也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

二、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内涵

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独特的本质内涵,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完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也是这样。毛泽东思想“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③。因此,对毛泽东思想科学涵义的理解和掌握,不能仅仅根据毛泽东个人的著述,还要联系到党的领导集体的认识和概括。

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题的学说。”^①在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到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但是就其所论述的内容所体现的思想实质来说,已经指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涵。

1945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作出了比较完整、系统的概括。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他又说:“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②在这里,刘少奇一方面明确地指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特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或者说是二者的“结合”,另一方面,指明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并指出了毛泽东在毛泽东思想创立中的地位。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涵义作出了严谨、科学的概括。该《决议》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③随后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在“关于中国革命”的后面加上了“和建设”,形成了一个更为完整准确的提法。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集中回答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毛泽东个人的贡献与党的领导集体的贡献之间的正确关系。

第一,正确回答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它从属于而不是并列于或外在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所以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当然,也可以单独提毛泽东思想,但是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④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2~953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335页。

③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47、4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3页。

第二,正确回答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关系。毛泽东思想并非抽象思辨的产物。如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理论前提,那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就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实践基础。没有中国特殊的社会和历史状况,没有中国人民英勇的革命斗争,就不可能产生毛泽东思想。同样,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并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国革命和建设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毛泽东思想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关系生动地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实践的认识论路线。

第三,正确回答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毛泽东个人的贡献与党的领导集体的贡献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思想是党和人民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最杰出、最卓越的代表,但同时,党的其他领导人,“比如说,周恩来总理、刘少奇同志、朱德同志等等,还有其他许多人都作了贡献。很多老干部都有创造,有见解”^①。割裂毛泽东的个人贡献与党的其他领导人的贡献之间的联系只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

第四,科学区分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界限。毛泽东晚年错误是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这一理论既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又脱离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国情。它与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具有本质区别,属于不同的概念范畴。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犯有严重的“左”倾错误就怀疑、否定和抵制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必须结合实际加以坚持和发展,并理直气壮地进行宣传”,“应当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这样可以避免许多混乱”^②。毛泽东思想科学涵义的提出就从根本上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区别开来。

第二节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一、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是否把毛泽东思想看做一个科学体系不仅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6页。

解。”^①因为“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②。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认识和概括,比较集中的有三次:第一次是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二次是1945年5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第三次是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四个方面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而这种批判无论是哪一个方面,又都是以毛泽东的论述为指导的,这样就在实际上形成了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基本框架的一种概括。该《决议》指出:在政治上,毛泽东科学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在中国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的问题上、革命战争和根据地的问题上以及进攻和防御的策略指导上为党制定了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在军事上,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服从于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强调我们的军队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军队,它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强调我们的战争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战争,它必须在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利用敌之弱点与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在组织上,毛泽东在党的各个时期规定了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路线,同时也就规定了服务于这一政治路线的联系党内党外群众的组织路线,“其集中的表现,便是一九二九年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③。在思想上,“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尤其再三再四地强调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理,再三再四地反对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危害”^④。当然,由于该《决议》主要是为了批判党内的“左”倾错误,而不是要从正面阐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因而这种对毛泽东思想内容体系的概括,又不可避免地带有特定的局限性。

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所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九个方面的问题,即“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7页。

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等”^①。这一概括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相比,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第一次从正面对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集中阐述;二是克服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照“左”倾错误阐述毛泽东思想内容所造成的局限。这一概括,比较全面系统地回答了党所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因而为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基本框架,进行了更为完整、系统的概括。该《决议》把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主要内容概括为六个方面: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主要是对这一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和前途以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的论述。《决议》指出,毛泽东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现实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其基本点,一是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有两个部分: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和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强调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在面对外敌侵略的特殊条件下可以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同大资产阶级分裂时,要敢于并善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要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或中立。二是认为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中国的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要通过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

第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决议》指出,毛泽东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一重大问题。毛泽东提出的把对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对反动派的专政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重要的政治条件。在社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5页。

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又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正确思想和方针。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以及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等等。

第三,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主要是对人民军队的性质、任务、宗旨和原则的论述,以及游击战争思想和人民战争思想。《决议》指出,毛泽东系统地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开展人民革命战争、实行什么样的战略战术,如何巩固国防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人民军队建设上,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以及一套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在军事战略上,提出了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 and 一系列战略战术。建国以后,他又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等重要思想。

第四,政策和策略理论。毛泽东精辟地论述了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极端重要性,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必须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党的政策和策略,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毛泽东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主要有: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要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击;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强调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现自己对同盟者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率领被领导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二是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给以政治教育,等等。

第五,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理论。毛泽东强调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①。依据这一基本观点,结合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的实际,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诸如: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观点;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以及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的思想等等。

第六,党的建设理论。毛泽东成功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页。

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他特别注重从思想上建党,强调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指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中存在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的错误,他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党内斗争正确方针,创造了全党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建国前夕和建国以后,鉴于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他多次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求全党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此外,《决议》还把贯穿于毛泽东思想主要内容之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明确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指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样,该《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概括就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人们更加重视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精神和基本方法的掌握。

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特征

毛泽东思想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领域各种事物及其相互联系的本质认识所形成的有机结合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在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系列鲜明的特征。

第一,毛泽东思想体系具有时代性特征。

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书斋里构建起来而是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思想体系。它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通过深入认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基本特征,科学分析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系统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创立的充分反映时代特征的科学体系。按照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逻辑,民主主义革命应该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而无产阶级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这也正是“二次革命”论者的历史观根据。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拘泥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教条主义理解。在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崭新时代条件下,通过深入认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近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毛泽东科学分析了由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非资本主义前途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而且因为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丧失和世界资本主义统一体系的瓦解,社会主义的出现,中国革命就不再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①。正是有了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9页。

对时代特征的深刻分析,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了新式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开辟了光辉前景。

第二,毛泽东思想体系具有科学性特征。

科学性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本质属性。从理论上说,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科学性集中表现在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在世界观、历史观、阶级基础和理论任务等方面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完全一致的。同时,毛泽东思想科学地揭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内在矛盾及相互联系,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的科学的思想武器。从实践上说,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科学性已由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所证明。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①。

第三,毛泽东思想体系具有独创性特征。

毛泽东思想不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简单运用和机械照搬,而是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创造性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理论生命的重要源泉。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驳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流派时就曾指出:“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②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也多次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不同于俄国”^③。如果说,在经历了独立和较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英、法、德、俄等西方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都要因地制宜,那么,像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运用马克思主义时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难题,因而更要远离教条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指出,无视事实的教条主义态度和主观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④。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页。

^③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页。

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先后成功地探索出了以农村为中心,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以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独创性特征的体现。

第四,毛泽东思想体系具有开放性特征。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毛泽东思想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开放性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开放,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为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毛泽东思想体系应该也必然在实践的推动下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二是对中国古代文明成果的开放,即“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三是对世界一切文明成果的开放,即“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②。这三个方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开放系统。

三、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一问题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中国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一方面,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获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广泛认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另一方面,毛泽东逐渐滋生家长制、一言堂和个人崇拜等作风,对党的工作认识和指导开始出现“左”的偏差。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林彪等人的推动下,又出现了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倾向。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例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进一步割裂和歪曲毛泽东思想,他们极力鼓吹“天才论”、“顶峰论”,认为毛泽东说过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把毛泽东思想弄得面目全非。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1975年进行整顿时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只把‘老三篇’、‘老五篇’叫做毛泽东思想,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3页。

而把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都抛开呢？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①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左”的倾向，以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为代表的“两个凡是”的观点，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从这种“左”的立场出发，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崇拜。另一种是右的倾向，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散布极其荒谬的言论，“他们或者公然反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口头上拥护马列主义，但是反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②，试图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针对上述两种错误倾向，邓小平严肃地提出了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首先，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的观点。邓小平指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③“大家知道，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它的体系。对毛泽东思想就不这样？也应该如此嘛，否则非犯错误不可。”^④毛泽东思想是由许多具体原理有机组合的科学体系，因而决不能用某一两个观点或原理来代替毛泽东思想，如果这样做只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篡改、割裂和庸俗化。所以，我们必须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⑤。其次，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违反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实质上就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从而走向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从这一点来看，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违背了毛泽东自己创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而它不属于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范畴。最后，必须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要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只往回看不行，还必须向前看，必须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去研究新情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3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

况,解决新问题。“什么是我国今天最重要的新情况,最重要的新问题呢?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①历史已经证明,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这也是我们准确完整理解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第三节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它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完全是中国的。

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先进、科学的社会理论,它为全人类指明了共产主义的发展方向并提供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就这一点而言,马克思主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都是普遍适用的。但是就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观点、原理而言,由于受历史、文化条件的制约却不一定在任何时候都绝对适用于任何民族的发展。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条件下就没有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个具体观点,而是根据新的时代条件和新的革命经验,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了“一国胜利论”和“帝国主义论”等崭新的学说,成功地领导了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并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 and 实践启示我们,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革命道路,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才能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相反,“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②。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理论创新能力的党。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就开始迸发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火花。李大钊在1919年就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①建党以后，党的一些早期领导人也曾曾在不同程度上提出过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但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项系统的理论工程提了出来，并为出色地完成这一艰巨历史课题作出最大贡献的却是毛泽东。

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号召。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②此后，毛泽东率先垂范，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在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过程中，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提出了大量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和观点，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统工程逐步引向完善并加以体系化。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熟就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理论结晶。这恰如刘少奇所分析的：“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这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件。”“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这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是最伟大的功绩之一”^③。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怎样从传统走向现代，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伟大变革，这是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先进分子都在致力于解决的重大课题。依据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作为理论指导，围绕着“古今中西”问题，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前，先进的中国人在各种文化背景下，提出了各种形式的救国方案。为解决器物不如人的问题，搞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为解决制度不如人的问题，搞维新变法，变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搞革命起义，变封建专制为民主共和；为解决观念不如人的问题，搞再造中国文化的“新文化运动”。所有这些努力，以及后来提出的“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主张，均无法改变中国向半殖民地社会沉沦的命运。正在这时，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随之发

① 《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5~336、336页。

生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对这一段历史有过十分精彩的描述和总结,他说明了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下的中国是不能靠照搬西方的思想武器解决中国出路的道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迅速被中国人所接受并在中国发挥了重大作用的道理。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学习外来文化变成为学习欧美资本主义和苏俄社会主义两种模式,两相比较,“俄式革命”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十月革命使马克思主义由理论变成实践,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理想的“大同”社会实现的希望,于是他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了与中国国情相近的俄国。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也曾由于过分地、不加分析地依赖苏联的经验而发生了教条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如果说全盘西化是把西方资本主义绝对化,从走欧美的路到走俄国人的路,无疑推进了中国人思想上的进步。然而,照搬苏联,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则是把俄国革命和苏联建设经验绝对化。“中体西用”、“国粹主义”、“全盘西化”以至“全盘苏化”等等,这些观点的共同点,都是没有把外国先进的文化思想与本国具体实践和优秀传统文化有机整合,不是抱残守缺,就是照搬照抄。没有把理论作为发展的开放的体系来看待,而是当成僵死的一成不变的教条。

马克思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它,就会把理论、思想和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了走西方的路和走俄国人的路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创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二、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旗帜

“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①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旗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就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旗帜。邓小平指出,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从鸦片战

^①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争起,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经历过无数次悲惨的失败。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研究中国具体国情,逐步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旦为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就转化成了对中国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伟大的物质力量。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过程中,又成功地开辟了一条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通过这条道路,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从而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1956年以后,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观点,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方针、政策。这些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正如邓小平1980年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所指出的,“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这段时间他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都要写到。这都是我们今天要继续坚持和发展的”^①。“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②。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更为重要的还在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我们不但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更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作为贯穿于整个毛泽东思想全部内容的活的灵魂,对于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更为长远的指导意义。这些充分体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出发点、根本点和立足点,它们永远不会过时,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依靠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依靠它,在今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都仍然要依靠它。

三、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毛泽东思想是民族精神的精华,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提供了强大的思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29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页。

想武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一个直接动因,也是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关注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其根本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毛泽东思想所具有的内在品质和魅力,使得它在中国已经不是一般的政治思想,而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毛泽东思想哺育了几代中国人,它的思想精髓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精神之中。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为实现民族富强而努力奋斗。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作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永远是鼓舞中国人民不断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征程中,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进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学习毛泽东思想,对于深入领会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章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时代精神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必然结果。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斗争中,深刻总结这方面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并在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

第一节 毛泽东思想产生的条件

一、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

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中国经历了很长时期的封建制度,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既稳定又牢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结构。虽然早在明朝末年,中国社会在经济领域中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由于封建国家政权的强力控制和严重束缚以及封建经济的压制排挤,使这些新的、进步的因素难以顺利发展。当西方渡过封建中世纪、迎来资本主义的曙光之时,中国却依然如故,特立独行,在原有的封建社会轨道上缓慢运行。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中国的封建社会继续了三千年左右。直到十九世纪的中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这个社会的内部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①

1840年英国发动的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及其后的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迫使中国逐步由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

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是近代中国一切灾祸的总根源,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虽然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依旧保持着。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但未能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是最主要的矛盾。近代中国革命就是围绕着解决这样两大矛盾而展开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深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一方面,它遭受外国资本主义的排挤和打击,遭受本国封建势力的摧残和压迫,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另一方面,它在不同程度上又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和本国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缺乏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民族资产阶级这种既具有革命性又具有妥协性的特点,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客观条件造成的。

中国工人阶级是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它具有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富于组织性、纪律性等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优点。同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工人阶级还具有自身的优点。一是深受帝国主义、本国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和剥削,具有坚强的斗争性和彻底的革命性。二是集中,有利于工人阶级队伍的组织和团结,便于革命思想的传播和形成比较强大的革命力量。三是中国工人阶级大部分出身于破产的农民,和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易于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共同团结战斗。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复杂的阶级关系和经济、政治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而又复杂的问题。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首要目标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而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特殊的国情也决定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同时,中国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取得成功,必须要解决好在农村战争环境中建党和建军等诸多问题。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在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使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就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过程。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的高峰。由于农民的阶

级局限性,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和理论武器作指导,因而不能制定出正确的革命纲领、路线和政策,不能彻底摧毁封建制度而建立起崭新的社会制度。1898年由康有为、梁启超等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变法图存、富国求强的社会改良运动,也是一次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政治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但是,由于维新派不敢触动封建主义的根基,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脱离广大人民群众,企图通过改良的方法发展资本主义,这是根本行不通的。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所固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能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妥协退让,没有形成坚强统一的领导核心,未能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建立一支坚强有力的革命武装,因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进攻下,辛亥革命失败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迫切需要先进阶级的新的理论来揭示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指导中国革命向前发展,这就为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历史条件。

二、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逐步地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掌握和运用,是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批判地继承人类文化思想上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的科学体系,是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科学理论。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为找到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整整花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由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之所以会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里,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能担负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和社会解放的历史使命。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也只有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才能为中国革命指出真正的出路,才能带领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直至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中,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不断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中汲取养料,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地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才逐步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这就是说,如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和主要来源。正如毛泽东指出:“从一八四〇

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巢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①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给中国带来的最深刻的影响和变化,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根本特征的毛泽东思想的产生。“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②毛泽东的论述,揭示了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伟大成果的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也揭示了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

三、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实践基础

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指导实践,又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由于亲身参加了中国革命的实践,并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对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过程中所获得的独特经验,从理论上做了科学的总结和概括,才逐步产生和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事实正是如此,没有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实践,就不可能产生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理论;没有建立和发展人民军队,进行人民战争的实践及其经验,也就不可能产生毛泽东思想关于人民军队和军事战略的理论。革命理论来源于革命的实践,没有革命实践就不可能产生指导革命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就是产生、形成、成熟、发展于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特别是在同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对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不断作出理论概括。在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等党的早期领导人在参加革命斗争实践深入进行社会调查的基础上,科学地分析了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3~151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阐述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亲自领导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游击战争的实践中,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对中国革命特点的规律的认识,进而解决了在农村如何建设党的人民军队,如何建立和巩固红色政权等一系列问题,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在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开始初步形成。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正确地把握住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使毛泽东思想得到全面展开而达到成熟。正如毛泽东所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①从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形成来看,没有两次国共合作的实践,就没有关于统一战线的系统的理论;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实践,就不会有关于武装斗争和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没有对于革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就不会有对于中国革命基本特点和规律的完整认识,就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发展。

四、毛泽东思想产生的文化底蕴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能不对中国文化的变革产生重大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实际上是一个紧密联系的过程。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不能不从中国文化的优秀遗产中吸取精华。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扬光大,也为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毛泽东十分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借鉴和吸收,十分注重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和民族文化,从中吸取有益的思想资料。他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②毛泽东强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要给以批判地总结,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毛泽东堪称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典范。在政治思想方面,毛泽东继承了中国思想史上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的优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良传统,将其发展为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思想。他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为指导,批判地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创立了党的群众路线。他在继承中国历史上“自强不息”、“人定胜天”思想的基础上,吸取了中国历史上劳动人民与自然抗争、英勇抗击外来敌人入侵的斗争精神,提出了独立自主这一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的思想。在军事思想方面,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批判地总结中国战争史上的经验以及中国古代兵法,为创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政权理论提供了思想材料,也为后来创立游击战争的理论 and 战略战术原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哲学思想方面,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这一民族化的语言,进行了新的诠释,并赋予其深刻的涵义,使之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此外,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对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以及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毛泽东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注意吸收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中的精华。毛泽东批判地借鉴了孙中山的反帝爱国和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例如关于发动民众,以武装斗争推翻封建统治政权,建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思想;关于唤起民众、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关于“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思想。毛泽东在认真分析和研究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的基础上,将其分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为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毛泽东在政治、军事、哲学以及经济、文化等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对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的借鉴和吸收,说明了中国优秀的思想文化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毛泽东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

第二节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一、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一阶段,是毛泽东思想的萌芽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初步结合起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在1920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上,列宁提出了《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系统论述了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对于中国革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22年7月召开的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

实际结合起来。1923年6月,党的三大确定了关于国共合作的方针。1925年1月,党的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四大之后,党的许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周恩来等先后发表文章和演讲,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章,集中了全党的正确主张,分析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成为探索中国革命理论的杰出代表。

但是,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还不能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存在着照抄照搬外国经验的问题。对于共产国际的主张和意见缺乏正确的分析,特别是对于共产国际在大革命后期的错误指导缺乏有效的抵制。也正是由于党在幼年时期还没有确立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尚处于萌芽阶段。

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形成

1927年国民革命的失败,是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遭受到的最严重的一次挫折。在反革命的白色恐怖面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党的八七会议总结了革命失败的教训,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随后在全国各地先后发动了一百多次武装起义。但是,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失败了。面对新的失败,共产党人仍然没有气馁,他们开始了新的思索:怎样进行土地革命、怎样进行武装斗争,怎样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这些问题归结到一起就是为什么要继续进行革命、怎样进行革命?当时,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成功了,无产阶级只能等待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了再去进行第二次革命;“左”倾盲动主义者则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奉为圣旨,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全部是反革命了,无产阶级只能急转直下地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而在具体革命道路的选择上,他们则认为应当照搬苏联十月革命的做法,即通过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这种模式来夺取革命胜利。在种种错误思想的影响下,党在艰难条件下保持和积累起来的微弱的革命力量继续不断地遭受损失。

1927年之后的几年间,毛泽东率先在实践上通过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并在理论上初步论证了中国革命走这条道路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对和这条新道路相关的一系列革命的基本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论证。

第一,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从1928年10月至1930年1月,毛泽东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创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实践中,针对当时党内

一些领导人仍然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坚持“城市中心论”,以及在红军和根据地内一些人产生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先后发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文章,集中回答了红色政权能否存在和发展,怎样坚持和发展这一重大问题。1928年10月,毛泽东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从理论上论证了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小块红色政权区域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同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系统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著名通信中,较为深入地阐述了以农村为革命的重心,先占乡村、后取城市的思想,标志着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与十月革命不同,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是将党的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把落后的农村变成先进的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的主要标志。

第二,土地革命路线的形成。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也是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中心内容。党的土地革命路线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1928年1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第一次用法律形式肯定了中国农民占有土地的神圣权利。这个《土地法》的缺点是:规定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规定土地所有权属工农民主政府,而不是归农民个人所有。1929年4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兴国《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是对井冈山《土地法》的一项原则性的改正。7月,在毛泽东指导下,闽西召开的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在土地革命中,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区别对待大小地主与富农,不打击富农,集中攻击目标于地主,保护大小商店。土地分配的方法,应以乡为单位,以原耕地为基础,“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对在乡的地主“将酌量分与田地”。1930年6月,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在福建长汀县的南阳召开会议,通过了《富农问题》决议,规定在分配土地时,应在“抽多补少”之外还加上“抽肥补瘦”的原则。1931年2月,毛泽东写信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要求各地各级工农民主政府就土地分配以后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安定农民。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逐步形成了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和分配土地的政策,即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土地分配的办法是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党的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提供了中国土地革命理论的基本框架。

第三,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理论和红军作战原则的提出。党在领导创建红军

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由于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红军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红军和党内来,因此,如何在农村环境中建设党和军队的问题就日益突出出来。1929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的精神,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大会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一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坚持了红军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根本原则;肯定了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规定了政治工作的制度和措施;提出了对官兵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的任务。该《决议》总结了军队建设的经验,分析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和来源,解决了在长期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如何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

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适应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的需要,毛泽东和朱德就提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等红军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这些原则在后来的反“围剿”战争中得到了运用和发展。到1931年秋天,形成了红军的作战原则。主要内容是: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诱敌深入,慎重初战,着眼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集中优势兵力,打速决战、歼灭战。这些作战原则和人民军队建设的理论构成了党的军事路线的基本内容。

第四,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初步确立。1930年5月,毛泽东发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对党的斗争经验进行了科学的总结。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①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②。毛泽东历来注重调查研究,并反复强调要调查研究,“反对瞎说”。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③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全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批判了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这就为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基本形成了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转折关头,在全党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艰难历程中,提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 and 反对教条主义的主张,标志着在20世纪30年代初,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毛泽东思想已经初步形成。

三、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的曲折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同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对中国革命的发展,特别是对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伟大历史性转变的实现,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但是,由于当时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还没有确定,毛泽东思想还没有被全党所认识,特别是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毛泽东的指责和反对,这就使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受到限制,使毛泽东思想的发展遇到严重的阻碍。

早在李立三“左”倾错误统治中央前后,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就遭到过指责和反对。“左”倾领导者指责毛泽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①。并批评红四军前委是“站在农民观点上来作土地革命”,说“你们认为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反映了农民意识”,“你们的割据观点,同样是农民观点”^②。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上台后,更以不折不扣地全面执行“国际路线”相号召,打着“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旗号,反对毛泽东所代表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反对毛泽东制定和实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们把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诬蔑为所谓“枪杆子主义”和所谓“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不顾中国的具体情况,固执地推行“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夺取政权模式,一味追求在大城市“真正”准备武装起义,梦想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甚至胡说什么“虽然南中国几省的苏维埃政权运动已经蔓延了一年多,但始终未能建立起真正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府”^③,抹煞党领导“工农武装割据”所取得的胜利。他们指责毛泽东制定的正确的土地路线和政策是所谓“富农路线”,说“你们容许地主残余租借土地耕种,对于富农只是抽肥补瘦,抽多补少,而不实行变换富农肥田给他坏田种的办法”,这就犯有“富农路线的某些错误”^④,是犯了“向地主豪绅及富农让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指责毛泽东不去建立真正的工农红军,说红军还“没有完

① 李立三:《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1930年4月2日。

② 《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信》,1930年6月15日。

③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55页。

④ 转引自《土地革命纪事》,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25页。

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①，“说他提倡诱敌深入，找弱敌打等正确主张是所谓‘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危险’”^②，并经过1931年11月的中央苏区党代表大会（即赣南大会）和1932年10月中央苏区中央局会议（即宁都会议）实际上撤换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

1933年初，“左”倾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为了全面贯彻“左”倾政策，反对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先后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和所谓江西的“罗明路线”的斗争，打击了邓小平等执行正确路线的党和红军干部，完全排斥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不久，共产国际派李德为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李德和犯有“左”倾错误的中央主要负责人结合起来，完全控制了党中央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他们顽固推行军事教条主义，完全否定了毛泽东制定的正确的建军原则和作战原则。在建军问题上，他们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忽视正确的军民、军政、官兵关系的教育，要求按照苏联红军的模式组建红军，还不适当地强调正规化，反对所谓“游击主义”；在作战问题上，他们否认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进行所谓“大军对大军”的“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弱小的红军同强大的敌人作阵地战，拼消耗。“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他们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继则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同敌人‘拼消耗’；最后，在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时，又变为实行真正的逃跑主义”^③。结果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并使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面临着十分危急的局势。1935年1月，党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对严重危害党和革命的“左”倾军事路线的纠正，以及对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军事思想的肯定，成为当时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它实际上已经表明，党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摆脱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确立了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毛泽东思想根本点及出发点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从而把党的路线逐步转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有力地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第三节 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一、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条件

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3页。

② 《聂荣臻回忆录》，见《中共党史资料》第5辑，第4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4页。

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起来,充分认识和掌握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把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达到成熟,是与这一时期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

第一,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反复对比,为党正确认识中国革命客观规律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经验,这是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的一个最基本的历史条件。

毛泽东指出:“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①中国革命为什么会发生两次胜利、两次失败这样大的曲折?怎样才能使革命减少或者避免大的挫折、失败,并从而取得胜利?这是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严重问题。要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系统、完整地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深刻揭示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提出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导致中国革命两次失败的原因固然很多,也很复杂,但其中最主要的,是党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还没有经验,或经验不足;党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对于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还不了解,或懂得不多;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与两次失败的鲜明对比,使党对于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对于反映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的认识也更加深刻;而党对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与两次失败丰富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又必然会推动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使之走向成熟。从遵义会议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着手系统总结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和党中央到达陕北后,这种总结更密切地联系到新的革命实践而进一步深入。其结果,是使党认识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制定了合乎中国革命实际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使毛泽东思想达到了成熟。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②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300页。

第二,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提供了新的重要历史条件。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①,它是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最大的特点是民族压迫,因而抗日战争所提供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验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成熟也就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抗日战争是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一次空前规模并最终彻底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又是这个革命的一次全国高潮;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的战场。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给予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影响是极其巨大和深刻的,它所提供的历史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它向这场战争的倡导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许多新的迫切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重大课题,也提供了许多解决这些课题的历史条件。

首先,抗日战争是一个大而弱的半殖民地中国反对一个小而强的帝国主义日本的民族解放战争。在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这些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的基本特点之下,怎样打败日本侵略者、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这是新的斗争实践向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一个新课题。中国共产党适应抗日战争历史条件的需要,及时完成了自己在军事战略上由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向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和更深刻的程度上运用过去两次革命战争,尤其是土地革命战争中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领导中国人民以抗日游击战为基本形式,进行了持久的人民战争,从而为大而弱的被压迫民族战胜强大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军事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从而为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增添了极其重要的内容。

其次,抗日战争是在以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这个统一战线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历史关头形成的,不仅有广大工农、小资产阶级,而且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以及赞成或不反对抗日的地主买办阶级在内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各种力量的发展又很不平衡,作为这个统一战线基础的国共两党,不但各自都有军队和政权,而且又都有自己从过去两党关系史中吸取的不同的经验教训;这个统一战线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的政治纲领,等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这些特点,决定了统一战线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和斗争的曲折性,也决定了坚持统一战线的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页。

艰巨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所积累的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织浩浩荡荡的民族大军，打击当前主要敌人，这一被压迫民族战胜帝国主义侵略的宝贵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使党对统一战线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使党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更加完备。

再次，抗日战争对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它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为实现民族解放这一神圣的历史使命而英勇奋斗，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抗战以后，一方面党的组织有了迅速的发展，党担负了领导抗日的重任，另一方面，党的建设又面临许多新的情况和任务。大批新党员、新干部还没有足够的经验；老党员、老干部也由于情况和任务的变化而产生了急需提高水平的问题。同时，对历史上的“左”右倾错误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理论上进行彻底清算，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影响还严重存在着。所有这些，都要求党密切联系抗日战争的实践，联系党的思想、政治路线，特别是联系统一战线、武装斗争这两个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进一步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认识和掌握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完成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艰巨任务，使党在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伟大历史使命，而这样一个党的建设任务，又必然会推动党在思想、理论上的成熟。

最后，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特殊阶段。要认识抗日战争这一历史地位，就必须认清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历史特点和规律，认清中国革命两个阶段之间的正确关系，特别是要对新民主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抗战以后，党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继续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建立了许多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并按照新民主主义的要求，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这个政权实际上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雏形；与此同时，国民党为配合其军事上的反共高潮，又妄图用所谓“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叫嚣取消共产党，取消共产主义，因而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一般原理同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国革命的特点结合起来，对整个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

第三，遵义会议以后，逐渐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核心。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逐步克服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政治、组织，特别是思想理论上的错误，逐步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军事、思想和组织路线，这也为

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遵义会议在批判、纠正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指挥上错误的同时,以中央决议的名义肯定了毛泽东从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出发提出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这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实际上表明,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摆脱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确立了作为毛泽东思想根本点的实事求是原则。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改变了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排斥、打击,而使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的状况。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使毛泽东担负了更大的领导责任,从而更有条件立足全党观察问题,研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使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地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为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所了解和认识,更多党的领袖人物开始注意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对毛泽东思想发展到成熟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遵义会议后,共产国际“七大”决定改变共产国际的工作方式和领导方法,抗战前夜和抗战时期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也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在上述历史条件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包括张闻天、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内的一批党的卓越领导人,集中力量从事理论研究和著述工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系统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发表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阐述中国革命的理论,为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各方面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使之达到了成熟。

二、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标志

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主要是指党已经能够自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作出科学总结;已经能够深刻揭示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及其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已经形成了既完全属于马克思主义、又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比较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并制定了适合中国情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的标志是: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系统化。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党和毛泽东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认识也在进一步深化。1939年,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目的,以及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特点。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特点和主要矛盾,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对象、任务、动力、前途等问题。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

主主义论》，在深刻总结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探索的成果的基础上，深刻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时代特点和发展规律，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系统地概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随后又在《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科学内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系统化，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主要标志。

第二，统一战线的理论的完整形成。为了适应建立、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先后发表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以及周恩来发表的《论统一战线》等文章中，科学地阐述了在中国革命中建立统一战线的历史必然性，以及统一战线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系统地提出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强调要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在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提出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以及同顽固派斗争时应坚持的“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策略思想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原则的稳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范例。

第三，党的建设的理论丰富发展。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之统一的思想武装全党，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完成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任务，这一时期，毛泽东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反对自由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学习和时局》等著作中，深刻分析了遵义会议以来党内存在的问题，尤其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产生的原因和危害。针对抗日战争以来大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党员存在的问题，特别强调思想建党的原则，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用整风的形式对全党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出现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系统提出了党的三大作风，强调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贡献。

第四，人民军队建设和革命战争战略战术思想的发展。毛泽东在《中国革命

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中,系统总结了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完整地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和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强调要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要求把游击战争提到抗日战争的战略地位,并为人民军队制定了在敌强我弱形势下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把战略上的劣势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和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宝库。

第五,根据地建设理论的更加丰富。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党把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理论运用于抗日战争的实际,在敌后的广大农村建立了一批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毛泽东先后发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抗日时期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组织起来》、《怎样学会做经济工作》等著作,系统地阐述了根据地建设的理论。

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毛泽东指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其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应实行“三三制”原则。毛泽东还具体阐述了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方针和具体政策。

关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毛泽东明确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①要以农业为主,全面发展,实行“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的原则,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同时,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

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毛泽东深刻分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文化工作的方针,以及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并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方针和政策,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思想,为党的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

第六,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得到发展而臻于成熟。这一时期,适应中国革命转变和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需要,毛泽东先后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著作,从哲学上系统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揭示了党内“左”的和右的错误的思想根源,为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实践论》从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认识的最终目的等方面,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并全面地论述了在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1页。

识、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能动飞跃的认识发展过程，阐明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矛盾论》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矛盾的同性和斗争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方面，阐明了认识论的辩证法，精辟地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是事物矛盾的精髓等观点。“两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典著作，从认识论和辩证法两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作了哲学上的论证。《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对实事求是这一概念作出了科学的解释，概括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表明党的群众路线思想已达到成熟。

三、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在全党的确立

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不但在于它已发展成为完整的科学体系和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还在于全党对它达到了统一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延安整风运动则起了关键性作用。

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时期，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因而对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以及贯穿这一理论之中的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从全党来说还没有被认识。

通过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再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这样的曲折变化，党和红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新的认识。因而遵义会议结束了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性。它标志着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精辟地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一科学命题，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并正确运用它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这次会议使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大大提高了。

1942年的整风运动，是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是一次党内思想的大解放。通过这次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广大党员干部真正认识和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从而使全党形成了对毛泽东思想高度一致的认识，为党的“七大”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作了思想准备。正如毛泽东所说：“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

识。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①。

首先,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把广大党员和干部从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实事求是,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思想原则成为党的思想路线。其次,整风运动期间,高级干部学习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为全党认识毛泽东领导的正确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最后,在整风运动期间,不少中央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开始发表阐述毛泽东思想的文章,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并提出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些情况表明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水平。

1944年5月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强调指出:“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②这表明,全党已经公认毛泽东思想为中国革命唯一的正确的指导思想。在此基础上,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正式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以后,中国革命和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伟大变化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获得的。因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③。

第四节 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发展

一、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渴望建立一个独立、和平、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298~29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8~999页。

③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9、60页。

中国。但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坚持独裁、内战、卖国的方针，在美国的支持下，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发动反革命内战，企图使中国人民仍旧处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同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纷纷发表对时局的主张，试图建立一个以“英美的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为模式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制定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方针，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经过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取得了重大胜利。

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制定了打败蒋介石的政治方针和军事原则，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并在1947年6月转入战略进攻。与此同时，党还领导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创造了条件。国民党统治区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人民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形成反蒋的第二条战线。在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形势下，党中央十二月会议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行动纲领，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了重要准备。1948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了战略决战的重大胜利。党中央又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发起渡江战役，解放南京，宣告了蒋家王朝的覆灭。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理论上和政策上作了准备。

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独立自主地领导了中国革命，体现了一个成熟的党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领导中国革命的高超技艺，为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条件。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继续发展的主要内容表现在：

第一，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和用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两手的策略。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个命运和两种前途的决战。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一面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加紧反革命内战的准备，一面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针对蒋介石的反革命两手策略，党和毛泽东提出了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的策略。一方面，针对蒋介石对于人民实行“寸权必夺，寸利必得”的反动方针，明确提出：“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①另一方面，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赴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这种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两手的策略，就是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和谈阴谋予以揭露，争取国内和平民主的实现。同时，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内战阴谋要保持高度警惕，如果国民党要发起内战，我们就进行自卫战争，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6页。

击退其进攻。

第二,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1946年6月,国民党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战争初期,国民党蒋介石企图凭借其军事优势,采取速战速决的方针,一举消灭人民解放军。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在军事实力和经济力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这时,中国共产党必须首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以及世界上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能否打败国民党反动派。1946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首次提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毛泽东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①毛泽东在谈话中,详尽地阐述了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斗争、善于胜利的战略思想,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坚定了全国人民打败在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

第三,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发展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适应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发展的需要,毛泽东先后发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文章,系统总结了党领导的几次革命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以来的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十大军事原则的核心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围绕这一核心,还规定了作战方针、作战形式和作战方法等。十大军事原则对于人民解放军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四,提出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思想,丰富和完善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和政策。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后,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成为夺取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关键。1948年3月,毛泽东在《关于情况的通报》中明确提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②这里充分强调了执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意义。同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土改总路线的完整概念,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制定了各项具体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8页。

第五,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和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夕,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系统地分析了全国胜利后国内外的形势和基本矛盾,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理论和政策。强调,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党在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在政治方面,要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在经济方面,要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使之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要谨慎、逐步而又积极地引导他们走合作化道路;同时必须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外交方面,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党的建设方面,号召全党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糖衣炮弹的进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解决了夺取全国胜利和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为实现这一转变作了重要准备。同年6月,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集中论述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必然性,明确指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唯一的出路是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①这是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经验,也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二、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已经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建国后头三年,全党和全国人民面临的任务是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条件。中国共产党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各项工作纷繁复杂的局面,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方针,进行了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和抗美援朝战争,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任务完成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酝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实现国家对个体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至1956年,党领导全国人民基本完成三大改造的任务,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初步建立起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以新的思想和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此同时,从1953年起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原定的指标大都提前完成,这就极大地增强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制定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所有这些,都为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继续发展的主要内容表现在:

第一,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思想。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全国人民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形势和严重的困难。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全会科学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确定了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要获得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和做好八项工作。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①因此,我们必须孤立和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以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②这就是七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战略策略思想。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对党领导全国人民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思想,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已经提了出来。1952年9月以后,毛泽东多次讲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明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其实质是把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使之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5~76页。

第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土地改革完成后,党代表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适时地引导农民通过合作化道路,逐步把小农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认为土改后,中国农民存在着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和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党不能忽视和挫伤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又必须提倡“组织起来”,调动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强调农业互助合作要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按照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的原则,采取逐步推广的方法。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又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总结了我国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经验。该《决议》指出:“经过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和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而有某些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实行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公有制的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就是集体农庄)。这种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发展道路,就是我们党所指出的对农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①此后,农业生产合作社进入发展时期,到1956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道路,采取和平赎买的方式来实现的。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所有制是非劳动者的私有制,按照剥夺剥夺者的原则,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可以采取没收或者赎买的办法,把它收归国有,变为全民财产。假如无产阶级能用赎买的办法把资本家的财产完全国有化,那么对于无产阶级是最便宜的事情。十月革命后,列宁曾根据俄国的历史条件提出过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的政策,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付诸实施。党和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把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分为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对其分别采取没收和赎买政策。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赎买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如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的初级形式,以及个别行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的高级形式,并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到1956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一个创举,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和平赎买的理论。

三、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思想的曲折发展

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62页。

设社会主义的时期。这一时期,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正确与错误两个发展趋向,正确的发展趋向就是党开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提出探索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形成了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了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这主要是指,1956年八大一次会议前后一年多的探索,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八九个月的探索和1960年冬天以后五年国民经济调整中所取得的一些积极成果;错误的发展趋向,就是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这主要是在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后的“左”倾错误和经济建设方面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错误。两个趋向集中表现在党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等问题的认识上缺乏坚定明确的认识。

在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上,虽然党的八大在正确地分析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基础上,指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但是,时隔不久,由于毛泽东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错误估计,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以及随后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又否定了八大对主要矛盾的基本正确的论断,重新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不仅是对已经发展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理论说明,而且成为以后一再出现“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理论根据。

在对社会主义时期党和国家根本任务的认识上,党的八大已经明确指出党和全国人民在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①。1958年,毛泽东又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然而,在这十年中,党始终没有把工作重心完全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这一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明确的,但是,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仍处于探索之中,思想上并不十分清楚。“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②,在经济建设速度方面要求过急,政策偏“左”,只强调变革生产关系,片面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却忽略了生产力自身发展的规律,导致了1958年的“大跃进”,对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此后,党开始觉察到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

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并着手调整国民经济,但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树立起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没有能够掌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模式上,一方面,“我们有些经济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管理、企业的组织这些方面,受苏联影响比较大”^①。要冲破其束缚,走出自己建设的道路。对此,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另一方面,在理论和实践上又没有完全摆脱苏联模式带来的消极影响,由于错误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急于过渡,不仅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的损失,而且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陷入了误区。

邓小平指出,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之所以出现曲折和反复,甚至出现严重失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②。这种“左”的错误的的发展和阶级斗争步步升级的结果,导致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形成。在这十年中,有时候正确的趋向是主要的,有时候错误的趋向是主要的,有时候正确与错误的趋向交织在一起。正确的趋向属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错误的趋向属于对毛泽东思想科学原理的偏离。两种发展趋向曲折交错,决定了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异常复杂的情况。

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提出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思想,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若干重大关系的思想。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以苏联经验为借鉴,走自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并在调查研究、集中党的集体智慧的基础上,从经济、政治等方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特点。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

第三,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反复强调要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指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9页。

和轻工业”^①。由此逐步形成了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做到工农业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第四,关于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的思想。毛泽东在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错误的过程中,针对取消商品、货币和否定价值规律作用等错误观点,提出了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的思想。刘少奇也提出商品存在的长期性问题,他认为,即使两种所有制消灭了,商品仍会存在。

这一时期,党的其他领导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也为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发展作出了贡献。刘少奇提出了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和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周恩来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以及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等观点;陈云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订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邓小平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朱德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这些思想和观点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积极成果。这些思想观点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的恢复及其新发展

1966年至1976年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错误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241页。

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其中有很多是毛泽东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文化大革命”使毛泽东思想的发展遭到严重挫折,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被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被颠倒割裂,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遭到严重破坏。尽管如此,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提出了反对“和平演变”的理论原则,进行了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毛泽东还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是毛泽东思想在挫折中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使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得以恢复。在此基础上,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继承和创造性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①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客观规律的完备理论形态,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一般原理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的伟大成果。它全面系统地回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它是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的主要标志。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和对象

毛泽东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②这种变化,表明了中国成为许多帝国主义统治或半统治下的国家,帝国主义操纵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他指出,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0页。

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占据着显然的优势;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很软弱,它的大部分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不平衡;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日益贫困以至大批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决定上述种种情况的,主要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相结合的结果。因此,“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①。

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任务。毛泽东认为,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中,压迫和阻止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二者互相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其中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资本家服务的阶级,因而也是中国革命的对象。而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国以后,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勾结日本公开投降或准备投降的一切汉奸和反动派。由此也可以明白,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派。

既然中国革命的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那就规定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毫无疑问,主要地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②。

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两大任务是互相关联不可分离的。由于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所以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又由于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而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所以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7页。

命的强大的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样两个基本任务,是互相区别,又是互相统一的。”^①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和动力

无产阶级掌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是区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标志,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参加并领导民主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的性质,不仅规定了革命的对象和任务,而且规定了革命的动力:“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中,有些什么阶级有些什么阶层可以充当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力量呢?这就是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认清这个革命的动力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策略问题。”^②毛泽东在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基础上明确说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包括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且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

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这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许多特出的优点。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的三种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第三,中国无产阶级中由于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分占多数,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虽然中国无产阶级也有人数较少、年龄较轻、文化水准较低等不可避免的弱点,然而,由于上述的基本优点和特出的优点,他们终究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知识分子。这时,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当作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的舞台,还是当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而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成长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8页。

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能够担负的。而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那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了。

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人民大众”的主体部分。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没有广大农民的积极参加,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大约占百分之八十,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①而农民阶级的内部又不断地分化,因而又分为富农、中农和贫农。毛泽东对农民中的富农、中农和贫农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认真加以剖析。认为,富农带有半封建性,约占农村人口5%左右,被称为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富农一般地在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可能参加一分力量,在反对地主的土地革命斗争中也可能保持中立。因此,我们不应把富农看成和地主无分别的阶级,不应过早地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②。中农在中国农村中占20%左右,一般不剥削人,在经济上能自给自足,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剥削。“中农都是没有政治权利的。一部分中农土地不足,只有一部分中农(富裕中农)土地略有多余。中农不但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革命和土地革命,并且能够接受社会主义。因此,全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是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③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70%。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④。在这里,毛泽东所说的农民“主要地是指贫农和中农”^⑤。“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⑥但贫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得到解放,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

中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他们的地位和中农有点相像,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日益走向破产和没落的境地。“这些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这些小资产阶级也只有和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得到解放。”^⑦小资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3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3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4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2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1页。

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尤其是广大的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①但是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需要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加以克服。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带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他们曾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受封建主义的束缚，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另一方面，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软弱，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②

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是毛泽东根据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而得出的科学结论。他认为，既然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那么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即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才发生的。它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0页。

不同于历史上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同于社会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实际上就是指“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①。在这方面,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思想。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根据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历史的特点,全面、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基本规律,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革命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因此,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所谓民主主义,已不是旧式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即新民主主义。这个革命的第一步是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变成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②

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只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而不破坏尚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成分。社会主义革命是反对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改造小生产者的私有制。因此,两个革命阶段的革命对象不同,革命任务不同,决定了革命的性质不同。民主革命任务不完成,就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从任务上和时间上严格区别开来。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如果说,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个时间去完成的另一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到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这种观点,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③

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在于,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这是两个革命过程内部存在着的有机联系。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普遍性来讲,它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65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5页。

主义性质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如: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经济上建立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等等。所以这个革命又恰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阔的道路。这个革命胜利后,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

总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总路线。它明确地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和任务、领导和动力、性质和前途等基本问题,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

一、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于政治问题的基本主张和斗争目标。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是,在中国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里,无产阶级处于领导地位,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居于主要地位,也给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愿意实行新民主主义的人们以一定地位,以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资产阶级专政。“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①新民主主义国家所采取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具有高度集中的权力,由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并委托和监督政府处理一切事务;民主集中制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发扬广泛的、真正的民主,体现广大人民参政议政的意志和当家作主的权力,又使它能够集中处理国家大事,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在实践中引导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政治基础。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问题,进行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5页。

了深入的分析论证。他把全世界的国家按照国体划分为三种：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中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如何？毛泽东依社会各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了这个问题。“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①这就是说，中国的国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毛泽东同时指出，国体需要相应的政体体现，政体应与国体相适应。他说：“至于还有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②这个适当的政体就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毛泽东认为：“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③。

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又把政治纲领分为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并结合抗战胜利前后的实际对一般纲领作了深入的阐述。强调，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将要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在这个国家中“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并且主张在推翻和废止这些之后不是建立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④。而“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⑤。

同时，毛泽东还分析了党在各个时期中的具体纲领。他认为，在整个资产阶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4～67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6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7页。

级民主革命阶段中,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是不变的。但在这个大阶段的各个小阶段中,随着情况的变化,具体纲领不能不有所变化。比如,在抗日战争初期的1937年,党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实行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改良人民生活;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建立以抗日的民族团结为内容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到1945年党的七大,又根据情况的变化,对这个时期的具体纲领提出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等新的要求。这些具体纲领都是对一般纲领的丰富和具体化。

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于经济问题的基本主张和斗争目标。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比较完整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经济纲领。即没收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同时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中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

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重点从中国共产党人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态度方面对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加以补充说明。毛泽东说:“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①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成分,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经营三者组成的。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范围内得到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明确规定了新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8页。

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①

首先,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土地问题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以地主阶级为主体的封建势力,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地主阶级用封建制度残酷剥削和压迫广大农民,束缚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同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相勾结,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消灭封建地主阶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所以,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发展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经济,是废除封建的半封建的土地制度的一种最彻底的办法。只有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才能挖掉中华民族贫困的重要根子,解放农村生产力,为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创造有利条件。

其次,没收官僚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鉴于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本质,它同民族资本主义之间的尖锐对立,无论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任务的角度,还是从“节制资本”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学的角度,都必须解决官僚资本的问题。没收官僚资本具有双重革命性质:一方面,它将摧毁蒋介石政权的经济基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另一方面,它将剥夺大资产阶级手里的生产资料,又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使人民共和国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这种经济将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

最后,允许不操纵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存在与发展,即保护民族工商业,这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决定的。在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进步的生产关系,民族工商业代表了中华民族的资本主义经济,同官僚资本主义有本质的不同。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也是资产阶级,但他们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或保持中立,他们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或联系较少,因此,在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必须允许他们的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使他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他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由于新民主主义国家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而建立的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所以民族工商业不可能操纵国计民生。对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反动政治倾向,应当进行揭露和打击,但是政治上的打击和经济上的消灭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总之,新民主主义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建立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3页。

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是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是革命的中国应该建立和必然建立的内部经济关系,即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毛泽东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他又指出,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办法都是错误的。

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于文化问题的基本主张和斗争目标。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反映。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的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而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新经济的東西。这种新文化,在五四以前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五四后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因为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结合,建立相互吸收和相互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中国应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但要把它分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要采取自己独特的民族形式,要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为中国广大人民喜闻乐见。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的新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相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4页。

线,但决不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对中国封建社会创造的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要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就是主张文化的民主化。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该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要把教育干部的知识和教育大众的知识相区别又互相联系起来,把提高和普及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革命文化对人民大众是有力武器,而这种文化的实践都是群众的。“因此,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①结论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②。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道路

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

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但是,如何实现武装夺取政权的任务,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具体革命道路也就不同。在俄国,是先占领城市,后占领农村;在中国则正好相反,是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

(一)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基本内容

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通信中论述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基本内容。认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③,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农村为工作重心,以根据地为依托,以政权为杠杆,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密不可分、缺一不可。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在反革命派掌握着强大的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血腥屠杀政策的中国,没有武装斗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70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

争,就无法开展土地革命,就不能建立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内容,是发动农民参加革命的有效手段,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主要途径。没有土地革命,农民发动不起来,红军得不到农民的支持,就没有了人力、物力的来源,武装斗争就无法顺利进行,根据地也就不能巩固。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战略基地,是红军休养生息的主要场所,也是开展土地革命的主要地区。没有根据地,土地革命就没有基础,武装斗争就没有依托,就会变成流寇主义。

这条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独创性地开辟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毛泽东阐明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重要意义,指出: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毛泽东把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看成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毫无疑问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

(二) 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要性

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论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是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的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可以组织工人进行罢工,利用议会的合法讲坛去揭露敌人,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团结群众,生息力量,准备最后推翻资本主义,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农村。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必须是武装的,在中国无议会可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行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农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第二,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而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要战胜敌人就必须在农村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敌强我弱的情况在城市尤为突出,广大农村是其统治的薄弱环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自己力量不够时和强大的敌人决战,就必须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长期聚集力量,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革命阵地,以革命

的农村包围城市,逐步夺取城市,取得革命的全部胜利。

第三,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内容,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和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革命战争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战争。无产阶级要夺取革命胜利,必须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武装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三) 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可能性

毛泽东深刻论述了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产生并发展的原因和条件。

第一,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这是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客观原因。中国经济上的特点是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并存,近代式的工商业城市和落后的农村同时并存。这种经济上的不统一和地方农业经济范围的广大,使中国农村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不依赖城市而求得自给自足,因而使革命势力可以在农村独立地长期存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又决定了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帝国主义在许多偏远的农村还没有形成直接的支配力量。大小军阀同时并存,白色政权分散存在、长期混战,搞封建割据。这种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给了革命力量以可乘之机,加之中国地域广阔,革命力量大有回旋余地。这就“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①。

第二,中国经过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这对小块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也是有利的。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一些中心区域,例如,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曾经有过工农运动的高潮,成立过许多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的斗争。工农群众受过革命斗争的锻炼,有一定的斗争经验。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大革命的影响还遗留在这些地区的广大群众中,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准备了群众基础,因而红色政权能够首先在这些地区存在和发展。

第三,红色政权能否长期存在,还取决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大革命失败后,引起中国革命的矛盾不仅一个没有解决,而且在继续发展和激化。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在一天天地发展,因而全国革命形势必将不断向前发展。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

第四,相当力量正式红军的存在,是农村革命根据地存在的必要条件。要创造并发展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必须要有一支相当力量的红军。因为地方性质的赤卫队,只能对付小股的地主武装。只有正式的红军,才能对付正规的反动军队,保证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人民军队是红色政权的支柱,是农村革命根据地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是农村革命根据地长期存在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有许多客观条件,要把客观上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需要主观条件。最根本的主观条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毛泽东总结了湘赣边界割据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的一系列正确政策,如:坚决和敌人作斗争,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集中兵力对付主要敌人,反对分散,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等等。这些正确政策的实行,使井冈山根据地和其他根据地战胜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日益发展壮大。

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思想

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开展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基本条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农村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形成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思想。

(一) 建立和巩固根据地的人民政权的思想

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是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基本问题。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井冈山后,即着手建立革命政权的工作。随着革命根据地的扩大和实践经验的积累,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思想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

第一,人民政权的建立是革命根据地建立的首要标志。

马克思主义认为:“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社会的一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这个阶级的由其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每一次都在相应的国家形式中获得实践的观念的表现,因此一切革命斗争都是针对在此以前实行统治的阶级的。”^①即是说,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表现为阶级矛盾。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总是依靠国家政权来维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生产关系。革命阶级如果不通过革命手段夺取国家政权,就不能摧毁旧的生产关系,为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开辟道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毛泽东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

是对的。”^①国家政权属于上层建筑,表现为阶级统治和压迫。对于人民来说,有了政权才能彻底改变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获得翻身解放,当家作主,从根本上掌握自己的命运,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

建立革命根据地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从事革命游击战争,首先必须全力建立一支以至多支游击队伍,并使之在斗争中逐渐发展为正规部队和正规兵团,依靠这个部队去战胜敌人;二是战胜敌人,变敌人的统治区为我控制的地方,实行军事割据和发展割据局面;三是发动民众建立和巩固当地的革命政权,以加强和统一根据地的军事政治的领导。一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只有逐渐具备上述这三个基本条件,才能真正建立起来,游击区与根据地的区别,就在于游击战争在开始时期还不能完全占领该地,游击队在时属于游击区,游击队走了又属于敌对政权。这种游击区,只有经过游击战争的必要过程,消灭或打败了许多敌人,摧毁了敌对政权,发动民众建立起革命政权,使这一区域为我所控制,才会转变为革命根据地。将这些根据地增加到原有的根据地里面去,就叫做发展了根据地。

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批判了当时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他指出,他们只赞成在边界区域流动游击,而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在革命根据地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是否建立起人民政权,作为衡量是否建立起革命根据地的首要标志。

第二,政权建设是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保证。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对于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正如毛泽东所说:“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②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坚持革命斗争,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建立起了红色政权,即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工农民主政权的任务,除了支前、打仗以外,还要搞土地分配,要发展生产、贸易、教育、文化、卫生,要办合作事业,要改善人民生活,要惩治罪犯等。它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战争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1页。

胜利,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人民群众真心实意拥护苏维埃政权,并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发展生产和参军参战,保卫革命成果。苏维埃政权波浪式地向前发展,推动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深对中国的侵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决定将“工农共和国”口号改变为“人民共和国”口号,扩大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日根据地内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分子,说明抗日民主政权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当时,摆在抗日民主政权面前的基本任务,就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领导抗日游击战争并取得胜利。它的施政方针主要包括:普遍地武装人民,动员人民参战;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改善人民的生活;肃清汉奸,取缔一切阻碍与破坏人民参加抗日战争的行为。抗日民主政权极好地完成了上述任务,取得了人民群众的最高信任,最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人民群众愿意将自己的一切交给抗日民主政府去与日寇作战,因而能够将所在区域建成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为抗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区完成了由抗日民主政权向人民民主政权体制的转变。人民民主政权发展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特别是在人力、物力等方面,为保证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解放区政府调集大批干部组成支前委员会和强有力的支前指挥部,人民解放军打到哪里,各级人民政府的支前工作就做到哪里,有力地推动了解放区的迅猛发展。

根据地的政治建设,是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政权建设集中体现了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建设。其主要特点是,不断加强人民民主,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在革命根据地建设方面,把政权建设放在首位,大大推进了革命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

(二) 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思想

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人民革命力量不断壮大,对经济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革命战争发展的重要的物质基础。党和毛泽东十分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思想。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农村根据地军民不仅同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展开坚决的斗争,而且还为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为了正确地指导根据地经济建设,毛泽东提出了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政策。主要内容是:

第一,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及经济建设和革命战争的关系。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

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①开展经济工作，一是为了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以获得革命战争的胜利；二是为了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以便激发他们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三是为了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获得新的群众力量；四是为了从经济上巩固工农联盟，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

关于经济建设和革命战争的相互关系，毛泽东指出：“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②毛泽东批评了当时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存在的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得不可开交，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经济建设工作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毛泽东指出：“这些意见是不对的。抱着这些意见的同志，他们不了解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③“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展开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才能使我们有力量去扩大红军”，“也才能使我们的广大群众都得到生活上的相当的满足，而更加高兴地去当红军，去做各项革命工作”^④。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企图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毛泽东指出，这“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在国内战争中企图进行和平的，为将来所应有而现在所不应有的，为将来的环境所许可而现在的环境不许可的那些经济建设工作，只是一种瞎想”^⑤。

第二，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毛泽东指出，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一是为了保证革命战争的供给，保证红军的物质需要；二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为此，必须把农业生产放在中心位置。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目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⑥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必须帮助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120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页。

农民解决劳动力问题、耕牛问题、肥料问题、种子问题、水利问题,要组织小范围的农事试验场,并设立农业研究学校和农业产品展览所。

第三,根据地的经济政策及其原则。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①

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政策,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②。“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所以,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应该是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的。”^③要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食粮和钨砂的输出,以及粮食在内部的调剂等。

关于革命根据地的财政工作,毛泽东指出,苏维埃财政的目的,在于保证革命战争的给养与供给,保证苏维埃一切革命费用支出。苏维埃财政的来源,一是向一切封建剥削者进行没收或征发;二是税收;三是国民经济事业的发展。其中,“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④。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毛泽东批评了贪污和浪费的现象,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⑤

毛泽东还提出了解决财政困难的方法。指出,苏维埃财政不是没有困难的,“开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改善我们的苏维埃工作,向着一切国民党区域去扩大我们的财政收入,向着一切剥削分子的肩上安放着苏维埃财政的担子,向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去增加苏维埃的收入,这就是克服困难的方法”^⑥。

第四,经济工作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毛泽东认为,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首先,要动员广大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134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

⑥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

群众,动员一切革命团体去做经济工作,参加经济建设。其次,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要采取正确的方法。毛泽东指出: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动员群众也不能采取命令主义,命令主义是不能使经济工作获得成功的。我们的工作方式,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做一切经济动员的工作”^①。

在毛泽东根据地经济建设思想的指引下,农村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农业生产方面,1933年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谷子收成增加了15%,闽浙赣根据地增加了20%,杂粮则有更大的增加。其他根据地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工业方面,以中央革命根据地为例,除各种军需业外,还发展了制盐、制糖、纺织、医药、纸张、农具、煤炭、炼铁等工业。贫苦农民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面对解放区大为缩小,财政经济极为困难,解放区军民几乎到了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严重局面,毛泽东向解放区军民发出了“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伟大号召,领导解放区军民开展了一场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的发展,克服了解放区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局面,为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为战胜日本侵略者,创造了重要的物质条件。

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区已拥有若干中等城市和工矿区。掌握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工业、商业和金融业,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任务。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这些城市的经济和工矿的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特别是人民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进攻以后,解放区迅速扩大,许多工商业大城市也从反动统治下解放出来,党和政府面临着新的复杂的经济问题。党不仅应有正确的土地政策,而且应有正确的城市政策。党和政府决定,在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的同时,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充分利用民族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方面,促进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为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事业,毛泽东特别强调:“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②恢复和发展生产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的生产。为此,我们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制定的经济纲领和政策,有力地推动了解放区经济的发展,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12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

（三）组织民众和加强地方武装训练的思想

组织民众和加强地方武装训练,是从军事方面加强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组织民众是革命根据地实行人民战争的需要。

党在领导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始终致力于把站起来的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配合军队作战,这样就形成了真正的人民战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武装割据”,从一开始就是把正规武装和民众武装结合在一起的。毛泽东指出:“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①边界的斗争不仅有正式红军的存在,而且还把民众组织起来,建立地方武装,如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在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每到一地,就立即组织民众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毛泽东深刻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②

人民解放战争之所以能迅速取得胜利,把解放区推向全国,主要历史经验之一,就是广泛而深入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参战,特别是解放区农民参战。人民群众踊跃参战,大大改变了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对此,周恩来指出:“在三年的人民战争的高潮中,两万万农民是最伟大的支持力量。”^③他们担负随军参战勤务和后方转运勤务。运送粮食、弹药,到战争第一线救运伤员。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在一定意义上说,是靠民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第二,加强地方武装训练是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条件之一。

把人民军队划分为正规野战军和地方军,是总结实战经验提出来的,是斗争的需要。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说明: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没有正规军队固然不行,但只有主力部队而无地方部队的配合也不行,同样不能取胜。地方部队的任务是坚守地区斗争,特别是在主力部队离开后,群众、民兵与敌人的斗争,更需要地方部队的配合,这是正规部队所担负不了的任务。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一再证明:凡民兵、游击队、武装工作队等地方武装组织得好的地方,虽被敌人暂时占领许多的点线,我们仍能控制广大乡村。凡地方武装薄弱和领导不好的地方,就给敌人以很大的便利。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512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8页。

要使地方武装能够更好地担负起坚守地区斗争的任务,必须加强地方武装训练。由于我们的地方武装长期处于敌军的包围中,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训练。因此,需要抓紧一切空隙练兵,特别是利用作战间隙着重练兵。不论野战军、地方军、民兵(指不脱产的组织起来的群众武装),都是如此。练兵项目,以提高射击、刺杀、投弹等项技术程度为主,提高战术程度为辅,着重于练习夜战。练兵方法,应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通过练兵运动,大大提高了地方武装和民兵的素质及战斗力,不仅稳固和推进了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而且有力地支援了野战军军事战略的展开。

(四) 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过程中,十分重视文化建设。建立学校和各种形式的夜校、学习班、识字班,开展识字运动,还出版各种报纸和书籍,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党和毛泽东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的方针和任务。

毛泽东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①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②。在文化建设工作中,毛泽东还提出了利用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指出:“为了造就革命的知识分子,为了发展文化教育,利用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服务,这是苏维埃文化政策中不能忽视的一点。”^③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结合抗日战争的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根据地文化建设的思想。强调,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文化建设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服从于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毛泽东还结合抗日时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阐述了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应该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等问题。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文艺工作者充分利用文艺作为武器,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①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

^②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

^③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思想,为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事业提供了理论指导,推动了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发展。

第四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一、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这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只占人口的少数,绝大多数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力量,是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的。无产阶级必须在种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民族的统一战线。毛泽东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正确处理统一战线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理论的重大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探索到了下列规律:

第一,由于中国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的。因此,无产阶级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应该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地保持之。

第二,又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下,它就会动摇变节。因此,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内容不能始终一致,而是要发生变化的。在某一时期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在内,而在另一时期则民族资产阶级并不参加在内。

第三,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的阶级。因此,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都是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在各个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锋芒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为了削弱敌人和加强自己的后备力量,可以同这样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建立可能的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之。

第四,在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并和无产阶级一道向共同敌人

进行斗争的时候,它仍然是很反动的,它坚决地反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发展,而要加以限制,而要采取欺骗、诱惑、“溶解”和打击等等破坏政策,并以这些政策作为它投降敌人和分裂统一战线的准备。

第五,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

第六,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者。

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斗争。一方面,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的错误。另一方面,则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看做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这里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如果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如果党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不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同样党也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败。所有这些,都是被中国革命的历史所证明了的。

二、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

斯大林曾指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既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

党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党参加了北伐战争,并已开始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还没有彻底了解其重要性,还没有了解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大革命失败后,党独立领导了土地革命战争。这时,党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武装队伍,已经学会了独立的战争艺术,已经建立了人民政权和根据地,已经能够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斗争形式同其他许多的必要的斗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并认识到,这种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党运用过去第一阶段中尤其是第二阶段中的武装斗争的经验,运用武装斗争形式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斗争形式互相配合的经验,形成了游击战争这种武装斗争的总概念。认识到,游击战争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

形式；认识到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中国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而以建立一支人民军队为主要的组织形式。毛泽东指出：“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为了反革命，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对于这点，我们应向他学习。”“外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领一部分军队。中国则不同，由于封建的分割，地方或资产阶级的集团或政党，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处在这样环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看清问题的中心。”^①面对着武装到牙齿的强大敌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而建立人民军队，无论从人力还是物力上来说，农民都是中国武装斗争最广大最深厚的力量源泉，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

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其他斗争形式也是不可缺少的。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斗争形式同城市工人的斗争、同农民的斗争、同妇女的斗争，同政治战线上的斗争、同经济战线上的斗争、同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同文化教育战线上的斗争、同除奸战线上的斗争等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才能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

三、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毛泽东指出，党成立以来中国革命三个阶段的历史经验证明，党的建设的过
程，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着，是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
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联系着的。党的幼年时期，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阶段，在这个阶段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的革
命积极性是非常之高的，因此使革命获得了重大胜利。然而这时的党终究还是
幼年的党，由于没有革命经验，缺乏深刻的革命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党的领导机关中占统治地位的成员，在这一
阶段的末期，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没能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受了资产阶
级的欺骗，而使革命遭到失败。党的建设的第二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
由于有了第一阶段的经验，由于对于中国历史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
的进一步理解，由于更多地学会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
党才在艰苦的斗争条件下，取得了重新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开辟人民政权、创
建坚强武装部队等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然而，仍是由于领导机关中的一部分人，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5~546、546页。

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的不了解,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使自己跃进了机会主义的泥坑,使革命事业屡遭危害,直至遵义会议才使党的建设真正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党的发展过程的第三阶段,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阶段。党凭借着过去两个革命阶段中的经验,凭借着党的组织力量和武装力量,凭借着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很高的政治信仰,凭借着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國革命实践之更加深入的、更加统一的理解,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并使党的组织从狭小的圈子中走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取得了伟大的成功。

总之,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

第四章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借鉴苏联等国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的实际,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创立了社会主义改造理论,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第一节 过渡时期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一、过渡时期的社会性质和主要任务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的社会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定位及社会特征有过明确的阐述。他指出,由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特殊形式,所以这个革命的第一步“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①。

建国初期,党和国家的有关文件以及领导人的讲话都肯定了我国过渡时期是新民主主义社会。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所致的闭幕词中,称我国当时处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并说:“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2、647页。

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①1953年12月,在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也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任务完成后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的社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建成社会主义,“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

1954年9月,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的报告中又指出:“五年以来的生活充分证明,由目前复杂的经济结构的社会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社会,即由目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我国应当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②这次会议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则明确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这里,鲜明地指出了当时我国的社会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社会。

依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的论述,当时我国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状况,亦十分明显地反映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质。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后,经过经济变革和改组,我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逐步建立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这些经济成分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其中合作社经济是社会主义或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一部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条件下也带有若干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作用,是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经济方面的社会主义因素。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充分体现了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特点,是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政治方面的社会主义因素。在这个历史时期里,“社会主义因素不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已经占居领导地位,但非社会主义因素仍有很大的比重”^③。

毛泽东在深刻剖析过渡时期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基础上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奋斗目标:“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他强调:“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2页。

③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1页。

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①与此同时,毛泽东又将变新民主主义国家为社会主义国家,与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一起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要完成的两大历史任务。他强调,为了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就必须变革生产关系,特别是要解决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问题。

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理论和实践根据的。从民主革命即将胜利到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提出,毛泽东对过渡时期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

(一) 毛泽东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的嬗变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刘少奇作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问题》的报告。当他讲到“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的政策是要不得的”“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时,毛泽东表示赞同。随后,又特别补充说:“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15年。”^②毛泽东当时的意思是,建国后要继续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使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在恢复的基础上得以发展,使新民主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逐步增加,等到条件基本成熟,再向社会主义转变。关于转变的时间,毛泽东最初的设想是15年。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大约需要15年到20年。同年9月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当党外民主人士询问毛泽东要多少时候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毛泽东回答说:大概要二三十年吧。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闭幕词中又强调指出: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是在很远的将来的事。可见,毛泽东在立国之初“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是真心实意的”^③。

这种认识后来发生了变化。1952年9月,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一五”计划时,毛泽东提出,我们现在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1952年10月,刘少奇率代表团参加苏共十九大,期间受毛泽东委托,于10月20日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请示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10月24日,斯大林接见中共代表团时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③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办法。”^①这次会谈的情况，刘少奇以电报的形式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这就更加坚定了毛泽东逐步过渡的决心。1953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了在湖北视察时同孝感地委负责同志谈话的内容，他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10年到15年走完”^②。至此，毛泽东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完成了从原来设想的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建设，将来“一举过渡”到现在即开始“逐步过渡”的变化。毛泽东在确立了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认识的同时，即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1953年6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随后，毛泽东在审批一些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时，又对总路线的内容的表述作了一些修改，使之不断的完善起来。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是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理论依据。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之间必然存在一个过渡时期，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过渡时期问题有许多重要的论述。从19世纪40年代末期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作者注：这时还没有为共产主义划分阶段）之间存在着一个过渡时期的设想。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恩格斯第一次提到“过渡时期”的概念，认为从私有制的目前状况到财产公有社会有一个“过渡时期”。1852年，马克思在给安年柯夫的信中，通过总结1848年革命的经验教训，第一次明确地将“过渡时期”与无产阶级专政联系起来。后来，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中，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等著作中，对这个问题都有论述。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明确阐述了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③与此同时，在这部著作中，他还根据经济成熟程度的不同，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区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他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④这就是说，过渡

① 引自《党的文献》2005年第1期，第10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5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

时期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变为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时期”，而在这里所讲的“共产主义社会”，则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方面说明，过渡时期的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思想；另一方面也说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实际上就是指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过渡。此后，对过渡时期应采取的具体政策和措施，马克思、恩格斯也作了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①，并同传统的所有制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指出：“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甚至设想过，如果条件允许，可以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解决从资本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过渡问题。

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的学说，并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革命转变理论。1905年，他在《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一文中指出：“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的条件下，可能是实行国有化；也可能是把巨大的资本主义地产转交给工人协会，因为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正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③在这里，首先，列宁强调了革命转变时期的必然性，即无产阶级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其次，列宁指出过渡时期的首要根本任务是“剥夺剥夺者”，逐步地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力的根本任务提到首位，以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再次，列宁认为过渡时期需要一个相当长时间，它有五个基本经济形态，即宗法式、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从俄国的具体实际出发，经过艰辛的探索成功地找到了一条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过渡时期理论。1918年，俄国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一是迫于国内外紧张的局势；二是列宁及其他领导人主观上企图通过这一政策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于当时的俄国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战争发挥了作用，但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危机。列宁说：“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8~499页。

③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0页。

们错了。”^①列宁在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反思的基础上,认识到小农经济占优势的俄国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只能采取迂回过渡的办法,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指出,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②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及俄国革命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验,为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客观依据

这是同我国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分不开的。

首先,没收官僚资本为国营经济本身即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并实际上成为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开端,而其迅速发展,又成为对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物质力量。由于现代工业的固定资产中官僚资本占80%,国家靠没收这一部分庞大资本建立起了在国民经济中起领导作用的社会主义经济。这就使得没收本身不仅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而且具有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成为对其他经济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决定意义的重大开端。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既是支持国家财政、稳定经济局势的主要力量,又是国家现有基础工业的主体。到1952年,国营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增加到56%,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已居于相对强大的地位。这使得国家有可能由此进行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任务的提出及其发展要求,便成为党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的一个基本依据。

其次,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既为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积累了经验,同时也直接成为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对民族资本主义严格执行了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在同资本主义经济反抗国家限制的不法行为作斗争以及调整工商业的过程中,创造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从而在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同时,加强了它们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的联系,引起它们在生产关系上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因而也就在不同程度上对它们进行了初步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也为党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提供了一定的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页。

^②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7页。

依据。

再次,土地改革完成后,党在农村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运动,这既为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积累了丰富经验,同时也实际上开始了改造的最初步骤。在农民分得土地后,为了解决分散经营的困难,使分散、脆弱的农业个体经济满足工业化对粮食及其他原料作物迅速增长的需要,并避免两极分化,党大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毛泽东认为,这些互助合作形式,不仅是帮助农民克服困难、发展生产的有效形式,也是防止农村两极分化、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适当形式。这就为党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提供了重要依据。

最后,新中国处于“一边倒”的国际环境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党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提供了契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即受到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朝鲜战争的爆发则使这种关系更加紧张。由于中国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军事威胁、经济封锁和外交上的孤立,只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争取支持和援助。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又具有很大的榜样作用。这样的国际背景必然会从外部催促着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因而朝鲜战争的停战能够为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提供重要的历史契机。周恩来在解释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原因时指出:“毛主席指导工作有一个原则,当一个任务完成了的时候,就要赶快提出新的任务以免松懈下来。我们现在就应该提出新的任务。”因此,“强调朝鲜停战这个原因是有一部分道理的”。他还指出:“中朝人民在朝鲜战争中的胜利把美国企图挑起世界大战的时间推迟了,这就不仅有利于促进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矛盾的增长,有利于和平民主阵营的巩固和扩大,有利于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中民族民主运动力量的增长,有利于世界人民的和平民主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我国进行建设工作。”^①可见,当时的国际环境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党提出开始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一个重要外因。

总之,党中央在顺利完成土地改革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以后,及时明确了新民主主义建设本身的实质就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而提出了从“一五”计划开始即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不失时机的、完全正确的。

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和实质

1953年12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6~107页。

习和宣传提纲》稿时，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了完整表述，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过渡时期总路线把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反映了经济落后的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性，体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思想。在“一化三改”中，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主体”，是逐步完成国家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和力量；三大改造是“两翼”，是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的必要条件。

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把我国国民经济从落后的技术基础上转移到现代化技术基础上来，奠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①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虽然我国工业总产值已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41.5%，但是，工业生产还是非常落后的。所以，毛泽东在1954年的一次谈话中又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立强大的工业基础和完备的工业体系，用先进的技术装备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各部门，才能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才能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才能保证逐步完成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改造，才能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创造社会主义在我国完全胜利的前提。

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把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把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必要条件。

首先，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土地改革的完成，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但是，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在整个农业中还占着绝对的优势。这种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同国家要求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之间形成了不可克服的矛盾：一是由于小农经济本身的落后分散和发展缓慢，不便于也无力使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不便于也无力兴修水利和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更无力抵御较大的自然灾害。同时，个体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由于缺少土地以外的其他生产资料和资金，为了生产和生活就必然重新借高利贷和出卖土地，因而会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页。

随时产生两极分化。为了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抵御自然灾害和避免两极分化,就必须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二是由于小农经济同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大工业不可能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势必影响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毛泽东强调指出:“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①因为,一方面工业的发展对农产品的需要量增大,而生产率低下个体农业经济满足不了工业方面不断增长的对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另一方面,工业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援助增强,而农业只有在形成合作经营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广泛地使用农业机械。同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大量资金的相当部分要从农业和轻工业的积累方面获得,轻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支持,而这一切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才能变成现实;三是对农业的改造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必要条件。实现农业的合作化,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就割断了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之间的联系,国家就可以依靠巩固的工农联盟去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断绝其取得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来源,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从而迫使资本主义经济不得不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个体手工业和农业情况相类似。总之,只有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才能解决这种落后生产关系同国家要求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其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解决当时国内主要矛盾的必然选择。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土地改革的完成,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经济上是具有两面性的,既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建国初,国家需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但它的发展也出现了不利于国计民生、破坏统一的国民经济和计划建设的消极方面。这就不能不发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在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之间,在资本主义企业 and 国家计划经济之间、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资本家与职工及全国人民之间的利益冲突越来越激烈。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使资本主义企业的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产品质量差、成本高、资金浪费。这不仅影响了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破坏了国家计划经济,而且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使工人生活也无保障。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这部分社会生产力就不可能获得充分合理的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不可能全部实现,就不能摆脱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旧中国那种贫穷落后的面貌。为了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7页。

经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为了解放生产力,给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创造必要的社会条件,就必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所有制的根本改造。

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一场消灭剥削制度的深刻革命。由于在过渡时期是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所有制同时并存,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只有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巩固国家政权。正如毛泽东所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①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又必须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总路线的主体或中心任务。他在另一次谈话中对此说得更为清楚:“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制扩大——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经过公私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②因此,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逐步地改变生产关系,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成为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以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根本目的。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一、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

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有一定的实践基础。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依据列宁对个体农民要经过合作社达到集体主义的思想,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建立了一些初级形式的初级合作社。土地改革后,一方面,由于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获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空前提高。加上国家对农业给以多方面的扶持和支援,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另一方面,由于小农经济本身所固有的落后、分散、狭小、力量薄弱等特点,农民在发展中又遇到了不少困难。如,缺乏生产所必需的牲畜、农具、肥料、种子等,无力抵御较大的自然灾害。解决农民生产中的这些困难,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有两条道路、两种办法:一种是旧的办法,旧的道路,让个体农民向富农高利贷者去借贷,去当雇工,出卖劳动力,廉价出卖农产品,结果就增加富农高利贷者、投机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1页。

商人的剥削对象,让农村资本主义泛滥发展。这就是让少数人发财致富,多数人破产贫困。这是旧道路,是让农村资本主义漫无限制泛滥发展的道路。另一条道路是新道路,是引导农民组织起来,靠大家互助合作的力量,再加上国家帮助来解决生产中的困难,结果就是大家富裕比较平衡的上升,也限制了富农的发展。这就是组织起来大家富裕的道路,同时也就是缩小富农的剥削范围,又限制了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组织起来互助合作的作用:一是帮助农民依靠国家帮助解决当前的问题,克服生产困难,减少自然灾害,促进生产;二是反映广大农民特别是广大贫下中农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三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纲领决定了: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后,党在农村的重要任务就在于领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原理和民主革命时期党在根据地领导农民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从中国农村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民主革命胜利后所取得的政治条件和物质基础,制定和实行了一整套适合中国特点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方针、政策,成功地实现了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一,不失时机地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建国初期,广大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二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党正确分析了农民小生产者的特点,认为:当时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不仅限制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如果任其自发地发展下去,必然会出现两极分化。因而,一方面强调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积极提倡组织起来,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党积极引导广大农民,使他们逐步地懂得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比起单纯的、孤立的个体经济有着极大的优越性,启发他们由个体经济逐步地过渡到集体经济的道路。

第二,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毛泽东指出,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坚持自愿、互利原则。农业合作化,是农民自己的事情,要让他们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觉悟,不能用强迫命令的办法,把他们拉进来。对于一切暂时还不想加入合作社的人,即使他们是贫农和下中农,也要有一段时间向他们进行教育,耐心地等待他们的觉悟。在合作社的指导方针方面,必须实行贫农和中农互利的政策,既不侵犯中农的利益,也不损害贫农的利益。必须采取说服、示范和国家帮助的方法使农民自愿联合起来,并不断显示出互助合作的优越性,以此吸引农民自愿参加。

第三,实行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所谓“积极领导”,就是各级领导机关要走在群众运动的前头,既不要太慢,也不能太急,要主动加强领导。所谓“稳步前进”,就是要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不能一步登天,不要使农民感到很突然。首先,号召农民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几户或者十几户为单位的互助组。

然后,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号召农民组织以土地入股分红,统一经营,实行一定按劳分配制度的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后,在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的基础上,号召农民进一步联合起来,使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实行按劳分配的高级社。采取这样逐步过渡的步骤,有利于使广大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提高社会主义觉悟,逐步习惯集体所有制的生活方式,对原有生活方式的改变不至于感到很突然,同时又可以避免因生产关系的急剧变革而引起农作物的减产。

第四,正确分析农村的阶级和阶层状况,制定并贯彻了一条正确的阶级政策。土地改革后,贫农雇农由于分得了土地、农具、耕畜,有半数人迅速上升为中农。贫农由占农村人口的60%左右下降到30%左右,中农由占农村人口30%左右上升到60%左右,我国农村出现了中农化的趋势。毛泽东从我国农村的实际出发,分析土改后中农在生产中的地位、生活状况和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把中农分为上中农和下中农;对下中农,又分为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对新中农中间的富裕中农,不作为依靠对象,把老中农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均作为依靠对象。这样,贫农和下中农一起,约占农村人口的60%到70%。解决了这个问题,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党在农村依靠农民的大多数和建立农村无产阶级优势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党制定并贯彻执行了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其他中农,由限制到逐步消灭富农剥削的农村阶级政策。这就调动了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农、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稳定和 educate 了中农,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富农和未改造好的地主分子对合作化的反抗,使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有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保证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顺利进行。

中国手工业生产历史悠久,高度发展。据统计,建国初期中国拥有2000万手工业者,手工业总产值相当于工业总产值的31%。简单意义上的手工业,就是主要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和服务业。科学意义上的手工业,应当包含三种不同经济类型的内容,即依附于农业的自然经济的手工业、生产小商品的个体手工业、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工业,主要地是指从事小商品生产的个体手工业,其次也包括了一部分依附于农业自然经济的手工业。党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类同。在方针上是“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对个体手工业者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通过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引导他们在自愿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在组织形式上,由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手工业生产小组,过渡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供销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逐步改变手工业的生产关系。在方法步骤上,采取从供销合作入手,再组织生产合作,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地把手工业的私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

总之,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触动的是传统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个体经济和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面对的是一个广大的劳动阶层和工人阶级最基本的同盟军。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是劳动者的私有制。他们的生产资料,是自己劳动的积累或者主要是自己劳动的积累,原则上是不能剥夺的。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只能通过合作化的道路,逐步把它们从个体所有制改造成为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有力地证明了党和毛泽东关于农业、手工业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并且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宝贵的财富。

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赎买”资产阶级的设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制定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崭新理论。

第一,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把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早就提出但未实现的设想。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实际,制定了对民族资本主义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胜利地完成了和平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使命,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和平“赎买”的设想变为现实,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仅在民主革命阶段具有两面性,并参加过民主革命,曾经是我们的同盟者。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也具有两面性,“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赎买政策,可以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方面,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可以使国家掌握更多的工业品与农民交换粮食和原料,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可以通过税收和企业公积金,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部分资金;可以通过避免因经济改造而引起经济上的破坏和混乱,使企业不停产,使工人不失业;可以吸收资本家科学管理企业的经验,提高我们的管理水平。

第二,采取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有关论述,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指出这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是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质,就是通过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页。

和平赎买的办法,而不是通过没收的办法,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变成社会主义公有制。赎买的办法,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前,采取分配利润(如“四马分肥”)的政策;全行业公私合营后,采取“定息”政策。同时对于那些有技术才能和管理企业才能的资本家,给予较高的薪水。为了使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创造了委托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这些形式,在产品归国家或国营经济所掌握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但在生产资料所有权、生产过程的关系或国家取得产品形式上是有区别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是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国家通过这些形式把原来落后、混乱、畸形发展、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引上社会主义改造的轨道。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是公私合营。国家在企业中占有一部分或大部分股权;国家派领导干部参加企业管理,实际掌握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企业的生产、财务和基本建设都列入国家计划。这种形式,使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除了资本家占有一部分股权和分享一部分利润外,已和社会主义企业十分接近了。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把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外部联系推进到内部联系,由流通过程进入到生产过程,使企业由半社会主义性质转变为基本社会主义和完全社会主义性质。

第三,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把原来的剥削者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二者是互相作用、互相促进的。我们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是使他们从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改造的方法主要以企业为基地,对资方在职人员和资方代理人采取“包下来”的政策,“量才使用,适当照顾”。既使他们人尽其才,各得其所,又使他们在企业内部同工人一起劳动、学习,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政治上把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通过这一系列工作,使绝大部分资本家都愿意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减少改造的阻力,并且使资本家利用他们所掌握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经营管理经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从而达到了既消灭剥削阶级,又实现了团结、教育、改造这个阶级的目的。把对资本家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同对企业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创举。

三、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经验

1953年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展开,到1956年底党在提前完成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任务的同时,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党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在改造生产关系的同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①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变革不适应工业化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是围绕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进行的,引导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者走集体化的道路,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目的都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要求,更好地发展生产力;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推进,又必然会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提供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党和政府所采取的每一实际步骤,总是力求使之与促进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而不允许对生产力造成破坏。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到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一五”计划的主要指标也提前完成,到1957年各项指标均超额完成。经过“一五”期间的大规模建设,我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已初步形成。实践证明,党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对于在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生产力发展,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推动社会进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采取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形式,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都采取了区别对象,用不同的办法积极引导、逐步过渡的形式。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党及时总结实践经验,创造出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等具体的过渡形式。这种从实际出发引导农民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渐进式的改造方式,一方面有利于克服小农经济自身的弱点,使农民认识到合作社在增加生产、抵抗灾害、防止出现两极分化的优越性,从而逐步地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逐步地改变小生产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有助于避免一些国家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的由于富农反抗,个别农民破坏生产资料而造成生产遭到破坏的情况。在手工业改造方面的逐步过渡,保护和促进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为手工业逐步进行技术改造创造了条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逐步过渡形式,有助于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避免了在改造期间可能发生的剧烈的社会震荡和经济破坏。总之,中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场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能够顺利地进行不仅没有对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破坏,而且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逐步过渡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采用和平的方式方法,解决了诸如实现社会变革与经济发展、和平过渡与消灭剥削制度这类通常难以解决的矛盾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进行社会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2页。

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①，“在我国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②。坚持用和平的方式进行改造，保证了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党和政府坚持自愿的原则，坚持用事实向农民说明，合作社可以使占农村人口多数的、在生产条件方面还有各种困难的贫农和下中农得到利益，至少不损害他们的利益，因而使包括比较富裕农民在内的绝大多数农民对合作化采取了拥护、比较拥护和可以接受的态度。手工业的改造有农业改造经验的经验，因而也顺利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则要复杂得多。党和政府没有采取对待地主的办法对待民族资本家，而且坚持用和平赎买的方式，对民族资本家不仅支付定息，安排工作，而且采取了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重视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经常组织他们参加各种学习，引导他们参加各种政治实践活动，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前途的教育，使他们自愿接受和平改造，进而保证了改造的顺利进行。

毋庸讳言，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出现过一些失误和偏差。这主要是“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粗糙，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③。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比较复杂，有工作指导上的原因、也有认识上的一些因素。这些问题相对于社会主义改造所取得的成就来说是次要的，我们不能因为出现问题就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意义。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根据中国特点，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与和平赎买政策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用逐步过渡的形式改造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使社会生产力继续得到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创造。

第三节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初步确立

中国在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原来贫穷落后的国家能不能跨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以毛泽东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③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

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和革命转变的理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及时提出并实践了适合我国国情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创立了反映中国特点的过渡时期理论,成功地解决了如何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引导我国人民胜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艰巨任务,顺利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伟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伟大成就。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短短的7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就在一个东方大国胜利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转变。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具备了许多历史条件的。

第一,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建立为实现社会主义奠定了可靠的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因此,当民主革命胜利时无产阶级已取得了全国的政权。新型政权的建立为转向社会主义打开了大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经历了28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国后,通过抗美援朝、土地制度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和其他各项民主改革运动,以及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人民民主专政得到了巩固,这就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政治基础。

第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建立,为实现社会主义奠定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建国后,党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管制、征用和收购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建立起了强大的国营经济。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经济基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已占绝对优势,完全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

第三,在长期的民主革命斗争中,党就不断地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前途的教育,为胜利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提供了思想条件。为此,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民、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自觉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第四,在民主革命斗争中,党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培养了大批能治党、治国、治军的干部队伍,为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作了充分的组织准备。

第五,中国人民对工业化、现代化的深深向往是选择社会主义的主观因素。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富强的必然要求和必然趋势。旧中国是一个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落后的农业大国,落后就要挨打,这是近百年来中国屈辱史的真实写照。近代中国人民面前的重要任务是工业化、现代化问题。实现工业化,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主要靠从农业积累资金、获得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这就必然加剧与农民的矛盾。为了解决农工矛盾、积累资金、保障国家工业化,客观上必然要求加

快农业集体化步伐。

第六,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领导地位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这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历史性胜利,使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占绝对优势。据统计,1956年国民经济总收入同1952年相比,国营经济的比重由19.1%上升到32.2%,合作社经济由1.5%上升到53.4%,公私合营经济由0.7%上升到7.3%,资本主义经济则由6.9%下降到0.1%以下,个体经济由71.8%下降到7.1%。在工业总产值中,社会主义工业由56%上升到67.5%,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由26.9%上升到32.5%,资本主义工业由17.1%下降到接近于零。社会经济结构的显著变化表明,几千年来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剥削制度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

与此同时,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和提前完成,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一定程度。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3%,年均增长18%。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比1952年增长210%,年均增长25.4%;消费资料的生产比1952年增长83%,年均增长12.9%。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旧中国重工业过分落后的面貌有所改变。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基础工业部门和大中型工业企业相继建立起来,工业技术水平和工程设计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一个独立的部门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立了起来,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也有明显的改善,1957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比1952年提高1/3强,其中,职工平均消费水平提高38.5%,农民提高27.4%。

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基本建立的同时,我国的政治领域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也已经确立和巩固起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亦得到了确立。这一切表明,中国已经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我国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及社会生活其他领域基本确立,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国家的历史和党的历史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20世纪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巨大变化,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这个历史性胜利,使我国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由个体农民转变为社会主义劳动者;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已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知识界已经组成一支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广大劳动人民从此摆脱了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成为掌握生产资料的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以及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

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的重大意义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制度条件,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极大地提高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致性和能够在经济落后条件下尽可能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我国初步建立了一个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我国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在世界的位次都明显提高。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离不开选择并且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从此中华民族开始在新的起点上步入伟大复兴的征程。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和生产资料的主人。这是中国几千年来阶级关系的最根本变革。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极大地巩固和扩大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

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使占世界人口 1/4 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又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胜利。它进一步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增强了社会主义力量,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自己艰苦卓绝的努力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其他相对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经验,对这些国家的人民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正确运用和创造性发展的结果。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不仅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而且以其独创性的理论原则和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①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页。

第五章

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探索,即如何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探索,是同如何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联系着的,也是同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紧密联系着的,既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要价值的积极成果,也发生了一些失误,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和外交国防等方面所提出的一系列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思想、方针、政策,为在中国这样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第一节 人民民主专政理论

一、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创造性地提出了适合中国特点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建立并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人民民主专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但还不具备运用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来解决中国政权这一重大问题的水平,只是照搬了苏联共产党的做法而提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最早涉及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的是蔡和森,他在1920年8月13日给毛泽东的信中指出:“我现在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

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①这一论述初步阐明了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党的“一大”曾把社会主义革命当作首要目标和任务,并原则性地规定了党应“采用无产阶级专政”,这表明党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和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还缺乏深刻的认识。经过一年的实践、探索,中共“二大”宣言在提出民主革命纲领的同时提出了“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主张。随着国共合作的建立和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于1925年11月在《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中提出了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②的思想。次年1月,毛泽东又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提出中国革命的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③。这些提法表明,毛泽东等人已初步意识到,中国民主革命要建立的政权,既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统治”或“合作统治”。这是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的最初萌芽。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由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破裂,民族资产阶级曾一度脱离革命,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了土地革命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的思想。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主张,井冈山根据地的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党领导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其他根据地先后建立的政权,有的叫工农民主政府,有的叫苏维埃政府。在此基础上,1931年11月于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并制定了根据地的第一部宪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其他一些法律文件。1934年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进行了修订,对工农民主专政国家的性质又作了具体阐述,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是工农的政府,实行工人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对于工农和广大民众是广大的民主,对占有人口中极少数的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和资产阶级的专政。明确指出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内容,明确了对什么人实行民主和对什么人实行专政的问题。工农民主专政是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后,鉴于国内主要矛盾和阶级关系的新的变化,毛泽东指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

① 《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0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

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①为了适应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团结各方面力量共同抗日,党在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批驳了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把“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改为“人民共和国”的口号。1936年8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又将“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这两个口号形式虽略有不同,实质却是一致的。它们和工农民主共和国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扩大了参加政权的阶级和阶层的范围,这个政权里不仅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也包括可能参加抗日的亲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它的实际意义在于强调我们所要建立的民主共和国,“应该是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盟的国家,而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②。

1939年5月,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第一次明确地把“建立人民民主主义制度”看做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步。他指出:我们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随后,毛泽东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全面深刻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方案。他指出: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之后,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中,“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他们必然要成为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力量。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既区别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又区别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而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所采取的过渡的国家形式。但由于国民党坚持其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这个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没有能够建立起来。

抗日战争时期,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三三制”政权,即在这个政权中,共产党员、非党进步分子、中间派别各占三分之一。就“三三制”政权的性质来说,它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阶段的具体形式,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因此,该政权的施政方针应体现抗日和民主两大精神,“应该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真正的汉奸和反动派,保护抗日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生活,为基本出发点”^③。它施行的各项方针政策,必须照顾一切抗日阶级和阶层的利益。为了保证“三三制”政权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必须坚持党对政权的领导权。“三三制”政权的理论与实践对于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26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0、751页。

形成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毛泽东认为“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①。

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针对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代表各阶层人民的民主要求，适时地提出了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广泛响应。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系统阐述了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更明确地指出，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一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中国也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而只能“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②。党和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构想和实践，为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和丰富的实践基础。但是，由于国民党统治当局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民主联合政府未能组成。

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建立新中国的问题，更加现实地摆到中国人民的面前。中国共产党从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根据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主张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毛泽东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中，首次提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并强调说：“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③。不久，他又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中，明确指出要“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并强调这样才能造成“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④。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再次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同年6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总结了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阐明了在我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历史必然性，系统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性质、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政权组织形式、民主与专政的关系、国家的内外政策及发展前途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他深刻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5、1056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5页。

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①《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正式形成。

人民民主专政在全国范围内的确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伟大成果,也是实现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利用已经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针对当时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复杂局面,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清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以及抗美援朝等一系列大规模的政治运动,镇压了国内阶级敌人的反抗,阻止了帝国主义的颠覆和侵略,从各方面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保卫了革命的胜利成果。随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又为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基础。

1956年,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后的新形势,指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经济和文化,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要从大规模的群众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文化建设上来。随后,毛泽东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学说,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遗憾的是,1957年以后,由于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的影响,党在执行人民民主专政任务的过程中,也曾发生严重的失误,并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使人民民主专政受到严重伤害,社会主义事业蒙受了重大损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建国以来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准确完整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继承和发展。

二、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具有丰富的内容。

(一) 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权

人民民主专政作为“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②存在着广泛的政治联盟。这种统一战线性质的联盟,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即工人阶级同其他劳动阶级主要是农民阶级结成的联盟,以及工人阶级同一部分非劳动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的联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主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各民主阶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6页。

级的联合专政,它代表的利益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属于新民主主义类型的政权,这个政权仍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阶级的联合专政。因为工农这两个阶级占了全国人口的80%—90%,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主要靠这两个阶级的力量;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也主要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工农联盟在国家政权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尽管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工人阶级的队伍迅速壮大,但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仍比较小,离开工农联盟,单靠工人阶级是不能形成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巩固的统治的,离开了工农联盟也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建国初期,我国社会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内部还包括劳动阶级同非劳动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而且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都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它们之间的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人物参加了国家政权和国家政治生活,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决定着这个阶级不能充当领导者,也不是基本力量。这个时期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仍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制度。为此,毛泽东指出:“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①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以后,组成国家的各阶级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不复存在,原来属于剥削阶级的大多数人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们作为人民的一员享有宪法规定的各种民主权利。原来的两个联盟发展成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联盟还包括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在内。尽管人民民主专政在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和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在实质上担负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消灭阶级,并按照新方式组织社会。但是,它并不排斥各民主党派的存在和参加国家的管理。相反,却十分重视加强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爱国华侨和宗教界爱国人士的合作,注意在重大问题上与他们协商。各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并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

广泛参与了国家事务的管理。各民主党派的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在国家各级政权机关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仍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并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权。

（二）人民民主专政是民主与专政的统一

任何国家的政权都包括民主和专政两个方面，即在统治阶级内部实行民主，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也不例外，正如毛泽东所说：“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①人民民主专政作为一种国家制度首先是民主与专政的统一，所不同的是这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和新型的专政，即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实行民主，对极少数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特征之所在。“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提法本身不仅从实质上而且从概念上确切地表明了我国政权的阶级本质和民主性质。

人民民主专政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由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劳动群众共同享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支配权，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广泛的民主权利，并在此基础上行使管理国家各项事业的权力；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加以解决，并使民主成为人民群众进行自我教育的方法；人民的国家要保护人民的利益和权利不受侵犯。同样，人民民主专政作为一种新型的专政，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对极少数人民的敌人的专政。从专政的意义上说，也是暴力和压迫的工具，就是要剥夺剥削者所占有的生产资料，消灭他们的经济基础；在必要的情况下剥夺他们的政治自由，坚决镇压和依法惩处他们的一切反革命活动。当然，对于反动阶级，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要给他们以出路，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对外方面，人民民主专政还担负着防御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入侵的使命。总之，“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②。人民民主专政的民主与专政两个方面是并行不悖、辩证统一的，二者既互相区别，又互相依存，缺一不可。只有在人民内部实行广泛的民主，充分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才能更好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敌人，对他们实行有效的专政。也只有对反动派实行专政，粉碎他们的一切反抗和破坏，才能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历史的经验证明：“只有绝大多数人民享有高度的民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

才能够对极少数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只有对极少数敌人实行专政，才能够充分保障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权利。”^①民主与专政是互相联系，密切结合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持民主与专政的统一。把两者割裂开来、或者对立起来都是错误和有害的，那种认为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会妨碍发扬民主，甚至是不民主的看法，是片面的，是对人民民主专政本质的歪曲。

（三）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任务

毛泽东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任务是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使国家归于消亡，实现共产主义。也就是说，人民民主专政担负着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和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双重任务。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毛泽东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和具体任务：一是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主要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对内镇压已被推翻了的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反抗。打击各种犯罪分子，并尽可能地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以保卫革命和建设的成果。对外防御帝国主义的破坏、颠覆和侵略，保卫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二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三是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吸引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组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教育，发展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型社会关系。四是组织和管理社会主义经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缩小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逐步消灭阶级赖以存在和重新产生的条件。

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任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一般说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动统治。在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建立的初期是剥夺剥夺者、镇压反动阶级的反抗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人民民主专政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和管理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人民民主专政的主要任务已是进行经济文化和民主政治建设。但专政的职能仍是不可缺少的，专政的使命并没有完结。因为我们还处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帝国主义和敌对势力还会对我国进行侵袭和破坏，由于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清除干净，社会上还存在着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和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国的经济和文化还比较落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还不可能防止某些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3页。

社会成员的腐化变质,不可能杜绝极少数腐败分子和敌对分子的产生。尽管同这些人的阶级斗争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也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绝不能因此而削弱了国家的专政职能,如果“只有人民内部的民主,而没有对破坏分子的专政,社会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功”^①。

(四) 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它的国体和政体,国体指的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讲的是国家性质问题。政体讲的是统治阶级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形式来实现自己的统治和行使国家的权力,讲的是政权组织形式问题。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在选举方法上“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②。这一思想为在我国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成为体现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同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相适应的,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政权的组织形式只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因为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制度,消除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人民群众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可以统一行使自己的国家权力;也只有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能体现各阶级、各阶层和各民族在国家中的地位,便于实现最广泛的民主,吸引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同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的。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广大的劳动者成了生产资料的拥有者,他们的基本经济利益是一致的,不存在不同势力之间的利害冲突。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和某些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完全可以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逐步加以解决。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一是它充分体现了人民权力的至上性和全权性,便于人民当家作主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在我国,人民群众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的权力具有至上性和全权性,与此相适应,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机构中处于领导国家行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页。

政、司法等权力执行机关的最高权力地位,它是直接行使国家立法权并同时领导和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全权机关,它的地位和权力高于其他一切国家机关。人民代表大会权力的至上性和全权性,既是人民权力至上性和全权性的制度体现,又是人民权力至上性和全权性实现的保证。二是它能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正确处理国家权力的统一和分工的关系。在由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前提下,各个国家机关合理分工,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根据人民的意志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发挥职能作用。实行民主集中制,既能保证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又能保证国家权力的统一,便于在民主的基础上有效地处理国家事务。三是它具有议必能行和议行一致的优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按照议行合一原则建立起来的,它既是立法机关,又是领导国家行政和司法等权力执行机关的最高权力机关,它责成行政、司法等机关在工作中贯彻执行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和作出的决议。这种议行合一的制度,可以在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之间,实现议必能行和议行一致。这样,就能确保人民的意志既能得到国家立法机关的立法肯定,又能得到国家执行机关的实际执行。四是它可以实现人民代表大会对其他国家机关的有效监督。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人民代表大会与行政和司法机关是领导与被领导、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不是互相监督的关系,这就能够确保人民代表大会监督职能的有效实行。

总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同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相适应的,体现了我国政治力量的源泉,是我国能够经得起各种风险考验的可靠保证。

(五) 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和特征

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肩负着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两个阶段的历史使命,它作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工具,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带有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因素,这主要表现在:它是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它已经把推翻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官僚资本主义作为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它是向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过渡性的政权;它在国际上居于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等。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和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政权性质问题的指示》中指出: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并无本质区别,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则更为明确地指出,我国现阶段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①。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也说:“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5页。

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①1982年通过的新宪法规定: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之所以说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因为:从领导力量方面看,人民民主专政是由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来领导的,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标志;从经济基础方面看,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都是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联系的,都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并为之服务的;从阶级基础方面看,两者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而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从基本职能方面看,两者都是新型民主和新型专政的国家,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这两方面的结合;从历史任务方面看,两者都担负着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镇压国内外敌人的反抗或侵略,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认为,由于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不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人民民主专政作为中国化的无产阶级专政,在理论体系上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

首先,从政权的阶级结构看,它科学地表明了我国的阶级状况和阶级关系。巴黎公社委员会是由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所组成;苏维埃政权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权;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不仅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包括民族资产阶级。这样,工人阶级不仅同其他劳动阶级主要是农民阶级结成了巩固的联盟,而且还同一部分非劳动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结成了联盟,从而使政治联盟的范围更为广泛。这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随着我国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原来旧的两个联盟被新的两个联盟,即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联盟,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联盟所取代,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仍是工农联盟。因此,无论过去和现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都适合我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反映了人民民主专政在政权的阶级结构上具有广泛的基础。

其次,在概念表述上,它鲜明地体现了国家政权是人民民主和人民专政的有机结合。人民民主专政直接表明了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这两个方面的统一,突出了两者的相互结合和人民民主这一主体。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形式上直接表明了我国政权的性质、内容和职能,特别是极其鲜明地体现了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权中当家作主的地位,有利于防止在执行和理解上的片面性。

最后,从政党关系上看,在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存在着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国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页。

时期一直与共产党存在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他们承认和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而是参政党。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指导下,与共产党密切合作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

了解人民民主专政的这些特点和优势,有利于认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职能和历史地位,有利于正确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和实践,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三、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及其指导下的伟大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第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构成形式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建立在对当时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状况和阶级关系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他们认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①。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导致资产阶级统治的被推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革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后建立的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占人口的比例如何,是他们研究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构成形式即由哪些社会成分、阶级、阶层的代表参加国家政权的重要依据和出发点,根据这些国家无产阶级所占人口比例的不同情况,他们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统治”,即无产阶级单独建立和掌握政权;一种是“间接统治”,即无产阶级联合农民、小生产者建立和掌握政权。他们认为,在英国可以直接建立这种统治,因为那里的无产者现在已占人民的大多数,“在法国和德国可以间接建立,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不仅是无产者,而且还有小农和小资产者”^②。列宁正是从俄国无产阶级占人口少数这一情况出发,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③,并明确提出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产阶级在人口中的比例比俄国还要少得多,农民占到全体人口的80%以上,作为剥削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参加了国家政权。毛泽东正是从中国这个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

③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2~363页。

世界上人口最多而无产阶级人数较少的情况出发,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它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两种形式相比,同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相比,在政权组成的阶级结构上和它所压迫的对象上,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权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处理上,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很明显,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间接统治”和列宁关于“特种联盟”形式思想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第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内涵和职能的科学表述。把无产阶级专政看做是民主与专政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①列宁也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②。可见,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无产阶级掌握和领导的国家政权,在阶级关系上,本来就包括民主和专政两个方面的职能:在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反动阶级实行专政。但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本身只标明了“专政”,而没有标出“民主”,这使人们不容易一目了然地理解它所包含的内容和职能,容易在实践中产生误解和偏差。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概念作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专政方面的结合,不仅明确地把民主与专政这两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表示出来了,而且鲜明地体现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从而补充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的表述,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实践证明,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是科学的,已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人们从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中,很容易理解我国政权的性质、内容和职能。这就有利于在实际工作中防止误解和片面性,有利于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有利于消除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实现国家政治的民主化。

第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内部政治联盟和党派合作的理论。巴黎公社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由于种种原因,它没有建立起工农联盟,因而不是巩固的和坚强有力的。十月革命以后,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政权的建设过程中,十分重视建立工农联盟。但由于俄国资产阶级敌视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因而不存在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政治条件。毛泽东在领导人民民主政权建设中,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不仅建立了巩固的工农联盟,而且又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了联盟,从而扩大了联盟的范围,使人民民主专政成为一个更为广泛的阶级联盟。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过去的两个联盟又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联盟以及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0页。

们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联盟。长期以来人民民主专政内部两个基本联盟的存在,使它在政权的阶级结构上具有更为广泛的基础,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个新贡献。

与此同时,在人民民主专政内部还存在着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民主协商制度。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并不排斥其他民主党派的存在和他们的代表参加国家管理。新中国成立后,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成员参加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工作,并担任了重要职务。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后,毛泽东又提出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从而奠定了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创造性贡献。俄国十月革命后,资产阶级政党和其他政党都因反革命面目的暴露而退出了历史舞台,只有“左派”社会革命党同布尔什维克党合作了一个短暂的时期,但不久“左派”社会革命党又发动了叛乱。于是,苏维埃政权形成事实上的“一党制”。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践证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它根本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也有别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它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创造,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第四,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任务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时认为,它是组织和管理社会主义经济与文化建设事业的工具,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必须采取各种措施,组织和管理经济文化事业。从《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中列举的许多“措施”来看,其任务既有社会主义改造,也有社会主义建设,既有经济方面的建设事业,也有文化方面的建设事业。列宁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担负着镇压剥削阶级反抗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双重”历史使命,而且是“二位一体”的任务。同一般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相比,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承担着更为艰巨复杂的任务。首先,由于旧中国的生产力极端落后,人民民主专政担负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任务异常艰巨。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的的高度发展为社会主义准备了物质前提,那么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则要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利用政权去创造。因此,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最基本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指出:“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①其次,由于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

我国是一个经历了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缺乏民主观念和民主传统。肃清封建主义思想遗毒,进行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乃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最后,由于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大多数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样的国度里消灭工农差别,是人民民主专政面临的又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同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任务相联系,人民民主专政不仅存在于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时期,而且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曾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过渡性政权,它只存在于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这个革命转变时期。后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又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有国家在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①。斯大林根据苏维埃政权的实践经验,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需要保留无产阶级专政和全部国家机器,但“它们的矛头已经不是针对国内,而是针对国外,去对付外部敌人了”,因为国内“剥削制度已被消灭,剥削者已不存在”,所以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武力镇压的职能已经消灭了,消亡了”^②。

历史事实表明,斯大林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消灭是正确的,但他由此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对内镇压的职能也消失了,则是错误的。事实上,消灭剥削阶级的残余比消灭剥削阶级更困难,更需要时间。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不仅是对付国外敌对势力的需要,同时也是国内阶级斗争的需要。它不只是为了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更重要的是为了组织经济文化建设,尽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逐步创造条件。所以,在我国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人民民主专政在我国现阶段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

第二节 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

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阐明了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及其在一些社会形态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运动形式,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因和基本规律,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

^①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2~363页。

^②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705页。

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着其他一切社会矛盾的发生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和根本原因,其中,生产力的运动始终是基本矛盾运动的起点和终极原因;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状况,是基本矛盾运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指出:社会化的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①,通过对这种矛盾的分析,论证了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提供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具体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只提出过社会主义社会在城乡、工农、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还会存在着一些差别的观点。列宁提出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消失,矛盾仍将存在”^②的观点。但由于他经历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短暂,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规律还不可能进行系统的阐述。斯大林则长期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是完全适合的,认为精神上 and 道义上的一致是苏维埃社会发展的动力。晚年时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虽然有所变化,但没有把它当作根本性问题提出来。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认真总结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科学分析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状况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特别是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加以分析。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分析了它的性质、特点和解决方法等,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

第一,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③这一论断,科学地揭示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历史进程及其发展的基本动力,同时也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的客观实际情况。

第二,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特点。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④,它是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8页。

② 《列宁全集》第60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1~282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经济基础基本适应条件下的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因而它不是对抗性而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这样就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与旧社会的基本矛盾在本质上严格区分开来。毛泽东高度概括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具有“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特点。他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①,它主要表现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此外,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也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是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矛盾的。

第三,提出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途径和办法。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②。这就是说,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需要运用社会革命的方法,更不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力量,依据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要求,依靠人民群众的实践,自觉地、有秩序地对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方面、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方面进行调整和改革,使之更好地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所以,相对于解决旧社会基本矛盾所采取的剧烈的阶级斗争的方法,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方法,从总体上说,是一种和平的、渐进的、非对抗性的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

第四,初步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不断运动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前进的基本动力。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它贯穿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始终,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③。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215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214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216页。

基本矛盾的理论,冲破了“社会主义无矛盾”传统观点的长期束缚,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运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改革、自我完善奠定了理论基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理论,他说:“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①。

二、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

正确分析和判断基本国情,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是党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本依据。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我国的国情和主要矛盾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样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作出了许多正确的论断,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

第一,关于我国的社会性质及其发展阶段的认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巩固、不完善。毛泽东多次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但又很不完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中也存在着薄弱的环节。毛泽东还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全建成和完全巩固,不仅需要时间,而且需要国内外的各种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使生产力获得较充分的发展,这样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获得稳固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后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划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的思想,认为中国目前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些思想为后来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探索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示。

第二,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基础和艰巨性的认识。建国后,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在这样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任务是极其艰巨的。在经历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毛泽东对此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他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182页。

不行的。”^①毛泽东的这个估计是基本符合我国实际的，它为党和国家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规划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

第三，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论断。党的八大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阶级关系的变化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对国内主要矛盾做了总体上比较准确的判断。八大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大力发展生产力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也阐述了同样的思想，他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将会长期存在，“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②，要求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以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时期毛泽东还曾提出过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我国正处在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转变时期”。历史证明，这些观点都是基本正确的。对我国国情和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是党和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的重要思想成果，也是这一探索的基本立足点。

三、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极其敏锐地注意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变化，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学说。

第一，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毛泽东强调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③敌我矛盾是根本利益对立基础上的矛盾，因而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农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矛盾，等等，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205页。

致基础上的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但又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可以互相转化。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但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我们的任务是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要以极大的精力正确处理好已经居于主导地位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要创造主客观条件促使矛盾向好的方面转化,而不是相反,以便把广大人民坚强地团结起来,建设好我们的国家。

毛泽东指出,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①所谓用专政的方法解决敌我矛盾,就是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而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必须让人民参与政治活动,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

第二,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

毛泽东认为,由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复杂多样的,所以,在运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针对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在不同领域的具体表现,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原则和方法:对于政治思想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采取说服教育、讨论的方法;在经济方面,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在人民群众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上,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努力克服官僚主义,同时也要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教育;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自由讨论和科学实践、艺术实践去解决;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实行民主平等、团结互助的方针,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等等。所有这些方针,都是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总方针的具体体现,为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大量存在的不同形式的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正确的途径和思路,对当前正确处理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三,明确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以及党和国家根本任务的变化,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使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成为关系社会主义成败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212页。

的一项极其艰巨复杂的历史性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伟大任务,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依靠全体人民的共同奋斗。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①他还强调说,十种关系,都是矛盾,我们的任务就是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而目的正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又以更宽阔的视野,即从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他明确地说,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目的在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因此,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是符合我国实际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②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特别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思想,为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提供了直接的思想理论根据,也对当前正确处理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

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和指导方针

所谓经济发展战略,是指一个国家依据自己的具体国情与条件所制定的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经济发展的全面性整体性的规划,包括预定达到的战略目标 and 为达此目标而采取的战略步骤、战略重点和实现途径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依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在实践和探索中逐步确立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党和毛泽东制定了一系列指导方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和 development 步骤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设想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并预言,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快的。新中国的建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在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开始了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逐步清晰并最终得以确立。1952年,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提出了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1954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提出了“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①的目标。与此同时,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任务,这是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最初提法。1956年1月,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又论述了科学现代化在整个经济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并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②,从而形成了对“四个现代化”的完整表述。1963年1月,周恩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建立一个富强的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在1964年底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向全国人民宣告了一定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宏伟目标。至此,党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设想基本形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指示了明确的奋斗方向。

与此同时,党中央还逐步明确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时间和步骤。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时间的估计,毛泽东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多次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问题,并提出了用50年到100年的时间,实现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设想。1955年3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①同年10月，他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重申了上述看法，但稍稍作了一点变动，认为中国“大约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的时间内，就是十个五年计划到十五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6年9月，毛泽东又提出“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②。1958年“大跃进”运动之后，毛泽东等开始重新冷静地思考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问题。1960年10月，他在同斯诺谈话时说：“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③对于这个问题的估计，这时他重新回到了1956年至1957年时期的看法。他在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④毛泽东的这个估计是比较客观和符合中国实际的，他为我们党当时乃至后来制定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规划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关于实现现代化的步骤，党中央和毛泽东经过长期的思考和酝酿，于1964年12月，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即第一步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力争在20世纪末，使我国工业和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这是我们党最早提出的我国经济建设远景规划的蓝图。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两步走”的战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充分肯定毛泽东、周恩来在设计中国现代化目标方面所作的贡献。他指出：“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和目标”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生前提出来的”，并对我国现代化目标作了修正和补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

（二）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和统筹兼顾的方针

党的八大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又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这两个方针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其基本精神都是要求国民经济能够符合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健康地快速发展，因而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

这一方针的主要内容，一是要重视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使国民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217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

经济计划尽可能地反映这一规律。毛泽东说：“不以规律为计划的依据，就不能使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的作用发挥出来。”^①也就是说要在正确认识按比例规律的基础上来制定经济计划，使计划合乎规律。二是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的实际出发，正确处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大部类生产的关系，即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国家、集体与个人三者利益之间的关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等；做到既要顾全大局，突出重点，也要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综合平衡。三是把国民经济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同时又要注意使计划有一定的弹性，并在实践中及时进行必要的调整。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我们对必要比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②四是做好财政、信贷和物资的平衡，这也是整个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五是按照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都要兼顾的原则，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使二者保持适当的比例，进而求得生产与需求间的平衡。毛泽东强调指出：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的矛盾，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需要人们时常通过国家计划去调节。六是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与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发展速度的确定既要考虑需要，更要考虑可能；既要高速度发展，更要按比例发展。七是在全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基本平衡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和统筹兼顾方针的基本精神，就是使国家的经济计划和国家对经济建设的领导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这一方针本身就是对经济规律的一种正确反映。因此，这一方针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方针。

（三）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主体和基础。实现工业化，就是通过发展现代工业，使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绝对优势；建立一个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不仅能够制造人民生活必需的消费品，而且能够制造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主要机器设备，为实现农业、交通运输、国防的现代化创造必要的条件，并最终建成工业化的国家。世界上所有现代化的发达国家都是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已经提出来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个目标。解放后，党又把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同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列，作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提上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页。

了日程。当时制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的经济建设较多地照搬了苏联的发展模式,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如过多地强调重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影响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造成一定程度的比例关系失调等。与此同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缺点错误,在苏共二十大后也大量地暴露出来。这一切促使我们党开始思考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这一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明确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概念。毛泽东在总结我国一五期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在分析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错误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到,中国的工业化不能再走苏联那种片面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片面注重积累和基本建设,忽视人民生活的老路。他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①他反复强调学习外国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②。毛泽东提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概念,从根本上说,就是强调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依据中国的国情进行工业化建设,要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走适合中国情况的自己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为我国的工业化建设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而且也为全党提出了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任务。

第二,比较完整地阐述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基本内涵。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发展重工业主要是解决实现扩大再生产的问题,是实现工业化的必要前提。而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主要是解决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它们之间既有矛盾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是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比例关系。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就基本解决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因此,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基本内涵就是:适当调整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例,在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基础上发展重工业;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

明确提出必须以工业为主导,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又强调必须以农业为基础,把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中国工业化道路最核心的内容,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也是区别于苏联模式的最主要的特色。一方面,不优先发展重工业,就不可能彻底摆脱贫困和落后;另一方面,又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毛泽东强调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农业与工业关系极为密切,对工业发展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农业不仅为工业提供粮食、原料和市场,而且还可以为工业积累资金。没有农业就没有工业。所以,“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这就是说,在确保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对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多发展一点农业和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并不会影响重工业的发展,反而会使其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更为密切,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在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如果农业有了更大的发展,轻工业相应地有了更多的发展,重工业就有了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资金,就会更快地发展。所以毛泽东说:采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些,但实际上“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①。

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深刻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苏联模式的束缚,对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也为后来党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材料。

二、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各种关系

建国初期,我国的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经验,较多地照搬了苏联的发展模式,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集中体现为一定程度的比例关系失调。党中央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中的各种关系的思想,这些思想集中反映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成为党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

(一)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比例关系,它实质上是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中所讲的两大部类的生产即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多次强调“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明确地表达了党处理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比例关系,是社会生产正常进行和不断扩大的基本前提。为此,就必须以重工业为经济建设的中心和主导,同时注意适当调整重工业和轻工业、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农业的投资比例。

(二)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实际上是生产力布局的问题。旧中国留下的工业发展布局极不合理,约70%的轻、重工业集中在沿海城市,内地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新中国成立以后,从合理布局和国防安全出发,对沿海地区搞新的基本建设控制得比较严,新建设项目主要放在了内地,难以发挥沿海工业基础比较好的积极性,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不利影响。对此,毛泽东提出了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原有工业,以平衡工业建设布局的方针。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内地工业,“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①,使工业建设布局逐步趋于平衡,有利于充分利用内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工业生产企业靠近原料、燃料产地和产品市场,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有利于调动地方建设社会主义、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有利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增强民族团结;有利于巩固国防。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由于沿海工业城市具有地理位置优越、技术力量雄厚、生产成本较低、协作面广等优势,因此,内地工业的快速发展又要依赖于沿海工业。毛泽东指出:“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②

(三) 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

发展经济与加强国防存在着既统一又矛盾的关系。一方面,经济的发展是国防的基础,而强大的国防又是发展经济的必要保证。另一方面,国防开支过大,势必影响经济建设的发展,而国防的削弱又无法保证经济建设的正常发展。所以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必须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对此毛泽东提出了以下一些观点:其一,必须加强国防建设。国防建设是政权巩固、社会稳定、国家独立与安全的根本保证。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③。其二,加快经济发展,促进国防建设。国防是不直接创造财富的,而是消耗财富的,要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必须要以经济建设提供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为基础,离开经济建设的后盾,国防建设就无从谈起。其三,进行国防建设必须全面考虑国家的经济实力,考虑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了国家所能提供的资金和物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国防建设所占的投资比例过大,就必然会减少经济建设的投入,就会影响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提高,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影响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和提高,进而影响中国现代化的顺利实现。其四,解决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矛盾的可靠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①,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也就是说,国防现代化建设必须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必须在经济建设发展的基础之上加强国防建设。

(四) 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国家、集体、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三者之间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能否正确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成为直接关系到能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全局性的和极为现实的问题。

在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自己的国家,国家和集体利益代表着人民群众共同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只有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有了一定发展,个人利益才能得到保证和相应发展。但与此同时,国家利益也就是人民利益,不存在脱离个人利益和违背群众利益的国家利益与集体利益。这三个层次的利益代表着人民利益的三个不同方面,所以必须兼顾。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实质上是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毛泽东讲的兼顾,就是要把人民的长远的根本利益与当前的局部利益结合起来,他认为,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的。

(五)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②,它既是两者的管理权限的关系,也是国家利益与地方局部利益的关系。能否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第一,必须加强中央对国家经济的统一领导。毛泽东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③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国民经济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中央必须通过宏观调控,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如果不是这样,各地方各行其是,就必然造成比例关系失调,国家财富的浪费和整个经济的混乱。所以,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必要的,各地方必须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把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国家整体利益的大局放在第一位。

第二,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各地的自然条件、资源条件、经济条件、生产力发展状况、文化条件等,都有很大的差异,如果事事都要求统一,不允许有地方特点、地方的相对独立性、地方的某些利益,那是无法进行经济建设的。所以,“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①,有必要的因地制宜的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

第三,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既要加强中央同统一领导,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毛泽东说:“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②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设想,这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经济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所以我们要认真研究,并且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总结经验。他还特别提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③。

总之,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各种关系即各种矛盾的思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和方法。

三、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有益探索

我国 20 世纪 50 年代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基本上是模仿了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体制在当时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结构比较简单的情况下,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一五计划的进行,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联系日益复杂,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逐渐地暴露出来。

(一)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

所谓经济运行机制,主要是指经济运行的调节手段。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是国家计划。这种集中太多、统得过死的体制,使得经济运行缺乏活力。

党的八大前后,刘少奇、陈云等在发挥市场调节作用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思想。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上提出,应当改进现行的市场管理办法,取消过严

①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1、32 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1 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2 页。

过死的限制；应当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的一定范围内，允许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陈云在党的八大上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他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①1957年3月，刘少奇在对中央党校学员的讲话中，又提出了使社会主义经济既有计划性又有多多样性和灵活性的思想，并强调苏联这方面的教训很值得我们注意。上述观点的核心，就是主张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以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但它只能是辅助性的。

毛泽东在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时，针对有人提出要消灭商业、货币的错误观点，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的思想。毛泽东指出，商品生产本身没有社会制度属性，不能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毛泽东论述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他指出，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很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必须有计划地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毛泽东还阐明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产和交换存在的主要前提。他说：“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②他认为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实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因此，“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③。针对“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毛泽东还论述了要发展商品生产就必须利用价值规律。他指出，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客观规律，不懂得、不利用这个规律，便无法发展商品生产。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

①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0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5页。

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①。这些创造性的观点,为后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二) 关于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

在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问题上,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特征,搞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原有的五种经济成分几乎变成了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成分。由于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生产关系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脱离了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使生产经营受到多方限制,也给人民生活带来不便。为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始对我国所有制结构进行了思考。

党的八大上陈云关于“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不仅触及了当时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且涉及允许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合法存在并充分发挥其作用的问题,其实质就是要突破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模式。八大以后,党和国家着手对经济关系进行调整,市场开始活跃起来,个体工商户的数量明显增加,出现了一些自发经营的规模较大的工商企业,即所谓的地下工厂、地下商店。1956年12月,毛泽东在同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的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出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重要思想,他说:“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他把这称之为“新经济政策”,就是指在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适当发展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以发展商品生产。他还说:“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②。在这之后的一届人大常委会上,刘少奇也谈到,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也不怕,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周恩来也在国务院会议上指出,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这实际上提出了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发展商品生产的思想,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可贵的思路。

(三)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体制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我国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进行探索的同时,也涉及了管理体制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思想。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首先,提出了给地方分权和扩大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的思想。毛泽东认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而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地方有较多的自主权,它们的一些发展经验值得我们研究。他要求中央各部,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他还设想中央部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另一类则主要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他还提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①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党的八大前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多次开会,专门讨论体制改革问题,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和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三个文件,反映了党在八大前后探索改进经济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的认识成果。并制定了有关的改革方案和规定,其基本精神就是,适当调整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把一部分工业管理、商业管理、财政管理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行政机关和工矿企业,以便更好地调动和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

其次,毛泽东等还就企业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例如:企业要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和严格的责任制;企业要实行民主管理,建立人与人之间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为此,必须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使之成为扩大企业民主、吸引广大工人群众参与企业管理、监督行政、克服官僚主义和集中群众智慧的有效形式等等。在充分发扬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生产技术民主,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上,形成和完善以厂长为首的全厂统一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和运行机制,为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经验。

(四) 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

农业合作化初步实现后,农村集体经济应采取怎样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怎样有效地组织劳动,采取什么样的分配方法才适合农村的实际,才有利于协调集体和农民的利益,充分调动二者的积极性,更好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是我们党长时间探索的一个重大问题。邓子恢在党内较早地提出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思想。他多次强调指出,要调动社员积极性,必须要有严格的责任制,要分工合作。必须通过一定的经济制度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农民的个人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他认为,农业集体经济内部关系要有调整,在生产经营方面实行“大的集中,小的分散”,在生产资料处理方面实行“主要公有,次要私有”。提出合作社对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包财务”,超产提成,减产扣分。生产队对生产组实行按片按季包工到组,田间零活包工到户,深远山区也可以包产到组、到户。大活集体干,小活分开干。后来他又提出责任制必须联系产量的主张,他说,责任制不和产量结合是很难包的。责任制联系产量只要不涉及所有制,是可行的,不会改变它的社会主义性质。他坚定地认为,如果不建立和实行严格的生产责任制,集体经济就没有好的结果,是没有希望搞好的,只会陷入无人负责管理和经营管理混乱的状态。干活“大呼隆”,分配“一拉平”,只会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农业生产的发展。邓子恢在安徽、广西等地农民自发创新的基础上,提出包产到户、责任到人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这种农业生产责任制使农民的生产劳动与其劳动成果建立了更直接的联系,有助于增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责任心。1962年邓小平在谈到农业问题时也明确指出:“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①他反复强调,在农村,还要调整基层的生产关系,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要从体制问题上解决,改变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现有关系,这是一个大政策。上述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思想和实践,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成果,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改革的先声。

总之,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党和毛泽东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所取得的成果,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因而对当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并对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

第四节 国际战略和外交方针

一、国际形势判断与国际战略思想

科学观察和判断时代特征,正确估量和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是制定正确的外交战略的重要依据。建国后,毛泽东对国际格局的判断和所采取的相应的国际战略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

（一）“中间地带”思想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两极格局初露端倪时，毛泽东就开始构思未来中国的对外战略。1946年8月，他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科学分析了战后国际格局，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中间地带”的思想。主要内容：一是，“美国和苏联之间隔着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二是，“首先受到美国侵略的不是苏联，而是这些被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三是，目前的反苏宣传，是“对于反苏战争的政治准备”，同时，“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当前美国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四是，“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①。毛泽东在这时提出“中间地带”，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早指出美国在反苏的口号下实施其霸权计划的政治家之一。他的这一思想也隐含了反对美国世界霸权以及把美国和苏联与其他的国家区分开来的双重意义。

1954年，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又重新提到了“中间地带”的思想。他指出：所谓反共，“这事并不是完全真实的。据我看，美国反共是把它当作个题目来做文章，以达到他们另外的目的，首先是占据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段。美国在北美洲处在这个中间地段的那一边，苏联和中国处在这一边。美国的目标是占领处在这个广大中间地带的国家，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最好使这些国家都弱下去，这包括日本、德国在内”^②。这里所指的中间地带，主要是指西方国家和广大的新兴独立国家。1955年毛泽东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目前美国在广大的中间地带，从东京到伦敦建立军事基地，把三百万军队中的一百多万人都钉在这些基地上，动都动弹不得。这不像是个打仗的架势。美国实行着实力政策，如果真的打起来，首先中间地带就完了。但是，这广大中间地带的人民中，亚非两大陆就有十四个亿，还有欧洲的人民，都是我们反对美国侵略的同盟者”^③。这就是说，当时美国的外交政策，其实主要目标是为了占领中间地带，不一定是为了要打仗。1958年，毛泽东又指出，美国到处驻兵，在亚非拉欧四洲都有军队，“这么几个兵，分得这么散，我不晓得它这个仗怎么打法。所以，我总是觉得，它是霸中间地带为主”^④。

毛泽东反复强调中间地带的目的，一是反对美国霸权；二是把除美国以外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3~1194页。

②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160页。

③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页。

④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50页。

西方国家争取到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中来；三是表明中国对战争的看法，认为美国主要目的不在于马上发动反苏战争，因此世界战争不会打起来。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的认识又有了新的变化，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1962年，毛泽东在与日本客人的谈话中，首次提出：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各不相同。他在把日本和西德这些地方都称为中间地带时指出，社会主义阵营算一个方面，美国算另一个方面，除此以外，都算中间地带。但是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也各不相同：有些国家有殖民地，如英、法、比、荷等国；有些国家被剥夺了殖民地，但仍有强大的垄断资本，如西德、日本；有些国家取得了真正的独立，如几内亚、阿联、马里、加纳；还有一些国家取得了名义上的独立，实际上仍然是附属国。中间地带国家各式各样，各不相同，美国统统想把他们吞下去。毛泽东这时对中间地带国家情况的分析一个重大变化就在于把中间地带中的西方国家与二战后出现的新兴独立国家区分开来。

1963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他指出：“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东欧国家与苏联的“关系紧张得很”。1964年1月，他再次阐明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强调：“讲到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这种情况看起来比较明显。”^①

两个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对世界力量分化组合有了新的认识，为中国同亚非拉等“第一中间地带”国家加强团结与合作，特别是改善和发展与“第二中间地带”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为中国在1960年代打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上各种力量经过“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逐渐形成了新的战略格局。苏联霸权主义膨胀，加强对周边国家的军事威胁，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多次挑起武装冲突，甚至扬言要摧毁我国的核基地。美苏争霸的态势出现了苏攻美守的重要变化。此外，由于日本、西欧、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上升，再加上新兴独立国家的兴起，世界开始呈现多极化的苗头。毛泽东密切关注国际关系的巨大变化，毅然及时调整对外战略，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摆脱与苏美同时对抗的局面，初步形成了中、美、苏三大角的国际关系格局。

根据新的形势，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1964年1月，毛泽东在与一批美国朋友的谈话中，第一次使用了“第三世界”的概念。他指出：“美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06~507、508页。

国现在在两个‘第三世界’都遇到抵抗。第一个‘第三世界’是指亚、非、拉。第二个‘第三世界’是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压迫别人,另一方面又受美国压迫,同美国有矛盾。”^①可以看出,这里的两个“第三世界”概念,是直接“从两个中间地带”概念演化过来的。所不同的是毛泽东进一步把东欧国家与苏联区别开来,正如过去把西欧国家与美国区别开来一样,尤其是把中国与苏联区别开来。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坦桑尼亚客人时,第一次将西方国家排除在第三世界的概念之外,指出“帝国主义怕第三世界”,而这里的帝国主义,不仅指美国,也指美国等西方国家。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正式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指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②同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大会上,向世界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从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形成过程来看,呈现如下特点:第一,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的关注和倚重。“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最重要的意义,就是看到了经过民族独立运动和解放斗争而建立的亚非拉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一直是中国外交的立足点。第二,对美苏两极格局的挑战。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其实都是针对两极和第一世界的。第三,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的趋势。两个中间地带思想就已经开始淡化了社会制度标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表明我们已经放弃了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为标准的旧模式,这不仅使中国逐步摆脱了一度在国际上比较孤立的困境,成为遏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主要力量,而且为中国后来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对外开放廓清了道路。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肯定了新兴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地位,并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从而为中国找到了与国力和国家利益相符的战略地位。尤其是,这一理论把日本、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划入第二世界,指出它们同霸权主义国家既有联系又有冲突,从而抓住了第二世界国家的本质特征,极大地增强了国际反霸力量。

总之,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与世界格局的转换相契合,其重要特征就是始终如一地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统一和尊严,不作任何大国的附庸,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14页。

^②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00、601页。

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坚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结成尽可能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尽管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不同历史阶段,这一主张因为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它的基本精神始终是一贯的。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强调,中国必须独立自主,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中国真正的独立和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决不能靠外国恩赐,主要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周恩来也明确指出,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是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中国内政;我们愿意和一切平等待我之国家合作,不排外,不挑衅,但必须站稳立场,否则就只能倒在外国人的怀里。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外交的中心任务是: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为社会主义和平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为此,中国公开宣布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着重加强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联合,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势力。同时,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一直是争取和平为宗旨的。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①

建国初期,毛泽东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大外交方针。“另起炉灶”就是新中国的人民政府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一切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指新中国的建立必须清理旧中国残留的对外关系遗迹,建立国内的良好环境,以全新的面貌建立、发展同其他友好国家的关系。“一边倒”就是在帝国主义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实行敌视政策的情况下,中国只能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一边倒”是从当时全球格局出发的一种战略思考。毛泽东认为,新中国宣布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能“使我们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处于孤立地位”^②,并且“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条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③。中国执行向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一边倒”的方针,并不意味着放弃独立自主原则。这三大方针,符合中国人民实现国家安全、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根本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4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页。

利益,为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

争取和维护和平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国人民的愿望。毛泽东一贯主张,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应当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各个国家的事情应当由各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去管,任何外国无权干涉。我们主张和平是由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需要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因此,争取和平就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基本任务。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①争取和维护和平的主张,在我国的外交工作中集中体现为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在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时,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这五项原则是20世纪50年代初,由周恩来首先提出,由中国、印度和缅甸三国共同倡导,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并被逐步确立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毛泽东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他还提出“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②,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也可以和平共处。

中国共产党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与倡导,有着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意义:第一,增进了亚洲和世界各国对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解和认同,从而促进了亚洲及世界各国对新中国的了解与合作,这对于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与包围,结成新的更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是极为有利的。第二,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否定了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增进了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与人民的团结。第三,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提供了正确的途径,为在国际间和平解决争端提供了合理的规范,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谋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础。第四,奠定了我国外交政策的基础。

20世纪60年代,世界形势仍处于“冷战共处”状态。根据当时美国对中国实行孤立、封锁和禁运,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我国外交政策重心由“一边倒”调整为同时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到处侵略扩张、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的霸权主义政策。同时,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坚持睦邻友好,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世界的进步与和平。

20世纪70年代,美苏争霸出现了新的情况。苏联加强在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的军事部署,并企图从北、南、西三面包围中国。美国实行战略收缩,急于从越南脱身,谋求打开对华关系。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地决定打开中美关系的大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365页。

②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187、165页。

门,提出了“一条线”的外交战略,即从东边起,日本、中国、欧洲国家、美国,加上同一条线上的第三世界各国,联合努力,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这是我国外交工作的一次重大战略调整,对缓和我国面临的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保障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独立自主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根本立足点。所谓独立自主,是指国家的主权是独立的,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的干涉与侵犯。每个国家都有权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独立地、自主地处理本国对内对外的一切事务。毛泽东在许多场合都表述了这样的思想。他明确指出:“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自己管,这是个真理。”^①我们坚决主张各国内部的事务由本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解决。具体到外交活动中,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必须坚持把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维护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对世界政治经济事务的参与权,是我国的根本利益,也是我国外交工作的根本任务。中国同样也尊重别国的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平等互利,保持和发展友好关系。

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必须反对霸权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干涉侵犯他国主权的主要根源,我们坚决反对霸权主义,自己也永远不称霸,不允许别国把他们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强加于我们,我们也决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他人。

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必须在国际上主持正义。广交朋友,说公道话,办公道事,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就团结他,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就孤立他。毛泽东强调:“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的,就和他们拉关系”。^②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我国对外交往活动的根本准则,是在外交工作实践中探索出来的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依据。严格按照这一政策准则办事,既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又有利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83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335页。

第六章

人民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

人民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理论全面回答和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人民军队建设和人民战争及战略战术原则等一系列根本问题。这一理论是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指南,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对于加强人民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第一节 人民军队的思想

一、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

马克思主义认为,军队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并为其阶级利益服务,无产阶级的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①他强调,这个军队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邓小平也多次指出:我们军队的性质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②。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有着本质的区别。

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军队的首要前提,是人民军队一切行动的准则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真诚拥护和支持而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早在人民军队创建之初,毛泽东就指出,我军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使每一个红军战士都知道自己是为谁扛枪,为谁打仗。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必须使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4页。

军队和人民打成一片,反对脱离群众和侵犯群众利益。必须彻底纠正雇佣思想、小团体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树立为人民打仗、为人民建立革命政权的无产阶级思想。这就规定了红军的建军宗旨和方向。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①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更为明确地指出:“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②正是在这个宗旨的指导下,人民军队才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屈服于敌人。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为了人民的利益继续战斗下去。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宣示:“本军是中国人民的军队,一切以中国人民的意志为意志。本军的政策,代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③。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新型人民军队阶级本质的体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所创建的军队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军队。它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担负着消灭一切剥削和私有制度、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最根本利益,因而必然要把为无产阶级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作为自己建军的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通过人民军队担负的历史任务体现的。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在总结红军攻打茶陵的经验教训时就指出,部队要执行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任务。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④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适应统一战线的需要,又把筹款任务改为生产任务,也就是“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从事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达到军队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之目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7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页。

借以克服经济困难,改善军队生活和减轻人民负担。”^①毛泽东强调:“只要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作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②解放战争时期,在即将夺取全国胜利的形势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又及时指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后来,又把人民军队的三大任务概括为战斗队、工作队和生产队。人民军队的三大任务是适应中国革命战争的需要而形成的,其根本目的就是使军队切实与人民打成一片,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战斗队的职能是人民军队最根本的任务,而工作队、生产队的职能又是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基本标志,这是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途径,体现了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的本质特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还要求人民军队必须具有严格的革命纪律。1927年9月,毛泽东要求秋收起义的官兵对待群众说话要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同年10月,在向井冈山进发时,规定了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1月,又提出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同年4月,重申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并将“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1929年,在六项注意中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成为八项注意。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发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指出,三大纪律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新型人民军队的严格纪律,是实现人民军队内部高度集中,以及保持军队同人民群众鱼水关系的重要条件,对于巩固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加强人民军队的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人民军队建设的原则

毛泽东在缔造和领导人民军队,进行人民战争的过程中,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思想,提出了人民军队建设的一系列原则,解决了在中国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大问题。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9页。

（一）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核心。早在人民军队初创时期,毛泽东在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三湾改编时,首创了将“支部建在连上”的重要原则,在红军中实行班、排设党小组,连队建党支部,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设立党委的制度,整个部队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三湾改编在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这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1929年,在福建古田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由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心思想就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党和军队的建设。该《决议》明确地规定了红军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批评了那种认为军队和政治是对立的单纯军事观点,指出:“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①《古田会议决议》确定了党对军队领导的各项措施和制度。此后,毛泽东又在总结党内正确与错误两种思想斗争的经验,特别是同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经验教训时更为深刻地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②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国共两党以抗日为基础,建立统一战线的形势下,党仍坚持自己对于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并在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中发展和壮大了人民武装力量,成为坚持抗战、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决定性力量。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针对高岗的“军党论”,再一次强调指出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首先是政治思想方面的领导。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③党的思想领导能够使人民军队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能够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使人民军队始终与党保持政治上的一致性,积极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四军内部就曾经因为忽略对军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出现了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思想。古田会议曾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强调必须加强对红军的政治思想教育,以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解放战争时期,党在军队内部又开展了以诉苦和“三查”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使人民军队保持着正确的方向。党对军队的领导还表现在组织方面的领导。从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建立健全党在人民军队中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各级组织,发挥军队中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建立以党委为领导核心的一整套制度。此外,军队还要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同时接受军事系统和地方党委的双重领导和监督。这样,就形成了从上到下,从领导机关到基层连队的完整的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从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党领导下的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

(二) 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原则

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人民军队建立后,毛泽东即着手在军队里建立党代表、政治工作机关和政治工作制度,确立了政治工作在人民军队中的地位。在人民军队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毛泽东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创立了一整套方针和原则,成为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措施。1937年10月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兰特的谈话中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明确地概括为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和瓦解敌军三大原则。

坚持官兵一致的原则,是处理人民军队内部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的准则。实行官兵一致,就要求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制度,实行官兵平等,尊官爱兵,官兵团结、互助,同甘共苦,实行有领导的民主,建立自觉的纪律。秋收起义以后,毛泽东提出要废除旧军队的雇佣制度、打骂士兵和枪毙逃兵的军阀主义制度,并提出了官兵平等的口号。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对军阀主义倾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亲自制定了废止肉刑和优待伤兵等项决议案。官兵一致的原则,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根本标志之一,是提高人民军队战斗力的基础。正如毛泽东指出:由于军队实行了官兵一致,“因此全军是团结一致的”^①。“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达到了,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就不患不能支持。”^②

坚持军民一致的原则,是处理军政、军民关系的准则。实行军民一致,就要求军队奉行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拥护人民政权,积极参加地方建设;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要减轻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建立起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人民群众把军队看成是自己的军队。军民一致原则是人民军队发展壮大、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正如毛泽东所说:“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③。

坚持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政策,是人民军队从政治上动摇敌人军心、破坏敌军战斗力的策略和手段。实行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政策,就要求人民军队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2页。

配合军事打击,开展政治攻势,对敌军官兵进行政治宣传和组织瓦解,动摇其军心、涣散其意志,争取其放下武器,投诚、起义,脱离反动阵营,并实行宽待俘虏政策,不杀不辱,不没收私人财产。实践证明,“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①。

这三大原则是新型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是人民军队正确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准则,是人民军队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②

(三) 人民军队的民主制度

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是人民军队的民主制度。毛泽东指出:“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他认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③同样是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中不勇敢,今天在红军中很勇敢,这就是红军民主主义的影响。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的指示中,正式把军队内部的民主生活概括为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他指出:“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④政治民主,是指官兵只有职务和分工不同,没有高低和贵贱之别,政治上一律平等,干部尊重战士,战士积极参加连队管理;经济民主,是指官兵有权管理和监督经济生活,由连队军人大会选出经济委员会协助连队首长管理伙食和农副业生产,监督经济开支,防止贪污浪费,不断改善生活;军事民主,是指在军事训练中,实行官兵互教,开展评教评学,在战时发动官兵讨论如何完成战斗任务,战后开展战评,总结作战经验;在战备、施工、生产、科研等任务中,发动官兵出主意,想办法,调动指战员积极性。

三大民主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是人民军队区别于其他一切旧式军队的显著标志之一,成为人民军队民主生活的基本内容和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制度,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得到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目的。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军队中的具体体现,是人民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5页。

军队团结一致、战胜敌人的强大武器。

第二节 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

一、无产阶级的战争观

战争观,即对待战争的基本观点。无产阶级战争观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基础。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对无产阶级指导战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战争观。

(一) 战争的起源和性质

马克思主义把战争看做是阶级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而进行的暴力斗争,是私有制和阶级出现的产物。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对战争的起源进行了更加明确、深刻的阐述。他指出:“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①他进一步指出:“由于阶级的出现,几千年来人类的生活中充满了战争,每一个民族都不知打了几多仗,或在民族集团之内打,或在民族集团之间打。打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帝国主义时期,仗就打得特别广大和特别残酷。”^②这就指明了战争是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历史现象。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自从私有制出现以后,社会就分裂为不同经济利益的阶级和社会集团,他们为了保护 and 争取自己的利益必然发生矛盾和冲突,当这种矛盾和冲突发展到尖锐对抗的程度,其他手段都不能解决时,就会用战争的手段解决问题。因此,战争是一种有组织、有目的地解决阶级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它同私有财产和阶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战争随着私有财产和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将随着它们的消亡而消亡。

毛泽东根据战争的阶级实质及其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将战争的性质划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所谓正义战争,是指一切符合人民利益、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的、革命的、进步的战争。如民族解放战争、阶级解放战争、反对外来侵略战争等。所谓非正义战争,是指一切违反人民利益、对社会发展起阻碍作用的、反革命的、退步的战争。如镇压人民革命的战争、对外侵略战争等。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对待战争的根本态度是:坚决反对一切非正义战争,支持并积极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4页。

参加正义战争。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支持并参加革命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最终消灭战争。“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①对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符合社会历史发展方向、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正义战争,无产阶级要坚决拥护、积极参加,给予政治上、物质上和人力上的支持;对于代表反动的腐朽没落阶级的利益、对社会发展起阻碍作用的非正义战争,无产阶级要坚决反对它、制止它。

(二) 战争的本质和目的

战争是一定阶级和国家政治的继续。毛泽东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②战争不是单纯的暴力行为,而是和政治有着本质上的一致。任何战争都不能离开一定阶级的政治而独立存在,政治总是贯穿、渗透、表现在战争之中的。此外,任何战争都离不开一定的政治目的,离不开一定的政治总方针,离不开一定政治思想的动员,也离不开国内外一切同情和赞助者在政治上与道义上的声援。在谈到抗日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时,毛泽东特别指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③战争与政治的一致性就在于他们的阶级性,在于它代表了一定阶级的利益,是一定阶级的意识、意志及政策的表现。只有站在政治的角度观察战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战争的本质。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战争又有其特殊性。“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④战争是阶级斗争在一定发展阶段的最高形式,是一定阶级用以解决某种政治矛盾和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特殊手段——暴力手段,是敌我双方动用有组织的军事暴力进行的战争对抗形式,是各阶级用经济、思想、文化、外交等非暴力斗争形式已不能解决阶级矛盾或不足以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时候,才采取的手段。因此,“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⑤,从而深刻地揭示了战争的政治本质,批驳了那种轻视政治的单纯的军事观点,强调了战争是完成政治任务的特殊手段。毛泽东还指出,任何战争都有政治目的,但战争还有其本身的目的,这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9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9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0页。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①

(三) 战争与经济和科学技术

战争就其实质来说,就是敌对双方为了一定经济利益产生的矛盾冲突。经济既是战争的根源,又是制约战争发展和结局的基本因素。

战争作为流血的政治,也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为经济基础所决定。战争的爆发,从根本上说都是一定的经济关系,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冲突引起的。人类历史上的各种战争,尽管直接起因不同,但没有一场战争不同经济利益有关,经济利益是引发各种战争的基本动因。同时,经济力是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根本无法进行战争。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②“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展开我们军事上的进攻。”^③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更把解放区经济建设提高到了决定战争胜负的高度,指出在解放区“减租和生产两大任务是否能够完成,将最后地决定解放区政治军事斗争的胜负,各地切不可疏忽”^④。

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物质力量,对取得战争的胜利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指出:“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⑤抗战后期,他又进一步强调:“中国解放区的军队一旦得到新式武器的装备,它就会更加强大,就能最后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了。”^⑥所以,毛泽东十分重视在军队中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加强军事装备建设,保障了人民革命战争的进行。他反复强调:“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因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⑦。尽管科学技术及新式武器、装备对夺取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作用,但在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仍是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⑧。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6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1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1011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9页。

二、人民战争的思想

人民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人民群众为基础,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以农村革命根据地战略为依托、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并与其他斗争形式相配合,实行灵活机动战略战术的全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一个伟大创造。

(一) 兵民是胜利之本

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少数英雄人物的天才指挥,他们看不到广大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唯武器论者认为,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武器装备等物质因素。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战争的实践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科学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他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革命战争是中国革命扫除社会发展道路上障碍的一种特殊手段,它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在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只要能够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为着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而英勇奋斗,只要发动人民群众,依靠和武装人民群众,中国革命战争就能取得胜利。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①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他指出:“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②人民群众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力量。“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③日本帝国主义敢于侵略中国,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当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时,它就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非把它烧死不可。毛泽东强调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④只有动员和发动人民群众,依靠和武装人民群众,才能获得战胜中国革命敌人的力量,才能布下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0~48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9页。

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的供给”^①,才能最终战胜敌人,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所谓人民战争,就是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团结起来,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敌人。从斗争形式来讲,就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并与政治、经济、外交等其他战线上的斗争相配合。从组织形式来讲,就是以人民军队为骨干,实行各种武装力量在党的统一指挥下的密切配合。从空间和时间上来讲,就是在全局范围的战争动员和实施,并贯穿于战争的始终。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无论是与国民党合作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还是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都是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最终取得胜利的。

毛泽东认为:“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我们不但要看到武器,而且要看人力。“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②“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③具有自觉能动作用的人,是战争中最活跃最生动的因素。在一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之上,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④毛泽东还多次强调,战争胜负主要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物。抗日战争时期,军力和经济力处于劣势的中国,终于战胜了拥有较强军力和经济力的日本。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打败了美国帝国主义支持下的拥有精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这一切都说明了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当然,强调人的决定作用,并非否定物质条件,也不是片面强调人的精神作用,而是强调要全面发挥人的各种作用,认识战争规律,制定符合战争情况的战略战术,不断研制和熟练掌握以及使用各种武器装备,并不断提高人的各种能力。

“兵民是胜利之本。”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毛泽东军事理论的基本内容。它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8页。

（二）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人民战争的战略基地

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重要内容。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人民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①。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的敌人是极其强大的,而强大的敌人又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心城市,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在农村积蓄和发展自己的力量,把落后的广大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造成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强大的革命阵地,以反对和消灭利用中心城市进攻农村的凶恶敌人;在农村点燃革命的星星之火,逐步发展革命力量,以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中国革命战争是长期的和残酷的。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加上残酷性,处于敌后的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不能支持的”^②。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过程中,人民军队必须有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作为依托,才能不断地保存自己,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农村革命根据地不仅为人民军队提供人力和物力资源,而且还是人民军队进行休整、补充和训练的场所。只有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党和人民军队才能经得起长期战争的考验,才能对付凶恶的敌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反之,没有或失去了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就会失去可靠的依托,进行革命战争也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战争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战争。要发动农民、武装农民,就必须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样才能为人民战争提供可靠的物质基础,解决人民战争巨大的物质消耗,也为人民战争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所以,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又是进行土地革命的坚实基础。

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形象地说明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作用。他指出:“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③这也就是说,有了根据地这个“眼”,就能够钳制和削弱敌人、发展和壮大自己,把根据地建成强大的后方,使之成为人民军队进行战略反攻的出发点。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27页。

（三）人民战争武装力量的体制

进行人民战争必须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这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重要内容。

早在人民军队创立初期，毛泽东就指出：“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①毛泽东不仅十分重视建立正式红军，而且十分重视建立和发展赤卫队、工农暴动队等地方武装，来帮助红军作战，要求“在不降低红军战斗力的条件之下，必须尽量帮助人民武装起来”^②。建立正式红军、赤卫军、工农暴动队等多种武装力量，并根据不同的任务，采取不同的作战形式，最大限度地动员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有效地打击了敌人。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后，组建了红军独立团、区特务营、红军预备队、农民赤卫队、纠察队等多种形式的武装力量，逐步形成了党领导下的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赤卫军、少年先锋队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由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逐渐建立了主力兵团和各级地方兵团，同时建立了民兵、自卫队组织，形成了由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队相结合的武装体制。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仅有了 120 多万人的正规军，而且有了 220 多万人的民兵，以及上千万人的自卫队，这些各种形式的地方武装配合正规军进行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和破袭战等形式的斗争，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毛泽东指出：“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他又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它将自己划分为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两部分，前者可以随时执行超地方的作战任务，后者的任务则固定在协同民兵、自卫军保卫地方和进攻当地敌人方面。这种划分，取得了人民的真心拥护。如果没有这种正确的划分，例如说，如果只注意主力兵团的作用，忽视地方兵团的作用，那末，在中国解放区的条件下，要战胜敌人也是不可能的。”^③在地方兵团方面，我们组织了许多经过良好训练，在军事、政治、民运各项工作上说来都是比较地更健全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打击敌人，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斗争，配合各解放区的正面战线作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0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6～67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40 页。

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大力发展地方军和民兵,积极扩编野战军,形成了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相结合的人民武装力量体制。在解放战争中,参战的民兵达到 228 万人次。据不完全统计,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各地参战的民兵和民工达到 539 万人,出动大车 38 万辆。仅在淮海战役中,出动小车 41 万多辆,挑子千万余副。这些战役的胜利,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在这种人民战争武装力量的体制中,一般说来,主力兵团是人民武装力量的骨干,主要用于歼灭敌人的正规主力,并随时可以执行地方的作战任务,在开辟和建立革命根据地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地方兵团则是介于主力兵团与民兵游击队之间的人民武装,它相对固定于一定的区域,执行着保卫根据地和打击地方敌人势力的任务。当主力兵团撤离执行新的任务时,地方兵团在保卫和巩固根据地方面便发挥主要作用。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均为正规军,正规军在解决战争胜负问题上起着决定作用。民兵和游击队是正规军的后备力量,也是配合正规军作战的有力助手,是支前的主力军。这种武装体制,既有利于发展和扩大人民军队,也有利于协调一致地执行作战任务,还有利于巩固后方根据地。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证明,这种武装力量体制,保证了人民战争的进行,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是在极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战争。毛泽东坚持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古代、近代和现代的中外优秀军事理论,形成了一整套合乎中国革命战争特殊规律的、闪烁着唯物辩证法光芒的战略战术思想和原则。

(一) 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积极防御又称为攻势防御、决战防御,是为了反攻或进攻,采取积极的攻势行动,挫败进攻之敌的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或进攻的防御。毛泽东揭示了积极防御与消极防御的本质。强调积极防御在指导思想,是以保存实力,创造有利条件,进行带决战性的战略反攻,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最终导致战略进攻为目的。而消极防御则不是为了反攻或进攻,而是为了单纯地挡住敌人的进攻,专以保守地方为目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长时期地处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处于战略防御的地位。毛泽东创造性地阐述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他主张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由于中国革命战争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敌人是全国的统治者,而我们只有一小点部队,所以,弱小的红军要想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保存自己的力量打破敌人的进攻,实行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科学地阐述了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思想,这是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战略方针。毛泽东认为,在中国革命战争中,进攻与防守是既相对立、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防御是以进攻为自己存在的前提,进攻也总是以防御为自己存在的前提。他指出:“在军事上说来,我们的战争是防御和进攻的交替的应用。对于我们,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后,或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前都是可以的。”^①同时,在战争中,进攻与防御又是互相渗透的。进攻中包含着防御,防御中也包含着进攻,攻中有防,防中有攻,攻防结合。毛泽东指出:“防御战本来容易陷入被动地位,防御战大不如进攻战之能够充分地发挥主动权。然而防御战是能够在被动的形式中具有主动的内容的,是能够由形式上的被动阶段转入形式上内容上的主动阶段的。”^②这也就是说,防御和进攻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实行积极防御而不是消极防御,就能够实现由防御向进攻的转化。

积极防御是中国革命战争总的战略方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积极防御是通过“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实现的。之后,毛泽东又提出“诱敌深入”的方针。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制定了深入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则提出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方针。总之,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具体的战略方针,都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化而采取的,是积极防御这一总的战略方针的具体体现。

毛泽东为人民军队制定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解决了我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无论是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都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 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

毛泽东指出:“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③这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过程中,为我军制定的重要的战略指导方针。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从敌强我弱的特点分析入手,阐述了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的思想。毛泽东指出:“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在这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3页。

上面性急是要吃亏的,在这上面提倡‘速决’是不正确的。”^①“因为中国的反动势力,是许多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革命势力没有聚积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钳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从这一点出发,规定我们长期作战的战略方针,是战略指导的重要方针之一。”^②而在战役和战斗中的原则与此相反,不是持久而是速决。“在战役和战斗上面争取速决,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③毛泽东阐述了战役战斗速决战的必要性:一是,红军的武器尤其是弹药没有来源;二是,白军有很多支部队,红军只有一支部队,打破一次“围剿”要准备迅速的、连续的作战;三是,白军虽然各个分进,但多是比较的密集,打他们中间的一个如果不能迅速地解决战斗,其余各个就都来了。因此,我们不能不实行速决战。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把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的战略方针进一步发展为实行战略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和在战役战斗上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是一个小而强的帝国主义国家,而我们则是一个大而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日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方面是强的,中国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方面都不如敌人,因此,敌人在战略上采取速决战,我则在战略上应采取的持久战。同时,由于日本是少兵临大国,我们则可以利用我之地广兵多和在本土反抗外敌人侵等有利条件,实行外线的速决战,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

总的来说,在战役战斗上打速决战。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不排除有些战役战斗采取持久的方针。一是“围城打援”,目的不在打围敌,而在于打援敌,对围敌可采取相当的持久战,对援敌仍然是速决战。二是战略防御时固守钳制方向的据点。三是战略进攻时打孤立无援之敌,消灭根据地中的白色据点。在这三种情况下则可能采取相对持久的方针。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的方针,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科学总结,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三) 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

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三种基本作战形式。游击战是土地革命前三年和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作战形式。运动战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主要作战形式。阵地战在解放战争后期成为重要的作战形式。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在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科学地总结了我军丰富的游击战争的经验,把游击战争上升到战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3~23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4页。

略地位。

毛泽东、朱德等人在领导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根据敌强我弱的特点，利用井冈山有利的条件，机动灵活地开展了游击战争。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基础上，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奠定了人民军队战略战术的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系统地论述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他强调指出，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日本占领区留下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的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由于中国的进步，也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而是大规模的。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就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①毛泽东认为，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同时代的进步、同共产党和红军的存在是分不开的，这乃是问题的焦点所在。就整个抗日战争来说，正规战争是最后解决战争命运的关键，但同时必须认识到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过程中的战略地位。

一般来说在战争的作战形式中，主要的是运动战，其次是游击战。在整个战争中，说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指的是决定战争命运的，主要是依靠正规战，尤其是其中的运动战，游击战不能担负这种决定战争命运的主要的责任。但这并不是说，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不重要。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仅次于运动战，因为没有游击战的辅助，也就不能战胜敌人。在抗日战争中，游击战的战略作用有这样两个方面：一是辅助正规战，二是把自己也变成为运动战。至于就游击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持久的意义来说，它的战略地位是更加不能轻视了。因此，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游击战本身，不只有战术问题，还有它的特殊的战略问题。

在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中，在战略防御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在战略相持阶段，游击战上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在战略反攻阶段，运动战再上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5页。

而在战略反攻阶段的运动战,已不全是由原来的正规军负担,而是由原来的游击军从游击战提高到运动战去负担一部分,也许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毛泽东认为:“从三个阶段来看,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①

毛泽东还指出,游击战虽然没有正规战争那样迅速的成效和显赫的名声,但是,在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游击战争将表现其很大的威力,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业。1937年,党的洛川会议提出我军的战略方针是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又进一步指出:“八路军的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②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四)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是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重要原则。它既是我军战役战斗的主要作战方法,也是实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战争目的的重要手段。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各个时期,历来强调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采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

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主张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后来,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红军,在中央革命根据地采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一、二、三次反革命军事“围剿”。1936年,毛泽东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时,论述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重要原则。他指出:“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无论哪一个大胜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③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改变敌我的形势。第一是为了改变进退的形势。第二是为了改变攻守的形势。第三是为了改变内外线的形势。对于打歼灭战,毛泽东指出:“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④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反复说明,我军应坚持“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⑤。集中优势兵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9页。

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1947年12月,毛泽东在论述十大军事原则时更明确地指出:“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①这样,我军在全体上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而且,随着战争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我军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最后歼灭一切敌人。

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思想,是对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科学总结。我军从建军以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不同历史时期,都坚持了这一作战方法,所以能够在短期内最大限度地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地歼灭敌人,打了许多漂亮的歼灭战,创造出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许多奇迹。

(五) 战略进攻的思想

战略进攻是对战略防御之敌所采取的全面进攻,是消灭敌人和夺取或收复领土的主要手段。毛泽东指出:“反攻原则,是在敌人进攻时应用的。进攻原则,是在敌人防御时应用的。”^②战略进攻“是敌取守势我取攻势时的战略形势和战略方针”^③。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进攻,是从战略防御发展而来的,通常与战略反攻相衔接。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和解放战争后期,人民军队经历过两次在规模和形式上都不相同的战略进攻。土地革命前期,红军在根据地已将国民党军之进攻打破,而它的新的进攻尚未到来时,红军向边缘地区实行攻势行动的小规模战略进攻,目的在于巩固反“围剿”的胜利,扩大革命根据地。解放战争后期,人民解放军从战略反攻发展为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目的是为了解放全中国。

1947年6月到8月间,为了实现歼灭敌之重兵集团、向全国进军,解放全中国的目标,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转变,以期在取得战略进攻胜利的条件下,成功地进行战略决战,取得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实现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转变,是战略进攻取得胜利的基本前提。1947年夏秋,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成功地实现了这一转变。首先,在进攻时机的选择上,决心不待敌人的进攻全部被粉碎和解放军总兵力超过敌人时,立即组织和指挥人民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28页。

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大量歼敌。战略进攻的方向为中原地区。其次,在战略布局上,逐步形成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布局。三军配合即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中央突破,直插大别山;华东野战军主力为左后一军,挺进苏鲁豫皖地区;晋冀豫太岳兵团为右后一军,挺进豫西。三路大军,相互策应,机动歼敌。两翼牵制是:西北野战军在陕北出击榆林,调动陕北之敌北上;山东野战军在胶东展开攻势,继续将敌军引向海滨。经过一个多月的作战,人民解放军的三路大军完成了“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纵横驰骋在江淮河汉之间,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移到了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沿阵地。

1948年秋,在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毛泽东抓住战机,适时地组织战略决战,将中国革命战争推向高潮。党中央和毛泽东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歼灭了蒋介石赖以进行反革命内战的主力兵团。尔后,又发起渡江战役等,奠定了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基础。

在战略进攻的过程中,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实施前所未有的歼灭战,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战,并在战略追击中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作战的方法,取得了战略进攻和战略决战的胜利。

第三节 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思想

一、建设一支正规化的、现代化的、强大的人民军队

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是国家安全、政权巩固和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是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建设环境的前提和基础。人民军队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担负起了保卫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任务。面对新的形势,毛泽东把建立强大的国防军与建设强大的经济力量作为国家建设的两件大事,适时提出了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人民军队的任务。

第一,普遍提高部队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水平。1950年8月,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中指出:“为了要完成伟大的新任务,就必须提高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水平,并从军队中培养大批的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加文化学习。”^①该《指示》还为落实这一任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页。

务规定了一系列非常具体的措施。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始终强调必须普遍提高部队的技术水平。全国陆续创办了100多所军事院校,逐步形成了初、中、高级院校培训体制,为军队培养了一大批掌握先进军事科学技术的指挥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在建设强大国防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指出,普遍地、较快地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水平,是实现部队正规化、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也是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求。

第二,实行正规的军事体制、编制和制度,实现部队建设的正规化。毛泽东认为,所谓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①。为此,中央军委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条令、条例和军事法规,建立了正规的军事体制、编制和制度,解决了过去那种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简单现象和游击习气等问题。

第三,必须建立强大的陆、海、空军,建立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由多兵种组成的现代化革命军队。现代化的强大的人民军队,是现代化的诸军兵种合成军队。解放战争后期和建国初期,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人民解放军在陆军的基础上组建了海军和空军,以后又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并逐渐增加了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等特种兵在军队员额中的比例,从而使人民解放军由单一的陆军发展为诸军兵种合成的现代化的军队。毛泽东指出:“中国是个大国,要有强大的陆、海、空军。我国有那样长的海岸线,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②并向全世界公开宣布:“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③

第四,建立健全的、具有头脑作用的、富于科学的组织和分工的司令机关。毛泽东认为,这是组织复杂的高度机械化的现代战役和战斗所不可缺少的,也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在建立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同时,人民解放军又加强了各级司令机关的建设,挑选了一批优秀的、富于组织和指挥才能的指挥员到各级司令机关中工作,创造了司令机关新的作风和新的气象。

第五,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与变化,提高现代军事技术条件下的防卫能力,研究现代军事技术、现代战争的规律以及现代战争条件下的军事战略战术。毛泽东强调,我们的军队距现代化还相差很远。原子武器出现以后,军队的战略战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8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页。

术和装备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而在这一方面我们一点都不懂,因此,必须努力学习,培养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这些现代技术的人。

二、大力发展国防工业和国防技术

革命战争年代,由于没有稳固的后方,缺乏必要的经济条件,我们根本无法考虑去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人民军队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基本上是靠缴获敌人的武器装备来武装自己。从整个国家看,旧中国贫穷落后,现代国防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夺取全国政权后,当我们着手进行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时候,建立和发展现代国防工业就成为了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毛泽东和党中央、中央军委对这一问题十分重视,把国防工业的建设摆在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上,在思考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中,及时提出了以自力更生为主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的思想。

新中国建立后,在发展现代化武器装备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常规武器与尖端武器并举。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了建设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的设想。所谓完整的工业体系,就包括“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象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①。在完整的工业体系构想中,实际上已经包括了完整的国防工业和国防技术在内。1957年初,周恩来在确定中国核工业引进项目的规模时又进一步提出,我国的核工业要有完整的一套,要求能够形成独立的核力量。随后,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的思想,便被确定为我国国防工业建设的总目标。1959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中若干问题的指示》正式提出,我们不仅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经济体系,而且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防工业体系,以适应我们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情况。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防工业系统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建设方针,为我国国防工业建设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和具体的发展道路。

在党的上述思想的指导下,适应人民解放军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包括陆、海、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部分的装备的需要,我国的国防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低级到高级、从仿制到自行研制,逐步地建立起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并具有一定规模的教学、科研、试制和生产能力的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我国先后新建和扩建了100多个国防科技工业项目,随着这些项目的建成,国产的飞机、坦克、机枪、火炮及弹药等,不断装备到部队。国家也加速了国防工程、国防交通、国防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国防尖端科技成果最为显著:如,1964年6月,我国中近程战略导弹试验成功;同年10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2页。

1967年6月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有力地打破了美苏两霸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同时,国防工业的布局也有了明显地改善。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毛泽东要求全国、每个大区、每个省都要搞军事、搞军工生产。这样,不仅在沿海而且在内地都建设起了科研、生产的基地。这些都集中代表了我国国防工业体系和国防科学技术在当时所达到的新水平,标志着国防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大加强了我国的国防力量,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三、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是国防建设的普遍规律,是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和重要原则。毛泽东在初步总结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正确处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关系的思想。

第一,国防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毛泽东多次强调,经济力量是军队存在、发展的基础,是战争的基础,而战争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场经济力量的竞赛,国防建设必须以国家经济建设为基础。依据这一重要的思想,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建国初期就确定了国防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指导原则。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精辟地论述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他指出:“国防不可不有。……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①对原子弹“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②只有加快经济建设,增强综合国力,国防建设的更大发展才有可靠的基础;否则,国防建设妨碍国家建设大局,势必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结果是国防建设欲速则不达,往往得到相反的效果。

第二,国防建设要服从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为了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就要尽可能利用国防资源为经济建设服务。为经济建设大局服务,就军队来说,一方面,要确保经济建设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利用国防系统的人力、物力、装备和设施等为国家经济建设多作贡献。

第三,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强调国防建设必须服从经济建设大局,为经济建设服务,必须防止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认为国防建设不重要,把国防建设看得无足轻重。为经济建设服务,其本身就包括了要求国防建设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8页。

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和平环境,而这只有在国防建设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实现。所谓服从,不是说等国家经济建设完全搞好了才进行国防建设,更不是取消国防建设,而是要求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根据需求和可能积极加强国防建设,使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能够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否则就无所谓服从。

第七章

政策和策略理论

政策和策略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党的政策和策略是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总路线、总任务得以正确贯彻执行 的保证。

第一节 政策和策略重要性的思想

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政策是一个政党或国家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制定的行动准则。毛泽东指出,为了实现党的最终奋斗目标,为了完成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战略任务,不仅要有正确的路线,而且要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一定时期的总任务和总路线(即总政策),决定和制约着各项具体的政策,各项具体政策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总路线或总政策。而策略则是为实现战略任务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是由战略任务所规定的行动方针、斗争方式和斗争口号,它是战略的一部分,是服从和服务于战略的。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度里领导革命和建设,遇到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者都未曾遇到的特别艰巨和复杂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党除了必须制定正确的路线以外,还必须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否则,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就难以进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政策和策略思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论述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时,就曾明确指出,“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①。为此他制定了指导红军作战和进行土地革命的一系列正确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

的政策和策略。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复杂关系,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统一战线中的各项策略方针,以及战胜困难、巩固解放区的著名的十大政策,从而克服了顽固派的投降危险,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把党的政策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1947年冬到1948年春,党中央集中全力解决各方面工作的具体政策和策略问题,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倾向。毛泽东代表党中央起草了一系列指示,对实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极端重要性,作了深刻的论述,并及时检查和纠正了当时解放区土改、工商业、统一战线、整党和新区工作等方面存在的“左”的偏向,使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了正轨。

在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曾发生过多次因政策和策略的失误而招致革命暂时失败的情况,其中最严重的是1927年北伐战争的失败和1934年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深刻地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恢复并重新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才使党转危为安,使革命力量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使革命事业从失败走向胜利。建国以后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在路线、方针、政策、策略问题上也有过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制定和执行了正确的路线、政策和策略,因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历史经验说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是不会取得成功的,而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包括政策与策略在内的政治领导。无产阶级政党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正确解决革命斗争的方向和纲领的同时,还必须特别重视研究革命斗争的规律,以正确解决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策和策略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对于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而言,有着极端的重要性。正如毛泽东所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第一,政策和策略是实现党的总路线的重要保证。路线、政策有总路线、总政策和具体路线、具体政策之分。一个革命政党不但要制定总路线和提出战略任务,而且还要提出和制定贯彻总路线和实现战略任务的具体政策和策略。如果没有具体的路线与具体的政策和策略,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就不可能实现。政策和策略是路线和战略的具体体现,是实现党的路线、完成党的战略任务的工具和手段。没有具体的政策和策略,正确的路线、纲领、方针就难以具体化为全党和人民群众的实践。毛泽东指出:“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

某种政策。”^①因此，“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根据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主要任务，在规定党的路线方针的同时制定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从而保证了党的总任务的完成。

第二，政策和策略是有效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积极投身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保证，也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保证。毛泽东指出：“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③我们党的政策实践活动，就在于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自愿地和党一起奋斗，以争取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而要使人民群众相信党，拥护党，跟党走，党的政策和策略就必须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就必须能给人民群众带来利益，否则，党就失去民心，从而失去生命力。

第三，政策和策略是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的锐利武器。一个革命政党要使自己的队伍步调一致和有力量，就必须使自己的党员和干部经常保持思想认识上的统一，就需要用党的政策和策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党在革命和建设不同历史时期，根据该时期的形势特点和目标，正确地制定和贯彻自己的路线、政策、策略，从而使我们这样一个大党保持了认识上和行动上的统一，完成了不同阶段的任务。在民主革命时期，一切政策和策略都是围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一基本目标；在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政策和策略则紧紧围绕着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总之，党能否在不同历史时期和阶段制定和贯彻正确的政策、策略，不仅关系到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而且关系到党本身的兴衰。所以，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告诫全党：“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④

二、制定政策和策略的主要依据

中国革命的实践反复证明，能否制定各种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发展关系极大。为确保党的政策和策略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在制定政策和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6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8页。

策略的时候必须遵循正确的原则,搞清基本的依据。

首先,必须以政治形势、阶级关系的实际情况及其变化为主要依据,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列宁指出:“只有客观地考虑到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因而也考虑到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到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据以制定正确的策略。”^①毛泽东也强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②这些论述都说明了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必须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毛泽东特别反对那种“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本本主义,一贯主张并坚持通过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尤其是通过对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状况的研究,制定党的政策和策略。同时,由于社会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是经常处于发展之中的,这就要求我们的思想和认识也要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对政策做相应的调整。如毛泽东所说:“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③正确的方针、政策只能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反映。这已被无数次的历史经验所证明。

其次,党的政策和策略必须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运用群众路线的方法来制定。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切言论行动都要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标准,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是党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是党制定和执行政策和策略的最高原则。党无论制定政策还是执行政策,都必须遵循两条原则:一是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符合人民群众的需要,二是根据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党的政策和策略如果不代表甚至违反人民群众的利益,必然受到人民群众的抵制和反对。毛泽东指出:“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④而当党的政策、策略虽然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但人民群众的思想还没有觉悟,还不能理解和接受这一政策时,只能进行耐心细致的宣传解释工作,耐心地等待,而不能强制推行。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一切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总是在充分地走群众路线,在反复调查研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中产生的。群众路线的方法,是毛泽东提出的制定政策和策略的根本方法。正如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所讲的:“中央领导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由于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①这就是说,共产党的政策,是在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过程中形成的。从实际出发制定政策与根据需要制定政策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因此,一项政策的制定凡是能够试点的,一定要先在个别地方或在若干地点进行实验试行。经过群众实践的考验,根据群众的意见加以修正和补充,才正式发布,在更大的范围内或在全国实施。正确的政策之所以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因为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实践,具有科学性、可行性,能够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这是我们制定政策和策略的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

再次,必须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政策、策略的又一原则,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坚持的原则。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②“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③。这里所讲的“原则的坚定性”是指无产阶级政党在制定和执行政策、策略时,必须始终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坚决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自己的奋斗目标不动摇。“策略的灵活性”是指无产阶级政党在坚持上述原则的前提下,必须善于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如敌我力量对比、反革命势力的策略和手段等的变化,灵活地运用和变换自己的斗争方式和手段。策略灵活性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敌人作出必要的和有条件的妥协和让步。例如,1935年至1937年,我们党在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整个过程中,在抗日战争时期及抗战胜利后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过程中,所采取的政策和策略,诸如对顽固派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和“先斩后奏”等灵活的斗争手段都堪称为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典范。

三、贯彻执行政策和策略的正确方法

有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还必须在执行时采取正确的原则和方法。没有正确的原则和方法,就不能很好地贯彻政策和策略,就会减弱正确政策和策略的作用和威力,甚至会使政策和策略受到歪曲和破坏。

首先,党的政策和策略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政策和策略来源于实践,也要到实践中去检验。毛泽东认为,实践是检验政策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1~144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6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页。

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①他还认为,政策策略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决定并为发展生产力服务的。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检验一切政策策略好坏和作用大小的根本标准。同时,在执行政策之前,必须向广大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的政策和策略,以减少盲目性和不必要的失误。为此,毛泽东强调:“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②。党的任务是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③。

其次,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必须坚持从全局出发,使局部服从全局的原则。在执行具体政策和策略时,要有全局观念,必须做到具体路线服从总路线,具体政策服从总政策,局部服从全局。毛泽东曾指出:“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各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④

最后,掌握政策界限,防止出现偏差。在执行政策和策略的过程中,必须同一切错误倾向进行斗争。既要注意反对右的倾向,又要注意反对“左”的倾向。因为这两种倾向都偏离了党的正确政策和策略的轨道,干扰人民群众对党的政策和策略的理解和执行。

第二节 政策和策略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

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结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以集中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人,这是毛泽东政策和策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争取一切同盟者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关于在政治上争取同盟者的问题,列宁曾经指出:“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9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6页。

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①毛泽东根据列宁这一思想，十分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同盟者。他把争取千百万群众结成革命统一战线，看成是夺取革命胜利的“法宝”。这是因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而极端残忍的，单凭工人阶级本身的阶级力量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争取团结一切同盟者。毛泽东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②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就把民众的大联合看做是拯救中华民族和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1919年7月，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热情洋溢地赞颂十月革命及其在全世界的影响，宣传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把五四运动的爆发同十月革命联系起来，号召中国人民应该起而仿效，进行我们的大联合，为争取解放而斗争。

1926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曾鲜明地提出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尖锐问题。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说：“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③他在这里讲的“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团结广大的同盟军，结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这是关系着我们的路线是否正确和革命成败的大问题。

毛泽东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战争中，反复教导全党要充分认识到团结同盟者，与同盟者结成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939年，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提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④同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地把统一战线誉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强调党的建设过程，同党的政治路线是密切地联系着的。

解放战争时期，为了争取和平民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为建立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到1947年初，形成了一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5页。

个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并逐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壮大。毛泽东多次强调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他指出:为了实现新的历史任务,“我们必须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必须巩固我们这个已经建立的伟大的有威信的革命统一战线”^①。三大改造完成后,中国共产党同各革命阶级、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已经逐步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人民政协在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的指导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实践证明,毛泽东关于争取和联合同盟者,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的一系列论述,以及党在对待同盟者问题上的成功经验,充分说明了在中国革命乃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争取广大的同盟者,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

(二) 统一战线和领导同盟者的政策和策略

世界上的任何革命斗争,都必须依靠一定的社会力量,中国革命也是这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我国工人阶级拥有广大的同盟军,可以把一切爱国的、不甘心受外国帝国主义奴役、反抗封建主义压迫的人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革命统一战线是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但是,“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②。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是革命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的关键。在民主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正确的关于统一战线和领导同盟者的政策和策略,建立和领导了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了广大同盟者。关于统一战线和领导同盟者的政策和策略,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持求同存异、既统一又独立的原则。在统一战线中,不同的党派代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有着各自不同的政治主张和思想体系。因此,在革命的过程中,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上,难免存在着差异。为了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巩固统一战线的团结,就必须遵循求同存异的原则。在重大问题上,努力寻找各方的共同点,坚持大的目标一致,最终达到合作共事的目的。对个别认识的不一致,则应当采取互相尊重的态度,只要不影响大的目标的一致性,允许保留各自不同的认识和意见,求大同,存小异,按照“既统一,又独立”的政策办事。因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7页。

为,只有“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①。然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如果认为它是绝对的,就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②。善于“求同存异”,则到处是朋友;不善于“求同存异”,则无人能够团结和争取,成为孤家寡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与许多不同的同盟者建立起广泛的统一战线,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国内和国际条件。

第二,对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的基本政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是我们的朋友,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他们仍具有一定的革命积极性;但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又有妥协性和动摇性。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由于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在参加统一战线之后仍然具有反动性,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必须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反对“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错误政策和“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错误政策。同时,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大资产阶级分裂时,要敢于并善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毛泽东指出:“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③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也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④。

第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在抗日战争时期,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⑤这一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处理各阶级、党派和集团相互关系的基本策略,也是党坚持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的具体体现。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总结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明确地把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阶级、阶层划分为左、中、右三种势力。他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左翼集团是共产党率领的群众,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中间集团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右翼集团是大地主和大资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1页。

产阶级,这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①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奠定了理论基础。“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②,就是要广泛发动各界群众,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③这三部分人虽然同进步势力有矛盾,但他们同顽固势力也有矛盾。我们的政策就是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同我们共同抗日,共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争取地方实力派同我们共同抗日,并在我们同顽固派的斗争中暂时保持中立。孤立顽固势力,就是孤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势力。对他们抗日和不敢实行全面分裂的一面,采取联合的政策,争取他们能够留在抗日阵营里;对于他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一面,采取坚决斗争的政策。

第四,在同顽固派的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在同顽固派的斗争中,毛泽东制定了“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有理”即自卫原则,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有理”就能使共产党同顽固派的斗争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有利”即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使党同顽固派的斗争取得成效。“有节”即休战原则,对顽固派的斗争要“适可而止”,要掌握适度的分寸,不要无限制地斗下去。在打退顽固派的进攻后,要主动地和他们讲团结,订立休战协定,这就是斗争的暂时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是统一战线中对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的具体运用。

第五,无产阶级政党实现对同盟者的领导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统一战线的核心力量和坚强支柱,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不可能形成革命的统一战线。然而,领导权不是自然产生的,也不是能够轻易取得的,这个领导权只有经过斗争才能取得。无产阶级政党要实现对手盟者的领导权,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关于这种条件,毛泽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不同的角度做过多次论述。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现对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是,要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并为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事变中的行动口号;二是,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模范作用;三是,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关系,发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5、39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6页。

展和巩固这个同盟；四是，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和严格的纪律性。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又指出了争取中间势力的三个条件。他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指出，争取中间势力，必须在下列三项条件下才能完成：“（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①解放战争时期，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争取同盟者的策略思想。他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高度概括了党实现对同盟者领导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②在革命中，中国工人阶级要实现领导权，必须自己最坚决最勇敢地站在革命的最前头，而且要善于争取和率领同盟者一道去向敌人作斗争并取得胜利，才能巩固群众的斗志和信心，把革命一步一步地推向前进。同时，党还必须拥有自己的实力，有明确的革命目标，有正确的政策和为革命目标而献身的精神。这样，同盟者才能信赖拥护党，承认党的领导地位，否则，同盟者就会动摇，有的同盟者甚至会倒向敌人一边。给同盟者以物质利益是第二个必备条件。在教育同盟者的同时，要照顾同盟者的利益，这也是统一战线中实现领导权的一条重要原则。没有共同的利益，就不会有统一的行动。但是，各政治盟友又各有自己的具体利益，特别是目前的现实物质利益。共产党如果不能给同盟者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物质利益，就无法赢得同盟者。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制定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例如，抗日战争时期，在政权组织方面，采取“三三制”，共产党员只占1/3，非党进步分子占1/3，中间派（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占1/3。在保证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条件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吸收广大民主人士参加的政权，照顾了同盟者在政治上的权利；在劳动政策方面，规定既要改善工人生活，又要动员工人增加生产；在土地政策方面，规定既要减租减息，又要交租交息，土地、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在税收方面，规定按收入多少缴税，不把负担集中到某一部分人身上；在人民权利方面，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其他自由权利；在经济方面，采取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所有这些政策，既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又照顾了同盟者的切身利益。由于实行了这些正确的政策，使我们能够实现对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的领导，能够在日本大举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实行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时，坚持抗日，坚持并发展统一战线，争取抗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3页。

日战争的胜利。中国革命的经验证明,共产党的领导权不是自然产生的,只有经过斗争才能取得,因为在革命统一战线之内的各政党、各阶级都在千方百计地要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共产党能够取得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除了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大公无私的先进政党之外,还在于它制定和执行了正确的路线及其一系列的政策和策略。

二、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

(一)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这是毛泽东一个重要的战略策略思想。这一思想是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像三座大山一样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使中国长期处于极端贫弱的地位。国民党反动当局还不断地散布民族失败主义情绪,使一些人因此缺乏信心,产生民族自卑感。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以解放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人,才敢于藐视强大的敌人,并紧紧依靠人民大众与反革命势力进行殊死的战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作为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战略策略思想,它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论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时说过:“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①抗日战争初期,他又深刻分析了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的四个特点,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毛泽东有力地批驳了畏敌如虎的“亡国论”,又有力地批驳了轻视敌人的“速胜论”。解放战争初期,当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全国内战,而此时的敌我力量又十分悬殊,许多人对革命前途表示忧虑时,毛泽东以他非凡的胆略向全中国宣告: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我们也能够打败蒋介石。随后,毛泽东又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这种藐视敌人的气魄和自信心坚定了全党全军的必胜信念。但在对敌斗争上党中央又为全党全军制定了打败蒋介石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原则以及一系列政策和策略,体现了在战术上对敌人的极端重视。1948年1月,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把上述思想概括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把这一思想明确表述为:“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同时,毛泽东对此还作了具体阐述。

战略上藐视敌人,就是从本质上、长远上、整体上看待反动派,把一切反动派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5页。

都看成是纸老虎；在整体上、全局上不将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更反对畏敌如虎的思想，相信人民革命力量总有一天要取得胜利。战术上重视敌人，就是指在局部或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要认真地对待敌人，把它看成铁老虎、真老虎，要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决不可掉以轻心。毛泽东在解释这一战略策略思想时说：“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他，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他。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他，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一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①所以，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就是要求我们在对敌斗争时，树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就是要求我们在对敌斗争时，树立善于斗争善于胜利的思想。只有先树立前一种思想，才有可能树立后一种思想；只有把两种思想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克敌制胜。毛泽东提出的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的思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当他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一科学论断的时候，当他提出战略上要藐视敌人的时候，他总是强调把战略上藐视敌人的思想和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结合在一起。为什么必须把战略上藐视和战术上重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呢？这是因为：

第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新生力量代替腐朽势力是自然界发展的规律，也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在社会发展史上，代表新生力量的阶级一定会最后战胜代表腐朽势力的阶级，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和它领导的革命人民，是中国土地上正在生长着的新生力量。而统治着旧中国的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虽然表面上强大，却是代表着腐朽的、垂死的势力。因此，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藐视强大的敌人，是完全有理由的。

第二，当我们提出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看成纸老虎时，这是从它们的本质上说的，是从长远观点说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革命者，特别是领导革命斗争的人们，必须在战略上、在全体上藐视他们，敢于同他们斗争，敢于夺取胜利。如果只看到敌人的强大和自己力量的弱小，就会被敌人所吓倒，就会陷入右倾悲观主义。

第三，当我们提出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的时候，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同时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8～329页。

提出在战术上,在策略上,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重视敌人。这就是毛泽东讲的要善于斗争,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采取适当的态度,讲究斗争艺术,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以便一步一步地孤立敌人和消灭敌人。不这样就会轻敌,就会陷入“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

第四,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中国共产党必须制定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及为实现这条政治路线所应采取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以便不断壮大人民革命力量,削弱和孤立反动的敌人,把这两方面,即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密切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毛泽东提出这一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战略策略思想,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论是在人类改造社会的斗争中,还是在改造自然界的斗争中,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关于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战略策略思想,其意义还在于为我们认识事物分析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首先,它要求我们要全面地看问题。毛泽东在分析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时,一方面指出它们是纸老虎,另一方面又是真老虎,必须在战术上认真对待。只看到一面而看不到另一面,必然要犯“左”的或右的错误。对待其他事物也是如此,要坚持两点论,反对形而上学和片面性。其次,它要求我们对待任何事物都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在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把握住事物的本质,而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最后,它要求我们从长远的、全局的观点来看问题,不能只顾眼前的和局部的利益。中国革命从艰难困苦到走向光明,经历了长期的过程,说明了正义的事业终究是要胜利的。总之,毛泽东提出的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战略策略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作为科学的方法论,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二) 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

毛泽东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各个帝国主义在瓜分中国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矛盾和冲突,依附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不同集团和派别也自然会产生许多矛盾和斗争。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和人民革命力量的壮大,他们之间的矛盾还会日益加剧。敌人营垒内部矛盾的存在和不断扩大,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是十分有利的。要战胜强大的敌人,除了革命先锋队十分坚定和勇敢外,还必须十分机智灵活,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攻击其弱点,发扬我方之优点,把敌人的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为我所用,在斗争中广泛争取同盟者,孤立主要敌人,实行各个击破的原则。“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就是从这些原则中归纳出来的总的策略原则。

利用矛盾,就是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分化瓦解敌人。由于中国是被若干个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对中

国的更大的控制权而发生尖锐的矛盾,并在中国寻找、扶植自己的代理人。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特别是大小军阀,以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为靠山,分裂成不同的集团,这些集团之间又始终进行着武力或非武力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①总之,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中国反动势力内部各派系之间存在的矛盾,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人民是有利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②

争取多数,就是要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同盟者,最大限度地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为此,无产阶级政党不仅要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直接的同盟者),而且要努力争取那些暂时不是主要敌人的政治力量,尽量使他们保持中立或者成为我们的暂时同盟者。

反对少数,就是要把主要矛头,指向最主要的敌人,而避免树敌过多。只有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才能达到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和各个击破的目的。毛泽东在总结民主革命时期党利用敌人矛盾的历史经验时说:“买办资产阶级始终是帝国主义的走狗,革命的对象。买办资产阶级又分属于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集团。对买办集团的斗争,要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首先对付其中的一个,打击当前最主要的敌人。例如,过去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有亲英、亲美的和亲日的。我们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就利用英、美和日本的矛盾,首先打倒日本侵略者和依附于它的买办集团。然后,再去反对美、英侵略势力,打倒亲美、亲英的买办集团。地主阶级里头也是有派别的。最反动的是少数,那些爱国的,赞成反对帝国主义的,就不要放在一起打。”^③这是毛泽东对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对敌斗争策略的生动概括。

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必须对敌人实行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政策。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在中国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严肃地批判了陈独秀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投降主义和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对各敌对阶级和集团做了具体分析,采取了一系列区别对待的政策。首先,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两部分,把民族资产阶级视为革命的动力之一,对它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视为革命的对象,对它采取革命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4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135页。

的政策。但是,由于后者又分别依附于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当革命主要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支持的买办资产阶级,则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这时,就应该而且能够对这部分买办资产阶级实行联合的政策,以打击最主要敌人。抗日战争时期,英美派的买办资产阶级参加了抗日,因此,中国共产党同他们实行联合。但是在抗日阵营内,他们实行的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革命政策。他们反对进步,破坏团结,反对抗战到底,是反共的顽固派。对顽固派在抗日方面表现的两面性,我们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对顽固派在反共方面的两面性,我们对其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方面,是实行联合的政策,在他们对共产党和对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方面,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既要对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要对主张抗日但又有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在这些区别的基础上,建立我们的政策。

其次,对农村中的地主和富农、大中小地主以及地主中的恶霸与非恶霸加以区别,对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与地主富农分子加以区别,对带有民主色彩的开明绅士和一般的地主富农分子加以区别,等等。对地主阶级和地主富农中的恶霸分子采取打击政策,对地富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采取团结政策。

最后,对于帝国主义也要加以区别。虽然帝国主义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敌人,但是,也要区别对待,采取不同的政策。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把武装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同其他当时没有武装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加以区别;把与日本结盟的德、意帝国主义同与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对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时的英、美帝国主义同放弃这种政策而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把反法西斯侵略,特别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的侵略作为压倒一切的革命任务,对英美帝国主义采取联合政策。解放战争时期,把以国共关系调解人身份出现时的美帝国主义同公然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时的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把美帝国主义同英、法等帝国主义加以区别。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对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仍然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实践证明,区别对待不同敌人的政策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坚持的正确政策,是我们打败敌人、壮大自己的锐利武器。

(三) 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击

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原则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要把斗争的主要方向指向最主要的敌人;二是在一个时期内不要树敌过多,要把

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争取到自己方面来或使他们中立。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时说:我们“打击的敌人不能太多,要打少数”,“什么都打,看起来很革命,实际上为害很大”。^①抗日战争时期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以武力灭亡中国,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引起国内阶级关系重大变化,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时,党确定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集中力量打击日本帝国主义;而把一贯仇视人民、镇压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这个敌人放在次要的地位,以便实行各个击破。

建国初期,我们在取得革命胜利的形势下,仍面临着很复杂的斗争,还有很多困难。在约有3.1亿人口的广大地区的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的斗争尚待开始,在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中,帝国主义、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特务、土匪、封建地主阶级都会反对我们。此外,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宗教界的反动势力,都反对我们,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了。同时,由于革命胜利引起的社会经济的改组,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负担。工商业尚待进行合理调整,失业的工人和知识分子尚待安置,社会上有很多人对我们不满,民族资产阶级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面对这种复杂情况,中国共产党在七届三中全会上确定了“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方针。毛泽东指出:“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按照这一策略方针的要求,就是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者,把斗争的主要方向指向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地主阶级、台湾和西藏的反动派以及帝国主义,使其陷于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②实践证明,毛泽东提出的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此外,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毛泽东还提出了在反动统治区域,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在组织上采取隐蔽精干的方针。毛泽东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③由于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和残忍,他们不给中国人民以和平活动的可能,中国人民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自由权利。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只能是通过在农村长期的、艰苦的武装斗争,积蓄和发展自己的力量,以便包围和最后战胜敌人、夺取中心城市。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6页。

但同时还必须要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具体地说就是要“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①。不能采取急性病的冒险主义的方针。要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白区工作和革命根据地的工作，灵活地、巧妙地配合起来。刘少奇指出：“只要环境允许，我们就应当尽可能地采用合法的公开的方式去进行工作。秘密的党的工作没有全部公开进行的可能，只能部分地公开进行。我们应当利用这种部分公开的可能去工作，哪怕是一点半点的公开机会都是宝贵的。”^②在白区，共产党的组织及其党员没有合法的地位，但是，共产党员在没有暴露身份的情况下，是有可能参加各种各样的群众团体的合法活动的，通过这些合法活动去接触、联系群众，建立各种合法的社会团体，在这些团体中采用合法的形式去团结教育群众，保护或争取工人群众的权益。例如，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利用国民党政府的工厂法、工会法中那些对于改善工人阶级状况有利的条文，来组织工人的斗争，要求实现那些条文中规定的权益。当国民党政府拒绝这种要求时，我们即可以揭露其虚伪性、欺骗性，以教育工人群众。再如，对于黄色工会，也可以派人加入其组织、参加活动，利用其合法的招牌，争取工人群众。总之，就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斗争方式，广泛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展革命力量。由于我们党在敌人统治的区域采取了灵活巧妙的对敌斗争策略，就使我们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争取了中间力量，孤立了反动派。而且，毛泽东还提出，对被打倒的反动阶级的成员和反动分子，只要他们不捣乱，不造反，都给以生活出路，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等等。

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使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不但赢得了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拥护和支持，而且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地主阶级中的开明绅士、国民党的一些地方实力派，壮大了革命阵营，分化、削弱了敌人力量。因此，党在任何时候都拥有广泛的社会政治基础，能立于不败之地。民主革命的胜利需要统一战线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业同样离不开统一战线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6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2页。

第八章

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理论

毛泽东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文化工作和科技教育工作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思想文化和科技教育工作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经过长期实践得出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科技、教育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第一节 思想政治工作理论

一、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重要保证,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优良传统。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党中央的文件中就已经明确地把政治工作比作“生命线”。1934年2月在江西中央苏区召开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大会上的讲演中指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你们是领导者,每一战斗的胜利离不开你们,离不开政治工作。在这次会议上,朱德、王稼祥等反复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在《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一文中,又专门论述了“革命的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和灵魂”问题。1944年4月,经毛泽东修改过的留守兵团政治部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中指出:“政治工作是我们军队的生命线,无此则不是真正的革命军队”。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结合党执政后新的实际,进一步阐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1955年,毛泽东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①的著名论断,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9页。

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进行了科学的理论概括,从根本上确立了思想政治工作 in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要地位,这对于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进一步论述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对于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重大意义。他指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① 以上情况表明,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都一贯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肯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作了进一步明确、肯定的回答,《决议》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一种更加科学规范的表述。

思想政治工作的这种“生命线”地位,主要是通过它对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的保证作用体现出来的。

第一,思想政治工作为其他一切工作指明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各项工作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是党在各项工作中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思想工作的保证作用,集中表现在它要教育人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工作中自觉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同违背社会主义政治方向的错误思想和行为进行斗争,以保证我们的一切工作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如何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保证经济建设的成果为广大劳动人民共同享有,这些重大问题的正确解决,要靠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要有各种具体的法规、措施和强大有力的组织工作,也还要依靠坚强的思想政治工作。

第二,思想政治工作能从根本上保证劳动人民以主人翁的姿态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为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自己的事业,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觉悟、智慧和力量,才能取得成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大意义之一,就在于它能够使劳动者振奋精神,激发对自己工作的责任感、自豪感和光荣感,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经济建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动力。

第三,思想政治工作能防止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人们思想的侵蚀,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还将长期存在。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用无产阶级思想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

任务。思想政治工作是抵制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人们思想侵蚀的一个重要手段和途径。只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用正确的思想理论教育群众,批评各种错误思想,消除人们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困惑,才能使广大群众形成健康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才能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第四,思想政治工作是保证各项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这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按照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律办事。用这样的思想方法教育人民群众和党员干部,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之一。同时,思想政治工作也是保证党和国家法规、政策正确贯彻的重要手段。通过思想教育,可以为贯彻执行国家政策、法规扫除思想障碍,化解各种矛盾,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①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经常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

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我们观察社会、认识社会的理论武器。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强调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列宁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建国以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党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间广泛地开展学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活动,引导人们去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并把它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极大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坚定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我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世界观是人们对于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毛泽东指出,世界观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引导人们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标之一。人生观是对人生目的和意义的根本看法和根本态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人生观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看做是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人生的崇高目的和最大幸福。“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人生观的核心和精髓。价值观是指人们对事物有无价值和价值大小的一种判断和评价标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就是引导和帮助人们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培养、确立集体主义价值观,反对个人主义价值观。

第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是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用爱国主义教育人民群众,以扫除民族自卑心理,振奋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凝聚力。集体主义,是指人们的一切言论行动以合乎广大群众的集体利益为最高标准的思想体系。进行集体主义的教育,关键是教育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社会主义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历史选择,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得出来的正确结论。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更大的优越性,这已被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所证实。

第四,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形势任务教育。毛泽东指出:“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①党的政治路线,是党在一定历史阶段为了达到某一目标,实现某一任务所要走的道路,政策则是实现党的路线的行动准则。党的正确的方针和政策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是人民群众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体现。因此,应该通过教育,使广大群众理解党的方针和政策。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②毛泽东批评那种在一些领导机关中存在的对党的政策只让领导人知道,不让群众知道的现象和做法,认为“这是我们的有些工作不能做好的基本原因之一”。他告诫全党,“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动手,反对只依靠少数人发号施令”^③。

经常对党内外群众进行形势任务教育,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毛泽东一贯重视对党内外群众进行形势教育。他的许多著作、报告和文章,都是讲各个历史时期国内外形势的。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每当发生重大的历史变化和转折,往往有不少人思想准备不足,跟不上不断变化着的客观形势,表现出急躁冒进或悲观动摇的情绪、思想和行动。实践证明,正确地分析和认识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8页。

形势,对于克服困难,鼓舞斗志,保持清醒的头脑,增强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信心是极为必要的。毛泽东认为,要学会用科学的方法分析形势。他指出,要“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①;要学会辨别支流和主流、局部和全体、现象和本质的本领;他告诫全党,“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②等。这些方法,对于正确地分析形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五,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教育。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教育是被革命实践证明了的党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有效方法。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艰苦奋斗中形成的革命精神和行为风尚。它是党的历史经验的结晶,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倡导的党的三大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以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克己奉公,拒腐蚀、永不沾的作风,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英勇奋斗,勇往直前的精神和作风,一直是党教育人民,激励人民奋发向上,献身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巨大精神力量。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华民族的无数优秀儿女,跟着共产党,英勇奋斗,前赴后继,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全国人民继续保持和发扬了这些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创造了伟大的业绩。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教育,有利于振奋民族精神,弘扬社会正气,抵制和克服自私自利、骄傲自满、贪图享乐、腐化堕落、萎靡不振、官僚主义等坏作风和坏习气,陶冶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情操。

三、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

在长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正确方法。其中,坚持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是最基本的方法。

思想政治工作是解决人民群众的思想问题和认识问题的途径和手段。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认识问题。毛泽东指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③所谓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就是在平等的基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7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

基础上,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运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必须遵循以下基本要求:一是,要尊重人。教育者要把教育对象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发扬民主,以诚相待,以平等的态度进行双向交流。二是,要以理服人。教育者讲述的思想理论必须合乎实际,反映事物的本质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因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①。这是以理服人的生命力所在。三是,要有的放矢,注意针对性。要根据受教育者的思想情况、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因人施教,这样才能取得积极效果。总之,对待思想认识问题,只能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任何企图用压制的做法,简单行政命令的做法,都是违反思想认识发展规律的,也是违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是行不通的。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说明,实事求是地摆事实,讲道理,是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强大威力的关键所在。

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不断地由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传家宝,是党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宝贵经验。从一定意义上讲,党正是靠思想政治工作起家的。从理论上说,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实施政治领导的基本方式,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一个重大的政治原则。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值得记取的教训。就教训而言,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左”的错误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曾把思想政治工作置于一种不适当的地位。特别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左”倾错误,大搞“突出政治”,鼓吹政治工作可以“冲击”一切,可以“取代”一切,这就把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军事工作、技术工作和其他一切业务工作看成根本对立的关系,否定了“政治和经济统一”的正确原则,搅乱了人们的思想,致使我党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遭到严重损害,思想政治工作的威信大大降低,思想政治工作是“生命线”的作用也受到一些人的怀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理论上实现了拨乱反正,重申了毛泽东关于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的原理,摆正了思想政治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坚持思想政治工作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的原理,肯定了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坚持了我们党一贯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也为新时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指明了方向。

第二节 文化工作理论

一、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社会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毛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泽东从分析文化同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入手,对文化的本质及社会作用,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的基本观点”^①。作为历史唯物论者,毛泽东首先强调必须坚持经济对文化具有决定作用的观点,即“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毛泽东认为,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决定着一定社会的文化的性质。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中,它具有阶级属性的一面。政治是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文化在同经济发生关系时,也通过并主要通过政治发生作用,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其次,毛泽东又肯定了文化对于政治和经济的反作用。文化一方面积极地推动和帮助新的经济基础和新的上层建筑的形成和巩固,另一方面又积极地为消灭已经过时的经济基础和旧的上层建筑而斗争。历史上的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总是利用文化去维护和巩固反动的政治和经济,而革命的阶级,又总把文化作为推翻反动的政治和经济,建立新的政治和经济的精神武器。正是基于对文化性质和社会功能的这种认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十分重视文化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无论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都把文化战线作为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指出,文化工作是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重要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②。毛泽东还正确地评价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产生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文化军队的伟大作用。他指出:“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③毛泽东关于文化和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是我们认识文化的本质和作用的重要理论依据。

二、文化工作的基本方针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在总结中国近百年来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和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7~698页。

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发展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坚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方针。历史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具有长远意义的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针。建国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又在这一总的方针的指导下,提出了一系列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

(一) 为人民群众服务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文化工作的根本问题。毛泽东历来重视人民,指出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也是文化工作的基本出发点。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①1942年,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针对当时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明确地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正确方向。他强调: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建国后,毛泽东又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提出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二)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建国以后,毛泽东根据我国迅速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在1951年和1953年分别为戏曲领域和历史领域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和“百家争鸣”的口号。1956年,毛泽东进一步把这两个口号概括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作为繁荣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方针提出来。百花齐放是发展艺术的方针,百家争鸣是发展科学的方针。强调,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双百”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正确方针,是发展科学和艺术的必由之路。

(三)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正确地对待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化成果,批判地吸收人类文化遗产,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很多精辟的论述。列宁曾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①。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②。

在中华新文化建设中,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批判地继承人类文化遗产的思想,正确总结了我国文化建设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要批判地吸收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化成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服务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这些思想后来被明确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从纵、横两个方面具体阐明了对待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的态度。在对待中国古代文化遗产问题上,毛泽东认为:“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③他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应当给予总结,应当批判地吸收古代文化遗产,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在对待外国文化问题上,毛泽东指出: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鉴;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这就是说,对待外国文化既不能采取狭隘的民族主义态度,盲目排外,夜郎自大;也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崇洋媚外。必须同样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三、科技工作的方针

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生产力的杠杆。为尽快地发展新中国科技事业,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方针和政策。

(一)“向科学进军”的战略思想

对科学技术在社会进步中的重大作用,中国共产党早有认识。1940年2月,毛泽东在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讲话时指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人们为了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自然科学是一个好东西,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研究它。毛泽东从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出发,对自然科学在人类解放中的重要作用作出了科学概括。陈云在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把自然科学与发展生产力联系起来,他指出:“自然科学的研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究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力,可以大大地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共产党对自然科学是重视的,对于自然科学是尊重的。”^①

在革命战争年代,党更多地是把科学与战争的胜利联系起来,1941年,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举行的第一届年会上,朱德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的《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抗战建国过程中,不论是要取得抗战胜利,或者建国成功,都有赖于科学,都有赖于社会科学,也有赖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这是伟大的力量”,“谁要忽视这力量,那是极其错误的”。^②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十分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对解放区建设的重大作用,因此,积极提倡科学研究、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组建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成立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等。但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也明确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受制于社会制度的。对此,毛泽东指出,自然科学的发展如同生产力发展一样,受到旧社会的阻碍,所以要改造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就必须扫除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障碍,建立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新制度,为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创造先决条件。

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根本基础。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目标的确立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一直在考虑“向科学进军”的问题。建国初期,毛泽东多次阐述向科学进军的思想。他认为,技术革命应作为夺取政权后的党的主要工作,学科学、学技术应成为全党的重要任务。他指出,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1956年1月,周恩来在代表党中央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

“向科学进军”,不仅仅是党中央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的一个号召,而且也是党关于发展科学技术的一个总方针,是党提出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思想。它包含三层含义:

第一,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工作重心转移后对主要任务的认识。在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完成后,党的工作重心全面转向经济建设,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党的领导人对此有明确认识。毛泽东认为,我们“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③。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要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经济建设

^① 《新中华报》,1940年3月15日。

^②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6页。

^③ 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97页。

上来。“向科学进军”是党的主要工作转向经济建设的重要标志。

第二,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打算依靠科学技术来根本改变中国生产力落后的状况。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依靠什么?周恩来指出,要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改善。他认为,“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巩固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①。向科学技术进军就是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来推动经济建设,这是迅速改变我国社会经济落后面貌的最有效手段。

第三,它反映了党对科学技术地位和作用的正确分析,奠定了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的重要基础。知识分子问题同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同利用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正是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周恩来提出了依靠知识分子的问题。他指出:“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②

(二) “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战略方针

重点发展,迎头赶上世界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是中国共产党20世纪60年代为加快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而制定的战略方针,其基本精神是,尽量瞄准当代世界的新兴尖端科学和技术,尽量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加快我国科技发展步伐,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在具体发展过程中,在选择和确定科学技术项目时,必须根据我国国力有限的实际情况,突出重点,集中力量,以免分散力量。这一战略是中国共产党从本国实际出发,准确把握科技的发展趋势而作出的正确的战略选择。这一战略被用于实践中,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中国科学力量被集中起来,瞄准对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有重大价值的尖端科学,实施重点突破,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使我国相继试验成功原子弹、导弹、氢弹、人造地球卫星,并带动了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机、激光技术等一批新兴科学技术的发展。

(三) 团结科学家,大力培养新生的科学力量的方针

人才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关键。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科技人才十分缺乏,全国科学技术人员不超过5万人,其中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不到500人,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只有30个。人才的缺乏成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主要障碍。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给予科学技术事业密切关注。新中国成立仅仅一个月,中央政府首先批准在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延安自然科学学院的基础上组建中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2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0页。

国科学院。为了加快我国科学技术力量和科技实力的培养和发展,1954年春,中共中央批转中国科学院党组的报告,明确提出团结科学家,大力培养新生的科学力量的方针。随后,党和政府又把人才的培养和我国科技发展结合起来,提出以下战略措施:一是按照我国急需的门类选派优秀科学工作人员出国学习,回国后立即在科学院和政府各部分别建立发展这些科学技术的基础,并大量培养新骨干;二是聘请若干组外国专家,帮助我国建立有关科研机构,培养干部,开展科研合作;三是组织大批科技人员向正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学习,研究和掌握苏联援建项目中的新技术;四是集中最优秀的人才进行科学研究,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之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五是大力发展高等学校中的科研工作,并大量培养合乎现代水平的科学技术的新生力量;六是政府各部应迅速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同科学院进行合理分工与合作,扩大科研队伍,并且负责把世界科技的最新成就,有计划有系统地介绍到实际应用中去,以便尽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技术把我国各方面装备起来。^①

党的大力培养新生力量的方针起到了重要作用。1955年,全国科研机构已有840多个,科学技术人员达40多万人。1965年科研机构发展为17144个,科技队伍也由1957年的120万人,发展到1963年230万人。他们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中坚力量。

(四) 全面规划,加强指导的方针

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实现的。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科技力量弱小,力量分散。为了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必须加强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划和指导。周恩来指出,发展科学技术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没有全面规划,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另一种办法是“作出全面规划”。发展科学技术必须“作出全面规划,有系统地提高我国科学水平”^②。1958年3月,国家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明确了科学规划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制定了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长远规划,即《1956年至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这个规划的指导思想,就是“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使十二年后,我国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③。《1956年至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体现了我国当前的急需和现实可能,确定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12个重点任务,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指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0~181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2~183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4页。

明了方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该《规划》提出的主要任务于1962年提前完成。该《规划》的实施,建立和发展了我国的原子能、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机技术、喷气和火箭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领域,并促进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诞生和发展,经过短短几年的努力,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提前完成《1956年至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基础上,1962年,全国科学工作会议研究讨论制定了《1963年至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毛泽东就制定这一新的规划作出指示,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该《规划》安排了重点科研项目374项,其中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急需项目333项,占89%,基础研究项目41项,占11%。这个规划对指导我国科技事业的继续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历史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对科学技术事业采取的全面规划、加强指导的方针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也要全面加强对科学技术事业的宏观指导。

四、教育工作的原则和方针

教育是一种按照一定目的和要求培养人的有计划的社会活动。教育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指导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理论,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教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理论原则。

(一)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教育总是与一定的经济、政治相联系的。在阶级社会中,教育总是阶级的教育,必然由掌握政权的阶级通过政治组织、法律形式和思想意识影响来控制教育。而教育对经济和政治又不是消极的,它主要是通过培养人来为社会政治服务的。我们的教育,从根本上来说,是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一代又一代接班人。教育的这种性质,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就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制定的教育方针,都具有鲜明的社会政治性质和正确的政治方向。正是这种教育制度的鲜明特征,体现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社会属性。为了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在对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改革中,建立了党的领导制度和思想政治工作制度,保证了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在教育事业的发展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一贯重视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①的重要思想。学校教育必须坚持正确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

的政治方向,这已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体现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指导方针,也是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区别于以往历史上任何教育制度的根本标志。

(二)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教育方针是国家根据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的需要而确定的一定时期的具有全局性的教育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或行动纲领。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教育方针的制定。1934年1月,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学说,制定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即: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教育方针,即: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制定的教育方针,适应不同历史阶段的要求,反映着时代精神。毛泽东关于党在社会主义时期教育方针的论述,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贯穿于社会主义培养目标之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教育事业的本质特征,对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起着长远的指导作用。

(三) 依靠人民群众,采取多种形式办学

办学方针是以什么样的精神来指导办学体制的大问题。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教育基础薄弱,教育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大国,如何在现有基础上尽快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建立适合中国实际的教育新体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根据中国农村的特点,提出了多种形式办学的思路。他指出:“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①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进一步适应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发展对人才的需要,毛泽东主张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采取“两条腿走路”,实行多种形式办教育的方针,即实行国家办学与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办学并举,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举,成人教育与儿童教育并举,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1~1012页。

并举,依靠专门的教育工作者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相结合的办法,尽快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周恩来、邓小平提出实行“一要普及,二要提高”的“两条腿走路”的教育思想。他们根据中国人口众多而素质不高的特点,主张办好基础教育,同时努力办好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成人教育、职业中等技术教育,做到教育的普及与提高相结合。1958年,刘少奇依据多种形式的办学方针,提出了实行“两种教育制度”的思想,即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

毛泽东等关于依靠人民群众,采取多种形式的办学方针,关于“两种教育制度”的设想及实践,是新中国成立后对我国教育发展道路的一种积极探索。这些探索,为建立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教育新体制打开了思路,并对发展中国教育事业产生了积极影响,成为我国后来改革教育结构,发展多种教育形式,实行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办学的先导。

(四) 坚持正确的教育原则和方法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教育的实际,对教育工作的理论原则及教育方法曾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思想。其中包括:第一,提出学校教育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毛泽东十分重视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但同时指出学习理论的目的在于实践,强调理论的实际应用。他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科学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革命学风的意义和内容,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学风。提出学校教育也必须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强调学生应尽可能多地接触社会实践,不能读死书,要注重应用。第二,毛泽东主张教学要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早在1929年,毛泽东针对红军教育的问题就提出启发式(反对注入式)的教育方针。以后又多次重申这一方法的重要性,尤其对高等学校的教学,他极力反对向学生满堂灌,倡导学生自己研究问题,教师要少讲;主张学生大胆主动地学习,“自己看书,自己思索”,再加上“共同讨论,共同研究”,提出问题,请教师加以解答。他强调学校一定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研究问题的能力上,使学生成为具有真才实学的人。这些教育原则和方法至今对教育工作仍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三节 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政策

一、知识分子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知识分子是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这一点,毛泽东曾给

予正确的评价。他说：“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①。历史证明，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作用是由他们自身的特点决定的。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一样，遭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与剥削，他们绝大多数都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要求。他们的革命特点表现为追求真理，向往光明，主张革命。特别是他们或多或少具有现代科学和文化知识，思想活跃。在中国民主革命中，他们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一支重要的方面军。“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就是显明的例证。”^②中国知识分子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中所起的某种先锋队的作用，对传播先进的思想文化，特别是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农运动相结合，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在革命事业中的地位予以恰当的评价，他说：“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③他要求“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④。

中国是一个经济贫困、科技落后、教育水平低下、文盲众多的国家。中国人民的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and 赶超世界科技水平都离不开知识分子。还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他提出，“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⑤。

建国以后，新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我们这样原来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进行建设，能否迅速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是决定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一个关键。因此，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就具有更加突出的地位。毛泽东多次指出：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周恩来在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代表党中央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全面地论述了知识分子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关系。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1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0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2页。

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决定性的因素。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他指出,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奋起直追,付出最紧张的劳动,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他强调指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也指出: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知识分子在建设事业中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建国以来,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科学、教育、文化事业才取得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发展,在许多尖端科技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一部分

知识分子从其经济地位来看,虽然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或阶层,但他们的绝大部分属于劳动人民的范畴。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历来有明确的论述。1933年瑞金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公布的《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规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出身,依其家庭成份决定”;“知识分子在他们从事非剥削别人的工作,如当教员、当编辑员、当事务员、当著作家、艺术家等的时候,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1948年毛泽东多次论述过作为我国人民革命和人民政权的主体的劳动人民,是一切体力劳动者(如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等)以及和体力劳动者相近的,不剥削人而又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

建国前后,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进一步指出,脑力劳动者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①。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的文件也重申了这一观点。《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规定:“凡受雇用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为其中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者主要来源的人,称为职员。职员为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凡有专门技能或专门知识的知识分子,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从事脑力劳动,取得高额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例如工程师、教授、专家等,称为高级职员,其阶级成份与一般职员同”^②。依据经济地位来分析阶级属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党在这一问题上是十分清楚的。1956年,社会主义改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9页。

②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七),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4页。

造完成以后,党考虑到我国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建国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在思想上、政治上有了显著进步的情况,又考虑到建国以来党又培养了大量的新知识分子。因此,1956年1月,周恩来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代表党中央明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著名论断作为全党的政策指导和对知识分子整体上的正确估价,是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个重大发展。但是,1957年,由于党在阶级斗争理论上和对知识分子认识上,滋长了一种“左”的思想情绪,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状况产生怀疑和不信任,导致对他们阶级属性的判断错误,提出了按世界观的状况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标准。毛泽东错误地认为,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从此,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就被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了。20世纪60年代初,党开始纠正在知识分子工作中的偏差。1962年2月至3月间,周恩来在广州召开的两个会议(全国科学规划会议和话剧、歌舞、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重申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坚持了马列主义的正确观点。陈毅受周恩来委托在会上作了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即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接着,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进一步重申了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观点,指出“如果还把他们看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这就恢复和肯定了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正确估价和论断。

三、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如何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如何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一个重大而迫切的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是有过出色成就的。1939年毛泽东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就是一个正确对待知识分子,放手吸收知识分子发挥其作用的著名文献。毛泽东在决定中除阐明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外,还明确批评了党内存在着对知识分子作用认识不足,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要求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参加政府、参加学校等工作;对他们中表现好,够条件的要吸收他们入党;要注意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培养的工作。为贯彻中央的政策,1941年中央军委专门发出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指示,要求对“各种人才一律以他们的专门学识为标准,给以充分的负责工作,如工厂厂长、医院院长等等,而不是以他们的政治认识为标准。对他们应有充分的信任”。要求注意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要使他们及其家属无生活顾虑,安心工作”。“要尽

可能购置他们所需要的科学设备,在战时要尽力保证他们的安全。对他们的工作条件,漠不关心与狭隘克扣态度是不应当的”^①。这种“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战略决策,对抗战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建国以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都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建国初期,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基本是正确的,也比较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1956年1月,周恩来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宗派主义倾向,指出那种“对于怎样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漠不关心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提出,应该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应该让他们有职有权,应该尊重他们的意见,应该重视他们的业务研究和工作成果,应该提倡和发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学术讨论,应该使他们的创造和发明能够得到试验和推广的机会”;“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包括政治待遇的改善)。他强调指出,这“是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一些必要的条件”^②。同时,他也指出,还要给知识分子以教育,帮助他们确立革命人生观和科学的世界观。周恩来的上述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四、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知识分子有很大的革命性,但他们的弱点是容易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往往对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特别是对工农群众的伟大作用估计不足,在其未下决心和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时,在思想上往往是不切实际的,行动上常常是动摇的。这种弱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因此,必须到群众的伟大斗争中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才能真正成为革命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还在于这是革命斗争的实践需要。在民主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军,但不是革命的主力军,革命的主力军是工农大众,“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③,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依靠这支军队,中国革命才能最后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知识分子也要到工农中去,到社会实践中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为了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就必须引导他们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这是党对知识分子的根本要求。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提出“又红又专”的口号,

① 《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0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8、169、170、17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4~565页。

他指出：“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问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有的，但是内容变了。”^①红与专，是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红，就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坚决拥护和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专，就是掌握有关专业知识，具有专业技能。知识分子应该做到又红又专。毛泽东在1950年代提出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的口号，强调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他指出，如果我们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得什么别的有益的工作，对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在注意力转移到技术革命方面之后，也不能忽视政治，“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②。毛泽东对那些不问政治的人提出严肃的批评，他指出：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针对着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一伙对毛泽东这一思想肆意歪曲，鼓吹空头政治，散布“知识越多越反动”和“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反动观点，诬蔑为祖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而刻苦钻研的知识分子是走“白专”道路，颠倒了是非关系和敌我关系，一度在人们思想上造成极大的混乱。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对林彪、江青一伙的谬论进行了严厉批驳，正确阐述了党的又红又专的方针。他指出：“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③邓小平的上述论断，提出了“红”的客观标准，纠正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左”的错误观点，为我们坚持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方针指明了方向。

又红又专不但是党对知识分子的根本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知识分子的客观要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支宏大的掌握着高度科学技术文化水平和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队伍。知识分子应该以又红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2页。

又专的标准要求自己,培养自己。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注意同工农相结合,要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刻苦钻研业务,对业务精益求精,在思想上和业务上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要脚踏实地到群众中去,自觉地增强组织性和纪律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伟大斗争中,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做到又红又专。

第九章

党的建设理论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在成功地解决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创建的、符合中国共产党发展规律的党的建设理论。党的建设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建设学说的创造性发展。

第一节 党的思想建设和政治建设

一、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特点

中国共产党是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特殊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艰苦斗争和曲折磨炼中,在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如何解决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何处理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如何处理武装斗争等问题的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逐渐形成了自身建设的特点。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建立起来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发展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定了中国人走俄国人的道路的决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理论为中国建立一个工人阶级政党提供了理论基础,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则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树立了榜样。中国共产党正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论和风格建立起来的。党成立初期,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对产生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如何适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实际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还缺乏认识。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

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严重地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最后发展为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几乎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在抵制和反对各种错误倾向,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中,使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地发展壮大起来。

第二,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同共产国际的指导有着密切的联系。从1922年7月党的二大到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中国共产党是作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而存在、发展的,不能不受共产国际政策和策略的影响。不可否认,共产国际在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方面,曾起过积极作用,但也有过错误的指导和干涉。他们远离中国,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因而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不可避免地会有失误。这些错误的指导,必然会严重影响党的建设和发展。

第三,中国共产党是在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同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旧中国由于现代工业十分落后,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却占大多数。特别是由于党的主要力量长期立足于农村,处在分散而残酷的武装斗争中,这就决定了党的组织构成主要是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人,不可能做到以工人成分为主。这些人加入共产党时,不可能彻底地无产阶级化,往往还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即使是工人群众和工人党员,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也极易受到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必然在思想方法、政治倾向、组织生活等方面顽强表现出来。因此,如何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改造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经常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第四,中国共产党是在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锻炼成长的。在党的历史上,如何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題,始终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特别重要的问題。中国资产阶级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妥协性、动摇性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曾多次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在抗日战争时期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①只有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方针,才能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使党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8页。

得到巩固和发展,才能在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过程中,使党的自身建设走向成熟。

第五,中国共产党是在创建红军、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和长期领导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的。武装斗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显著特点,是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军队是武装斗争的组织形式。如何在创建红军、进行武装斗争中建设党、发展党,是党的建设中必须解决的课题。中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客观环境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长期在农村发展。192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心转入农村,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革命队伍为了积蓄自己的力量,长期深入农村,把落后的农村改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改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以逐步夺取革命的全部胜利。在农村,党不仅要着重解决自身建设的问题,还必须领导人民进行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学会一套治国安民的本领。因此,如何在被敌人分割的、坚持游击战争的、分散的个体经济的农村根据地里,建设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有严格纪律的、集中统一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是中国共产党所遇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新课题。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适应上述特殊条件的要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理同中国共产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

二、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

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是毛泽东依据中国共产党建设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而提出的一个极具特色的建党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首要任务。

(一) 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的必要性

第一,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是由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多数的国情决定的。在中国,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加入到中国共产党内来是必然的。特别是当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入农村后,党组织不仅在外直接处于汪洋大海般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之中,而且在党内,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份出身的党员占了大多数。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把小资产阶级的和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观点和作风或多或少地带到了无产阶级政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成为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如果不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不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中国共产党就不能顺利前进。因此,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分析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和危害,强调必须把思想教育和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

第二,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是中国共产党同资产阶级的团结合作的需要。在民主革命中,资产阶级成为党团结、联合的对象,在同资产阶级交

往的过程中,他们的腐朽思想随时都会侵蚀党的肌体。这就加重了党抵制和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任务。毛泽东强调,在统一战线中,资产阶级会“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力求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力求使革命果实归于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①。资产阶级企图在思想上“溶解”共产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取消共产党,对共产党进行腐蚀和引诱。党内如果不加强党性修养,部分不坚定分子就会变成资产阶级的附庸和尾巴。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自己队伍的思想教育,一切从严要求,这样才能确保党的纯洁性,确保党的领导的巩固和发展。

第三,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一建立就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还来不及用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自己。虽然,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精神并不比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逊色,然而,中国共产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党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还缺乏完整的、统一的了解。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普遍的理论指南。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使之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同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划清界限,并科学把握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而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

(二) 党的思想建设的内容和途径

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必须着力解决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更重要的是要在思想上入党的问题。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更重要的是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这是毛泽东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出的重要课题。在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不少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加入党的队伍中来,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革命所需要的。但是,一些人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却没有入党,或未完全入党。所谓思想入党,就是要求共产党员牢固地树立起共产主义的思想,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树立起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从而自觉地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是对共产党员的最基本的要求。而小资产阶级思想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是与此要求相背离的。只有通过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解决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思想入党问题,才能有效地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

加强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是党的思想建设的基本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8页。

内容。毛泽东强调要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党员,以此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从而自觉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全面分析了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指出这些思想若不彻底纠正,就会妨碍党的政治路线的执行。毛泽东认为错误思想根源主要是党员中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身份所致,但也指出缺乏思想教育是一个重要原因,强调必须加强思想教育,使党员的思想 and 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强调必须在整风中对全党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克服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加强思想教育,开展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使每个党员都能从思想上完全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思想上真正从非无产阶级思想中脱胎出来,转入无产阶级思想轨道。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还必须坚持对党员进行以党章为主要内容的党的基本知识教育,使每一个党员,弄清楚党的无产阶级先进性,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争取做一个合格的甚至优秀的共产党员。

加强党员的党性锻炼和思想修养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途径。毛泽东强调党内思想改造的目的在于使自己的成员真正无产阶级化,具备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因此,中国共产党对党员提出了进行党性锻炼和思想意识修养的要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提出了自我改造、自我教育的必要性。认为在改造世界的斗争中,既要“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系统论述了党内思想政治修养的目的和途径,是加强党员党性锻炼和思想修养的指导性文献。刘少奇从共产党员担负着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历史使命出发,指出党员在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斗争中,必须以高度的自觉性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加强自己的党性锻炼和修养,同自己身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做一名纯正而高尚的党员。强调共产党员在党性修养中,最重要的是思想意识的修养,即“自觉地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克服和肃清各种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②。

三、党的建设要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

把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紧密联系起来,从政治上建设党,是毛泽东党建理论的重要内容。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党的建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8页。

设则关系到党的政治路线的制定和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理解党的建设与政治路线的辩证关系,密切联系政治路线进行党的建设,使党发展壮大并领导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一) 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进行党的建设的必要性

任何一个政党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并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指导自己的行动,都必须制定出自己的政治路线,提出明确的政治主张,并使之与党的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毛泽东明确指出:“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①

第一,党的政治路线为党内教育规定了基本内容,这是党巩固和发展的思想保证。早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就提出对党员进行正确路线的教育,教育党员认识到党的政治路线是人民利益在政治上的科学表现,认真贯彻党的正确路线,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否则,谈为人民谋利益是不可能的。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又从政治路线的高度,强调全党只有在思想上认识到党的正确路线教育的重要性,才能使党在突然事变中立于不败之地。以正确政治路线为内容教育全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这就为党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思想保证。

第二,党的政治路线为党的政治建设指明了方向,是党巩固和发展的政治基础。党的政治路线科学地指明了党的政治任务以及实现政治任务的条件和手段。密切结合党的政治路线进行党的建设,就会使党的各级组织始终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排除“左”、右倾错误的干扰,保证党的正确政治领导的实现。

第三,党的政治路线为党的组织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党在组织上巩固和发展的根本条件。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需要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发展壮大党员队伍。毛泽东指出,党的政治路线是搞好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政治条件。要建设一支宏大的党员队伍,就要吸收优秀的工农、知识分子入党,并要求每个共产党员都成为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模范。健全和巩固党的各级组织,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成为坚强的指挥部,使党的各级组织成为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战斗堡垒。这些要求的实现,无疑有助于党组织的巩固和发展。

第四,党的政治路线使党的发展有了可靠的群众基础。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保证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同时,在人民群众不惜一切为实现党的政治路线而斗争的过程中,必然涌现出大批先进分子和英雄模范人物,他们不断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又有助于扩大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提高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页。

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制定、实现政治路线的过程中,逐步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

(二) 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进行党的建设的基本途径

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建设党,就必须把党的建设寓于政治路线的实施过程中,也就是说要在实现这条路线的过程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使党真正成为坚强的、政治上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毛泽东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谓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结合,主要是指同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密切结合,也就是说,党的建设总是同党能否正确处理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密切地联系着。

第一,党的建设是在同统一战线的密切联系中进行的。统一战线问题,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同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关系问题。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与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这就使党的建设与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密切相关。如果中国共产党在应该同资产阶级联合时不联合,党就不能前进;同样,在应该同资产阶级进行“和平”的斗争甚至严肃的武装斗争时而没有斗争,那党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毛泽东强调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必须既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又反对右倾投降主义,从而更好地发挥党组织的作用,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

第二,党的建设同武装斗争密切相关。武装斗争是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建设不仅要密切结合统一战线来进行,还要在密切联系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发展。毛泽东一贯重视在武装斗争中建设党的问题。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指出:“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我们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我们的党的建设。我们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十八年来,我们党是逐步学会了并坚持了武装斗争。我们懂得,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十八年来,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①

第二节 党的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

一、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

党的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物质基础,是实现党的各项任务的可靠保证。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9~610页。

党的组织建设的根本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毛泽东认为,从组织上建设党,主要是依靠民主集中制原则和严格的纪律把党建设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他强调民主集中制原则是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原则,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才能保证党的思想上的统一,组织上的巩固和发展。

(一)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它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了起来。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把民主集中制表述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从而准确说明了民主集中制是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

第一,民主和集中的涵义。所谓党内民主,在本质上讲,就是党员在党内的民主权利。在党内,党员之间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只有职位不同而无高低贵贱之分。每个党员公平地享有选举权,监督权,提建议、意见的权利,共同管理党内的党务。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由党员群众民主选举产生,并接受党员群众和选举单位的监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决议,必须在民主基础上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并由党员群众或党员代表决定,其贯彻执行也必须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群众和下级组织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但这种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党的领导下的,而不是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状态。所谓集中,就是要求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现党的意志统一和行动一致,党内要讲权威,要讲服从。每个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都必须受党章和党的纪律的约束,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党的决议。党内的集中是按照“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各个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的原则来建立的”^①。

第二,民主制与集中制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民主集中制既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党内既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二者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发扬民主是实行集中的前提和基础。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内民主生活,给党员以民主权利,这样,才能形成正确的集中。如果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意见不能从群众中来,就不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样的集中和统一,就只能是假的、空的、错的。另一方面,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必须实行集中。因为只有在充分民主基础上集中起来的意见、决议,才是正确的,才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党的意志,才能使党有统一的意志、步调和行动,党才有力量。没有集中,就没有党组织的整体,就没有坚强统一的党。离开集中讲民主必然走向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离开民主讲集中必然导致个人专断。因此,毛泽东多次强调,在扩大党内民主的基础上,要搞好党的集中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9页。

制建设。他说：“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①“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②在党内生活中，必须坚持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

（二）民主集中制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保证

第一，民主集中制是党发展壮大的根本组织制度。革命导师特别重视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组织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有组织的部队，无产阶级的力量，就在于组织。毛泽东继承列宁的这一思想，一贯重视民主集中制原则对党的发展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和进行活动的。早在建党初期，毛泽东等人就主张实行高度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极严格的纪律建立党组织。1927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党的五大委托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明确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使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和实践都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毛泽东认为，只有通过民主集中制，才能充分发挥全党的积极性、创造性，实现党的集中统一。刘少奇在七大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党，不是许多党员简单的数目字的总和，而是由全体党员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而是党的领导者被领导者的结合体，是党的首脑（中央）、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依照一定规律结合起来的统一体。这种规律，就是党内的民主的集中制。”^③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规律，只有按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了，才会使党达到团结统一，具有强大的战斗力，离开了民主集中制，党的组织就会变成党员简单的总和。

第二，民主集中制原则是正确处理党内各种关系的基本准则。一般来讲，民主集中制指导下的党内正常生活，必须是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但是，党内也时常出现各种错误倾向，诸如党内存在的极端民主化、非组织化、命令主义、分散主义、个人专断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按民主集中制原则正确处理党内相互关系。在党员个人和党组织的关系上，一方面要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另一方面又要扩大党内民主，调动全党的积极性，以形成真正的集中，这样才能建立党员和党组织之间的正确关系。在党内上下级之间关系上，一方面要反对分散主义，强调下级须无条件执行上级的决议、指示；另一方面，又要允许下级组织的不同意见报上级党委，把上级的集中与发挥下级的积极性结合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

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8页。

起来,建立起上下级组织之间的正常关系。在党的领袖与领导集体和党的关系上,既要重视党的领袖个人的伟大作用,又要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现象,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第三,民主集中制是党保持生机活力、充分发挥领导作用的重要保证。民主集中制是使党成为一个坚强统一的领导组织的需要,党只有成为按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有机整体,实现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的一致,才能战胜党内各种错误倾向,保证党的团结、统一,从而使党成为坚强统一的领导组织;民主集中制是调动全党积极性的需要,只有在党内充分发扬民主,真正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充分发挥每个党员和党的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和革命首创精神,党才更有生机和活力;民主集中制是使党的领导获得雄厚的群众基础的需要,民主集中制,反映了党的群众路线,在领导活动中,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集中群众的智慧,制定出符合人民群众利益和愿望的路线、政策,再通过群众在实践中去执行落实。这样,就能密切联系群众,调动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既可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性,又使党的领导有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三) 加强党的纪律性

列宁指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没有铁的纪律,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的思想,认为,要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就必须加强党的纪律性,反对各种无组织的错误思想。

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小生产者广泛存在的国家里,组织和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强调铁的纪律,那么这个党就很难无产阶级化,很难领导亿万人民向着凶残的敌人进行英勇的斗争。早在党的初创时期,党的领导人就提出必须建设一个有铁的纪律的党。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中把党的纪律概括为:“(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强调只有党的纪律才能保证党的巩固、团结,而行动上的一致,才能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执行。“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①后来,又提出党的纪律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反映,是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有效保证。必须加强全党的纪律教育,要求每个党员都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加强党的纪律性,必须与极端民主化、个人专断、宗派主义等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极端民主化在政治上自由行动,在组织上各成系统,在思想上发展个人主义、分散主义等错误倾向,他们反对一切必要的集中、统一,他们“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②。个人专断者,唯我独尊,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页。

一统天下,无视党的纪律,视党的权力为个人的权力,取消党内民主,压制党内民主精神和主动进取精神的发挥。它和极端民主化是党内生活上的两种极端现象,对党的事业危害极大。宗派主义是以自私和狭隘性为特征的小团体主义,表现为闹独立、拉帮结派、任人唯亲等。它对党的肌体、党员的思想是一种腐蚀,在思想上、组织上都会产生侵蚀、分裂、瓦解的危害。党的历史上的各种宗派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都给党的事业带来了极大危害。极端民主化、个人专断、宗派主义是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的纪律相违背的。他们的思想行为对党的事业,对党的组织危害极大,必须坚决抵制和克服。

二、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

干部队伍建设是党的组织建设的基本内容。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干部的作用和干部队伍建设,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理,在选拔、培养、使用干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干部路线和政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特点。

(一) 干部是实现党和国家领导的骨干力量和人民的公仆

毛泽东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①。这一语道出了毛泽东对干部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认识。无产阶级政党的干部,既是实现党和国家领导的骨干力量,又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公仆。

第一,干部是实现党和国家领导的骨干力量。毛泽东认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②没有大批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党所担负的历史任务的。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正确制定,离不开干部;党的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也需要干部。如果没有干部,再好的路线和政策也难以得到预期的效果。首先,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主要靠干部。党的路线和政策,是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体现。而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需要正确总结经验,集中群众的意见。制定后还要在群众实践中修改和补充,这些任务都是党的干部完成的。其次,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关键在干部。党的路线和政策确定之后,要靠党的干部领会路线精神,制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具体政策和措施,还要靠党的干部积极宣传,发动群众,组织、带领群众为实现党的路线而奋斗,从而使党的路线和政策变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也使党的领导落到实处。陈云在阐释“干部决定一切”时指出:“党的一切决议和政策,都要通过干部去实现”,党的干部是党的骨干,“没有坚强的干部队伍,我们党的事业就不能发展,就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

不能取得革命胜利”^①。建国后,毛泽东仍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展经济、科学、文化,干部仍具有决定性意义。

第二,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他们是人民群众中的领导骨干,从人民群众的斗争中产生,又去指导人民群众的斗争,同时他们又是人民的公仆。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这是由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从马克思、恩格斯创建无产阶级政党开始就明确规定,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正是以这一基本原则为依据的。党的工作的各个方面,都要通过干部去同人民群众建立密切联系,取得群众真正的信任和拥护。党的干部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义务,而没有高居于群众之上,谋取私利的任何特权。党的干部必须当好人民的公仆,这是干部对党对人民的应尽之职。毛泽东要求党的干部要到群众中去,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只有真正当好学生的人,才能当好先生。而先生的作用,只能是人民公仆的作用,决不是骑在人民头上当官做老爷。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并不是使干部做群众的尾巴,群众要怎样干就怎样干,崇拜群众的自发性,丧失党的领导作用,而是必须在群众中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群众觉悟,领导群众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为实现党在各个时期的总任务而努力奋斗。

(二) 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的内容

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领导的骨干,搞好干部队伍建设,拥有一支德才兼备的宏大的干部队伍,是解决干部问题的核心和关键。而要把干部队伍建设好,必须有一条正确的干部路线。

第一,在干部的选拔上,坚持“德才兼备”的条件和标准。按什么样的标准培养选拔干部,既是关系到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又是关系到党和人民的事业能否取胜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对党的干部的选拔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即以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实际工作能力来考察和选拔干部,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德才兼备”的选拔干部的基本原则和标准。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②他还强调,我们要求的德,是指政治上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实于党,同群众有密切联系,不谋任何个人私利。我们要求的才,是指有专业知识和业务工作能力,可以独立负责地决定工作方向,善于组织力量开创新局面,积极肯干,又服从党的统一领导。我们重视德,是为了使干部自己有坚

^①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是为了使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以保证党和人民的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我们重视才,是为了使干部能胜任党交付的重任,能够组织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毛泽东认为,德和才在实际工作中是不可分割的,是辩证的统一。

第二,在干部的使用上,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在如何使用干部问题上,毛泽东指出:“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①要实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必须解决好以下两个问题:其一,要正确识别、了解干部。知人才能善任,我们必须坚持用全面的、历史的、发展的观点看待干部。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对不同岗位、不同工作、不同经历的干部要依各自的具体情况对其实际工作表现和成绩判断干部的德和才。既要看到他们的缺点,更要看到他们的优点。我们要用其长,使之发展;避其短,使之随时克服。要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干部的优缺点。一个人的优缺点不是固定不变的,决不可持片面或固定不变的看法。还要历史地识别干部,毛泽东指出:“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②识别干部,不能只看表面,而应注重工作实效,以干部的实践来检验干部的言行。其二,要搞“五湖四海”,坚持全面团结干部的正确方针。毛泽东强调,我们党的干部,来自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大家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因此,要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小圈子,不拘一格地选拔使用人才。

第三,要关心爱护干部。党的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是党的事业的骨干。因此,爱护干部也是对党对人民事业的爱护。毛泽东指出,必须善于爱护干部。爱护的办法:一是,指导他们。这就是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同时,又适时地给以指示,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二是,提高他们。这就是给以学习的机会,教育他们,使他们在理论上在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三是,检查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有委托而无检查,及至犯了严重的错误,方才加以注意,不是爱护干部的办法。四是,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地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只有对犯了严重错误而又不接受指导的人们,才应当采取斗争的方法。在这里,耐心是必要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7页。

轻易地给人们戴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是不对的。五是,照顾他们的困难。干部有疾病、生活、家庭等项困难者,必须在可能限度内用心给以照顾。这些就是爱护干部的方法。此外,毛泽东强调还要关心非党的干部,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去掉孤傲习气,善于和非党干部共事,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用热烈的同志的态度对待他们”^①。只有关心、爱护干部,才能使干部安心、积极地工作,健康地成长,也才能真正为党培养、造就一大批人才。

三、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毛泽东一贯重视党的作风建设,把作风问题提到世界观和党性原则的高度,并同党的路线、政策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和解决。他精心培育和积极倡导的三大优良作风是中国共产党特有的优良传统作风,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和正确领导的重要保证。

(一)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作用

一个政党的作风如何,对党的建设,对党的事业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指出,好的党风是党领导人民,打击敌人,完成革命任务不可缺少的条件。他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论述了党风在党的事业和自身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第一,只有坚持良好的党风,才能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性质决定了一切党员都必须坚持好的作风,为共产主义和人民群众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反复强调,要把党风建设作为党的自身建设的一个不可分割的内容,并指出党的优良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党就能真正成为各族人民利益的代表,就能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如果丢掉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那就会严重影响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如果党风完全腐败,就可能导致党的性质的蜕变。

第二,只有坚持良好的作风,才能使党获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风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党群关系,关系到人心向背,而党是否能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之所以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一方面是由于党制定了真正代表广大群众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另一方面是由于党具有优良的作风。人民群众从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所作所为中,看出他们是真正为人民的,看出他们身上具有的优良作风,党在群众中就有了崇高威信和美好形象,群众因而更加信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仰、敬重党,党才能无往而不胜。

第三,好的党风是制定和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条件,对实现党的政治领导具有重要意义。党风的好坏,关系到党能否正确制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因为有了优良作风,党组织及干部、党员才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深入实际,深入群众,集中群众的经验与智慧,正确认识中国的客观实际和规律,制定出适合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如果不正之风占据支配地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盛行,不调查研究,脱离实际和群众,这样制定的政策没有不犯错误的,其结果必然导致党的事业受挫甚至失败。而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如果没有优良作风,而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不良之风盛行,那就会发生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情况,压抑人们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即使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也不能得到很好贯彻,党的事业、群众利益受损害,党群关系遭破坏。

(二) 党的优良作风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①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著名的三大优良传统作风。

第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作风,它是共产党人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问题上,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上应具有的基本态度,也是党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基本要求。这一作风实质上是坚持什么样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问题。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普遍真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指南,但它只有与我们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才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是学习、掌握其精神实质,运用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从而产生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否则,也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我们之所以必须坚决反对不顾实际情况,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轻视理论的经验主义,就是因为它们都无法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只有坚持深入调查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才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才能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3~109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第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作风上的体现,是共产党人在对待人民群众的问题上应有的基本品格和作风。它要求党必须以正确的态度对待群众,用正确的方法领导群众。党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一切向人民负责,对群众采取严肃负责的态度,懂得对人民负责和对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时刻关心群众生活,重视群众利益。一切依靠群众,坚信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必须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党的全部政策和实践,都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除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党没有任何特殊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力量,之所以生机勃勃,根本原因就在于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有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第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作风之一。这一作风是提高党的战斗力,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发展的锐利武器。从根本上讲,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在党内民主生活中的运用,是无产阶级政党生命力的表现。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能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和根本宗旨决定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服务的政党。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切言行,都必须以符合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并为人民群众的最大多数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但在为人民谋利益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克服缺点、错误,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去掉不良作风的有效方法。毛泽东指出:“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①我们的党员在思想上,也难免受到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习俗的影响,党员的思想也会沾染旧社会腐朽污浊的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这就要求我们要“天天洗脸”,“天天扫地”,经常地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同时,共产党是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它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外,没有任何私利。因此,他能接受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毛泽东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②批评和自我批评能使党去掉缺点和错误,能使党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保证党永远不脱离群众。

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是一个不可分割、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它集中反映了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生动地体现了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人民群众和对待自己的科学态度。

(三)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根本原则和途径

如何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毛泽东也提出了指导性的原则和科学方法。

第一,把党风问题提到世界观和党性的高度加以解决,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根本原则和首要途径。毛泽东指出,党风是党性和世界观在行动中的具体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决定了党在行动上必须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相信、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勇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即坚持三大优良作风。同样,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也是通过党的作风反映出来的。因此,解决党风问题,首先必须从改造世界观和增强党性这个根本问题入手。这就要教育党员深刻认识到一切不良作风是私有观念、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它严重腐蚀着党的肌体和党员的思想,甚至危及党的生命,从而自觉行动起来,同不良风气进行坚决斗争。还要加强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进行党性锻炼,自觉改造世界观,牢固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道德精神,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使广大党员成为无产阶级利益和阶级意识的自觉代表者。只有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即从思想方法、思想观念上进行根本转变,我们的党员才能在工作、生活各方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有效抵制和克服一切不良作风。

第二,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是搞好党风建设的关键问题。党的领导干部的地位和责任,决定了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对于广大党员和群众有巨大影响。如果党的干部,都能坚持党的原则,按党的政策要求和坚定的无产阶级党性指导自己的行动,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全心全意为党的事业、人民的幸福而奋斗,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处处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表率作用,那样干部就会得到党员、群众的信赖和爱戴。广大党员和群众就会以这样的干部为榜样,自觉严格地要求自己,从而形成良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

第三节 党的团结和党内思想斗争

一、党的团结是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重要保证

毛泽东十分重视党的团结统一问题,把它作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党的团结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力量所在,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是夺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重要保证。

第一,党的团结统一是坚持党的性质的必然要求。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

锋队,必然要集中反映和体现无产阶级的一切先进特性。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富有团结性的一个阶级。无产阶级的团结性是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社会化大生产把工人组织起来,并要求他们按照一定的劳动规则,互相配合,密切合作,从而养成了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精神,在现代化大生产中造就了无产阶级善于合作和团结的优良特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伟大斗争中,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目标,又使工人阶级互相同情,互相支持,于是进一步养成了团结战斗的优良品质。无产阶级的这种革命团结精神,是其他任何阶级所不具备的。共产党要继承无产阶级这一优良的革命团结精神,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就必须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团结统一的战斗集体。团结统一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

第二,党的团结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无产阶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革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和政治代表,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带领无产阶级去夺取革命的胜利,完成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然而,由于无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所面对着的是极其强大的敌人、革命任务极其繁重、革命路程漫长,无产阶级革命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就决定了党的自身必须有坚强的团结,才能保证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不断巩固、发展和壮大,成为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从而战胜敌人,克服困难,最终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指出:“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①

第三,党的团结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保证。无产阶级政党的团结统一,不仅在革命时期是必要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不可或缺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任务更复杂、更艰巨。部分党员由于执政党的地位,会产生骄傲自满、官僚主义以及少数蜕化变质分子,他们会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危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加强党的团结,对于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坚持了党的团结和统一,保证了国民经济恢复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行。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②

二、党内思想斗争的正确方针

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要巩固和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

发展党的团结统一,就必须开展党内斗争,“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①。党的团结和党内斗争是辩证的统一。党是在不断解决自身的矛盾运动中发展和巩固起来的。党的团结只有通过党内斗争才能实现。经过党内斗争达到党的团结统一,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

(一) 正确认识党内斗争的根源和性质

要正确进行党内斗争,达到巩固、发展党的团结统一的目的,就必须正确认识党内斗争的根源和性质。毛泽东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②这一精辟论断是对党内产生矛盾与斗争的根源所作的科学概括。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反映到党内来,这是阶级斗争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刘少奇指出:“党与无产阶级是经常处在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甚至封建残余势力的包围之中。这些其他各种阶级,便在同无产阶级的斗争或同无产阶级的联合中,经过党与无产阶级内部不稳定的成分,侵入到党与无产阶级的内部来,在思想意识上,在生活习惯上,在理论上,在行动上,经常影响党与无产阶级。”^③这样,资产阶级以至封建地主阶级的一些旧意识、旧习惯就会反映到党内来;敌对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策略变换,也会在某些党员的思想上产生影响。当然,不是党内所有的矛盾与斗争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阶级斗争的反映只是党内矛盾与斗争产生的根源之一。除此之外,还有新旧事物矛盾的反映。由于党员所处地位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认识问题的方法不同,从而在形势的估量上,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以及各项实际工作中,出现分歧意见是会经常发生的。这种矛盾是主观和客观不一致的问题,是唯物辩证法与唯心论形而上学之间的矛盾。这一类矛盾是反映社会新旧事物矛盾的,主要是围绕着党内生活中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而展开和进行的,表现为思想认识和工作上的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革新与守旧等的矛盾与对立,这种矛盾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党内矛盾和斗争的性质是属于思想斗争的范畴。其主要原因,一是从党内斗争的客观情况看,党内发生的矛盾和斗争,一般是同志间在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的过程中产生的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与矛盾,而不是根本利害的冲突,这种分歧和矛盾是党内斗争的主要矛盾。二是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在一定条件下,虽然可以发展为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上的分歧,但它的实质,基本上还是一种思想范畴的问题。是正确与错误之间的矛盾,或者是先进与落后之间、新旧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6页。

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8~179页。

思想之间的矛盾,归根到底是两种思想、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三是从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的大量表现来看,如反对党内错误倾向的斗争,反对党内宗派活动的斗争和反对党内一般错误思想和行为的斗争等,就其内容和性质而言,都是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即使有些党内矛盾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的反映,但也应该看到,在一般情况下,这种党内矛盾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是有区别的,它不是对立阶级之间直接的利害冲突和对立,基本上也是属于思想范畴的矛盾和斗争。刘少奇曾明确指出:“党内斗争,主要的是思想斗争,它的内容是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在党内,由于同志间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虽然可以发展到政治上的分歧,在某种情形下,甚至不可避免地发展到党内组织上的分歧,但是它的实质,它的内容,基本上还是一种思想斗争。”^①

(二) 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

既然党内斗争基本上是一种思想斗争,那么,进行党内斗争就必须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通过批评、教育使问题得到解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同错误倾向的斗争中逐步确立的正确方针。

在党的历史上,在进行党内斗争中,主要出现过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机械、过火的党内斗争。主要表现为片面强调党内斗争,主观武断地夸大党内矛盾的严重性,把思想认识问题看作政治立场问题,把一般错误思想夸大为路线错误,把党内不同意见分歧看成路线斗争、阶级斗争,随意给别人戴帽子、打棍子,甚至用对敌斗争的手段解决党内问题。这种机械、过火的斗争,以1931年到1934年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期间党内斗争最为典型。他们在党内给一切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都戴上“右倾机会主义”、“调和主义”、“两面派”等帽子,给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种错误倾向给党的建设造成了严重危害。二是党内的自由主义和调和主义。主要表现为回避矛盾、掩盖矛盾,否认党内矛盾,不敢开展党内斗争,对党内犯错误的同志和各种错误现象姑息迁就,保持一团和气。毛泽东指出,革命队伍中的自由主义是一种腐蚀剂,它“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②。

毛泽东在总结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1942年,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把这个方针概括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他说,进行党内斗争“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9~18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9页。

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①。后来,毛泽东把它进一步概括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具体而言,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公式所包括的内容极为丰富,概括了党内团结和斗争的一系列原则和方针。首先是要正确认识党内矛盾的性质。从本质上讲,党内矛盾主要是非对抗性矛盾。这种矛盾只是思想认识上的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正确认识党内矛盾的性质,是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前提条件。其次是要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方针。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进行党内斗争,其目的是为了帮助犯错误的人回到正确的方面来。惩前是为了毖后,治病是为了救人,因而党内斗争必须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从“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的愿望出发。只有如此,才有可能通过党内斗争使矛盾得到真正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三是坚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要“惩前”和“治病”,必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主要方法。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中,作为批评者,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做到摆事实,讲道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风细雨,以理服人,切忌主观武断。任何犯错误的人,在接受批评时,应抱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虚心接受意见。

“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正确地说明了党的团结和党内斗争的相互关系,指出了党内斗争的出发点、使用的方法以及斗争的最终目的。这个公式把马克思主义的团结原则和党内斗争的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解决党内矛盾的完整的正确方针,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建学说,在实践上,成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指导原则。

三、整风是解决党内矛盾的基本经验

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理论同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了运用整风的方法,解决党内矛盾,巩固党的团结,端正党的路线,转变党的作风,加强党的建设,对全党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形式。这是毛泽东党建理论中富有独创性的理论贡献之一,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

(一) 延安整风为党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自觉地开展自我批评、自我教育的思想改造运动。它极大地推动了党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7~828页。

的发展,给党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成功经验。

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转变时刻,而党的组织状况和思想作风与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很不适应。一方面,遵义会议后,党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已经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可是其错误的思想影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还在党内广泛存在。这些不正之风严重危害党的肌体,影响党的团结与统一,阻碍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另一方面,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党组织发展很快,大批新党员加入党的队伍。这些党员大多出身于农民或其他小资产阶级,他们虽然革命热情很高,但在他们身上还存在着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有些人虽然组织上入了党,可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他们没有受过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缺乏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他们对党的历史还不够了解。因此,当教条主义者伪装出一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面孔时,他们便分辨不清,容易上当。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任其发展下去,党就会失去先进性和战斗力,就不可能团结一致地领导人民去夺取革命的胜利。然而,如何通过党内斗争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是有着沉痛教训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党内曾经对一切同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一律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以对敌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党内斗争”。它破坏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削弱了党的战斗力,给党的建设和发展带来极大危害。因此,在党的指导思想,反对和纠正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正确地开展党内斗争,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加强全党的团结,就是党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党和毛泽东认真记取历史教训,采取通过整风的方式来解决上述问题,开创了党的建设的正确方法,给党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成功经验。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延安整风运动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全党整风和党史学习中所采取的方针,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正确态度的模范,因而取得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提高并团结全党的伟大成就。”^①

(二) 整风是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好形式

党内本质的、主要的矛盾是无产阶级思想同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因此,就不能采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来解决这种矛盾,而只能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评的方法,民主讨论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

毛泽东亲自发动并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创造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解决党内矛盾的好形式。这次整风采用学习、对照、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特别强调“个人反省”的作用。要求每一个党员通过认真学习马克思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6~997页。

义,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克服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同志间开展批评的目的也在于启发其自觉性,促进思想转化,提高认识水平。整风运动的目的在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在于提高共产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and 政治觉悟。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采取唯物主义的分析态度,重点在于从中引出有益的教训。对于犯错误的同志,不着重于个人的责任方面,而在于提高认识,改正错误,增强党性,努力工作。通过整风运动,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空前提高,思想上获得一次大的解放,党的团结空前加强,从而为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延安整风后,中国共产党曾多次自觉地运用整风这种形式,解决党内矛盾,对全党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使党得到迅速而健康的发展,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成为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整风的实质及其意义。他指出,在我们的工作中成绩是主要的,但是错误也不少。因此,我们要整风。“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①

第四节 执政党建设的思想

一、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

早在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曾明确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他强调“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②。在这里,毛泽东已经预见到党在执政的条件下可能会遇到的严峻挑战,提出了应对这一挑战的“两个务必”的正确方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348~1349页。

共产党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党。执政党的地位,党所肩负的任务和所处环境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就显得特别重要。

第一,执政党历史任务和工作重心的转变,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决不是革命的成功和工作的终结,而是面临更艰苦、更复杂、更伟大的工作任务。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主要任务是破坏旧社会,为夺取政权而斗争。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主要任务则是建设新社会。要建设新社会,遇到的是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摆在面前的是许多新任务。“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①革命胜利后,执政党所担负的任务由过去领导人民摧毁旧制度,变为领导人民建设新国家。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建立后,主要任务就是要担负起艰巨的经济建设的历史任务。在建国初期,我们的根本任务就是争取国民经济的基本好转,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而在国内,有人公开声称,“共产党是军事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甚至预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将因解决不了经济问题而失败。经济建设的新任务,严峻地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在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就是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党的任务就是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中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国防和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执政党的历史任务能否胜利地完成,取决于党的领导是否正确。要实现党的正确领导,必须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

第二,党在执政的条件下,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执政党的地位,容易滋长以功臣自居和骄傲自满情绪,面临着胜利的考验。新中国建立后,确有一些共产党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所打中,从而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不能起共产党员的作用。同时,由于党处于执掌全国政权的地位,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如何对待权力的考验。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是运用手中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还是为个人或小团体谋私利,这是摆在党的建设面前的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是对每一个党员的严峻考验。权力具有两重性,既可以用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也可以用之于为个人或少数人谋私利;既可以为人民立功,也可以为历史铸错。如果掌握权力的党的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对待权力,就会产生官僚主义,搞特殊化,以权谋私,就会走上蜕化变质的道路。

第三,共产党执政后,各种各样的人都会涌入党内来,党面临着如何纯洁队伍的考验。共产党执政以前处在被压迫、被“围剿”、被屠杀的地位,那时加入共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9页。

产党,就意味着自觉地为革命吃苦、流血,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样,那些落后分子、投机分子自然不来或很少加入共产党。即便有个别这样的分子加入到党的队伍里来,在残酷的环境下也很容易经不起考验而被自然淘汰。在那样的环境下,经过千锤百炼,党的队伍比较纯洁,党员的素质也比较高。党执政后,情况就不同了。一方面容易使一些党员滋生贪图安逸,不求上进,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甚至被剥削阶级思想所腐蚀,走上违法乱纪和犯罪的道路;另一方面,也会有一些动机不纯,不够党员条件的人混入党内。列宁说过,执政党是很有诱惑力的,因为入党后就能掌权。那些追名逐利、巧于钻营的人会想方设法往执政党内钻,作为取得名利的阶梯。因此,在执政的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慎重发展党员,不断清除腐败分子,纯洁党的队伍,是摆在党的建设面前的又一个重大任务。

二、加强执政党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是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具有丰富的内容,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指明了方向。

(一) 加强执政党的思想建设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是党的建设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党成为执政党后,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经验之一。党员的思想状况如何,不仅关系到党的战斗力,关系到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而且还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任务,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尤其重要。为加强执政党的思想建设,更好地对全党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就成立了“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并于1951年10月、1952年4月、1953年4月和1960年9月相继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四卷,在全国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同时,决定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以便有计划地、系统地翻译出版马恩列斯的全部著作。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党的地位的变化,党所面临的任务,在革命胜利后,部分党员思想、作风的变化,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使党能够更好地担负起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任务,从1950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开展了建国后的第一次整党运动。通过这次整党,纯洁和壮大了党的队伍,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从而加强了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核心领导作用。

(二) 加强执政党的组织建设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优良传统,毛泽东特别重视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1951年3月至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建国后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和讲话,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

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强调要重视党务工作，贯彻民主集中制，加强党对自身的管理和建设。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总结党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时，着重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他说，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就不能巩固。他指出：只要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这样，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他要求全党在领导工作中，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而不能由第一书记个人独断。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才能正确处理好党内的各种矛盾，保证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统一，形成真正的、集中统一的坚强领导，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三）加强执政党的作风建设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以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民主集中制的作风等，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逐步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执政党以后，能否继续保持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党的建设面临的新课题。早在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就向全党提出了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第一，必须克服一切不正之风，端正党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由于党处于执政地位，党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风气的好坏。所以，党执政后，必须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加强对全体党员的思想教育，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同时，又要坚决果断地处理那些已经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现象，进行反腐败斗争。建国初期，针对一些党员和干部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滋长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倾向，甚至蜕化变质，堕落成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情况，毛泽东于1951年11月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的指示中指出：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①。1953年1月，毛泽东在《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中又提出：“各级党委应有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0页。

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以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①通过整党整风和“三反”“五反”运动,惩处了腐败分子,严肃了党纪,端正了党风,保持了党的纯洁性。

第二,必须重视对党员进行党的优良作风的教育,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员的最高准绳。1957年3月,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讲话时指出:“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②1956年11月,邓小平在回答国际青年代表团的提问时,也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员的最高准绳,他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他的目的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③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依靠人民、相信人民、集中和吸取人民群众的智慧,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都要同广大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完全彻底地为广大群众谋利益。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革命和建设就一定能够胜利。

第三,自觉接受党内和党外监督。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党内外对加强党的建设的监督。1956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指出:“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发扬我们党的传统作风”^④。1957年4月,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上进一步阐述了“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思想。他说:“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⑤他指出: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第二是群众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他坚信:只要党和党员接受监督,虚心学习,不断地工作,我们党就一定能够顺利地领导国家建设,把我们的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

(四) 增强党性,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5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0页。

党的团结和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也是执政党建设的重要问题之一。新中国建立后,敌对势力破坏人民革命事业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坏共产党的团结和统一,在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而党内的一些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在执政后,往往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对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成是自己的独立王国,向党闹独立性。因此,党执政后,必须对全党进行增强党性,维护党的团结的教育。1954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七届四中全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为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全会一致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以及根据刘少奇的报告精神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该《决议》针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破坏党的团结、分裂党的情况,着重强调了党的团结的重要性,分析了影响党的团结的各种因素,并规定了增强党的团结的六项措施,论述了党的团结的基础。该《决议》强调指出:全党都应当认识,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破坏党的团结就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命。党的高级负责干部的团结,尤其是决定革命胜利的最主要的键。1956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进一步论述了增强党的团结的重要性。他指出:“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建设的最重要问题之一。”^①“巩固我们党的团结,维护我们党的统一,这不但是我们党的利益,也是全国人民的利益。”因此,“经常注意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是每一个党员的神圣职责”。^②

(五) 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

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培养和造就了大批干部,这些干部的绝大多数是好的,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但是,党执政后,从民主革命时期过来的干部和新参加工作的干部的政治、业务水平在一个时期之内,还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为了适应形势任务发展的需要,党执政后,加强了对干部的教育、管理、选拔、培养工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要求党的各级干部必须艰苦奋斗,不脱离群众。党的领导干部要经常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疾苦;要参加体力劳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有事要同群众商量,善于走群众路线;干部不能当官做老爷,不能搞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不能搞特殊化,不谋取个人私利;要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思想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要经常注意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起,由于帝国主义加强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

战略,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问题,促使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始较多地考虑如何在新的斗争形势下,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1964年6月,毛泽东特别谈到了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他强调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从根本上说,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毛泽东还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基本条件: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善于自我批评,善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第十章

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马克思指出：“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①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全部内容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概括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并指出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强调，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不仅表现在《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重要著作中，而且表现在毛泽东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它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运用和发挥，创立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理论思维的内容和形式，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提供了实践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是在理论上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实践上成功地进行革命和建设思想武器。

第一节 实事求是

一、实事求是思想的形成

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具特色的基本原则，它是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在中国革命长期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中国共产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主义。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121页。

基本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深入地调查和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客观情况,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毛泽东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中,又特别注意从实际情况出发,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结论,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

1929年12月,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在党内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任务。他指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①要纠正主观主义,使党员的思想 and 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就要:“(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②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只是还没有使用这样的语言。

1930年5月,毛泽东针对当时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发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这篇文章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思想路线的概念,认为“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③。并强调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等。总之,《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实际上是反对了当时党内和红军内的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即本本主义的路线,代表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即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运用于党的实际工作,提倡向实际情况进行调查,反对唯书唯上,主张把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因此,完全可以说这时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雏形已经具备了。

但是可惜的是,毛泽东这一重要思想以及他在实际上所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当时并没有被党中央大多数同志所认识和接受。处在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甚至把毛泽东提出的这些正确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116页。

的思想识为“狭隘经验论”而加以指责，并在实际工作中排斥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通过了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遵义会议主要是集中全力纠正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并在组织上作了一些调整，还不可能指出“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治上和其他方面的错误，但遵义会议把红军战争胜利或失败的主要原因提高到实事求是思想的高度。遵义会议后，由于批判了教条主义，使人们的思想得到很好的解放，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为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所认识和接受，更多的人开始注意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结合对“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的清理，批评了“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把“本本”当“圣经”的错误倾向，这是同本本主义作斗争的继续。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军事斗争经验的系统总结，则是把《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的思想路线问题结合军事问题具体化了。1937年7、8月间，毛泽东又相继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奠定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实事求是”这个概念，并向全党提出了“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伟大任务。他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①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概念，并以这个思想为基本线索和依据，系统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随后不久，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命题，从而使实事求是的思想日臻完善。这就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的确立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二、实事求是的科学涵义及其基本内容

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第一次对实事求是的涵义作了科学的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523页。

内外、区内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①这就把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提高到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赋予它以科学的涵义和理论的形态,使这一古老的成语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精神的中国语言表达形式,成为党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简明概括。

(一) 一切从实际出发

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从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出发,它是实事求是的最主要的内容和最基本的要求,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和基础。

从客观实际出发,还是从主观思想出发,这是哲学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毛泽东强调:“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②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③。在毛泽东看来,从实际出发,就是从被认识和被改造的客观事物、客观情况出发,以便按照科学的方法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就正确地解决了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出发点问题,为坚持实事求是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和前提。从实际出发,对于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④所谓国情,也就是一个国家的各方面的基本情况。旧中国是一个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文化上都非常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党的历史经验表明:认清中国的国情,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是坚持实事求是,制定正确纲领、路线和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坚持从实际出发,必须对实际采取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

首先,“实际”是客观的,坚持从实际出发,就要真正承认客观事实,尊重客观事实,忠于客观事实,对客观事实决不要带上任何的主观随意性。这也就是列宁所讲的“观察的客观性”,它对于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真正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性,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客观事物被随意加上了外来的成分,或者被某些主观因素所歪曲和剪裁,那么,就不可能真正从实际出发,也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其次,“实际”是全面的,坚持从实际出发,就必须全面看问题,从事实的全部情况出发,绝不能见木不见林,以偏概全。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全体。”^⑤从实际出发,就是要把客观事物的各个部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页。

分、不同的侧面和片断,以及个别的实例,联系起来,综合起来,作全面的、整体上的考察,以便尽量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虽然我们可能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

再次,任何“实际”都是现象与本质的对立统一,从实际出发,必须善于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表现,本质是事物的内部联系,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反之,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而满足于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的方法,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只有揭破这种形式主义的方法,“才能使大家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所办的事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①。

最后,一切“实际”又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从实际出发,就要从不断变化的客观情况出发,对客观事物做动态的考察。毛泽东指出:“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使之符合于既定的客观实际,“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②。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着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发生变化,就会使自己落后于现实,就不能做到真正从实际出发,也就不能引导革命顺利发展。

(二) 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联系实际,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它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也是坚持实事求是、达到主观客观相统一的根本途径。

理论和实际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一再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只有在它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才能显示出来。恩格斯曾郑重声明:“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③列宁也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④这就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中心的问题,就是把马克思主义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6页。

④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指导各国革命的实践,就是在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贯重视并致力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把理论联系实际还是脱离实际、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还是相割裂的学风问题,看做“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个重要的问题”^①。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结晶。坚持理论和实际的统一,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理论和实际怎样联系呢?毛泽东指出:“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②这种“有的放矢”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外国,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实际运动结合起来。

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从书本出发,轻视实际,靠照搬照抄马克思列宁主义词句解决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神圣化的教条主义是错误的;从狭隘经验出发,轻视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满足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的经验主义也是错误的。二者的表现形式虽不同,但其思想方法的本质是一致的。它们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東西,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理论和实际相脱节为其基本特征的。这种反科学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是党内产生“左”、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曾经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损失。它“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③正是由于主观主义歪曲了理论和实践的正确关系,违背了理论联系实际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因此,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对症下药,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使有书本知识和有工作经验的人各自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使这两种人互相结合。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页。

（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是以客观实践作为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还是以书本或主观因素作为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这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思想路线根本对立的又一重要表现。坚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项重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认识的标准问题。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①列宁也指出:“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②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这些重要思想,进一步强调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唯一性。他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是说,一种认识是不是真理,衡量的标准不是书本上已有的结论,不是主观上的感觉如何,更不能靠“天”、“神”、“上帝”及“绝对精神”一类的观念来判断,而只能靠社会实践的检验。真理的最高裁判官、最高权威,不是哪个人,而是人们的社会实践。只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判断认识的真理性,反对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不仅不能获得真理,反而必然陷入唯心主义。毛泽东还阐明了实践检验真理的复杂性。指出,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时间的考验,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往往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完成的,实践标准也是绝对与相对的辩证统一。

总之,从上述各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都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具体体现。它们互相联系,互为条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实事求是核心。因为,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就不能不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之,也只有坚持这三点,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三、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③，“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④，“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⑤。邓小平的这些科学论断精辟地阐明了实事求是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

(一)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严密的科学体系,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毛泽东所提倡的同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势不两立的实事求是精神,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

首先,实事求是包含了彻底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实事求是要求从实际出发,从“实事”中求出“是”来,即要求从客观实际、客观事物中求得事物的规律性认识,这正是坚持从物质到精神、从存在到思维的唯物主义。

其次,实事求是包含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思想。实事求是中的“求”就是指要去认识世界,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的基础上,遵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则和规律,能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规律性,揭示客观真理,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就内在地包含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思想。

最后,实事求是也包含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唯物辩证法的内容非常丰富,不可能都容纳在实事求是这一个命题中。但是,实事求是却包含着辩证法的最基本的思想。如,事物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等等。这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人们通过实践,可以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主体对客观辩证法的反映。所以,我们说实事求是又包含着辩证法的基本思想。

由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注入实事求是这个传统的中国成语中,因此它就既确切又精练地表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既唯物又辩证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的高度一致。我们只有立足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才能正确地领会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也才能理解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正如邓小平所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呢?这种根本观点有没有过时,会不会过时呢?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那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很明显,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①

(二) 实事求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全部内容中的活的灵魂

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极为丰富的内容。但是,无论哪部分内容都无不是以实事求是为其出发点和根本点的,都无不是实事求是的产物。

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出发,在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规律的基础上,科学地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一系列根本问题而形成的。其中最具有特色的,是根据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8页。

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一般原理,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中国式革命道路的开辟,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结果。

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也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建国后,党和毛泽东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经济政治条件,以及当时具体的国内外环境,提出并实施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创造了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在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上,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军队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并长期处于农村环境下的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地解决了如何建设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又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提出了一整套在敌强我弱条件下克敌制胜、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战术。

在文化工作的理论上,毛泽东从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优秀文化传统而近代又因遭受外来侵略而陷于落后状态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要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方针。

在党的建设的理论上,毛泽东根据中国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这个实际情况,成功地解决了如何在我国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毛泽东关于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所提出的一系列方针、原则、方法,也都是实事求是的产物。

不仅如此,实事求是还是毛泽东思想灵魂中的最根本的原则。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说到底,又都是实事求是的根本要求和体现。

(三) 实事求是党的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形成了许多优良的传统和作风。这是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在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作风中,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

首先,实事求是党的思想路线,是党制定和执行其他一切路线和政策的理论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坚持还是违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革命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极大。因为,虽然党的政治路线是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而制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它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革命的命运。但是,正确的政治路线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必须建立在对客观情况的深刻了解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就是说,它必须以正确的思想路线为基础。只有思想路线正确了,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从而使革命和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并取得胜利。反之,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

彻不下去。回顾党的历史,可以看出,我们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我们所遭受的一切挫折,也恰恰是背离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

其次,实事求是又是党的思想作风。毛泽东认为,我们共产党人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的态度是根本不行的。这种老实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反之,脱离实际,夸夸其谈,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就是主观主义的作风。因此,毛泽东把实事求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作为党的三大作风的第一项,作为根本的作风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要求广大干部和党员在实际工作中都要争做实事求是的模范,使实事求是成为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成为全国人民的思想作风,从而保证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

最后,毛泽东还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基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他指出:“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①他还指出,在人们的思想方法方面,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是对立的。因此,我们必须永远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就是说,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对客观存在的情况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而不是片面地、非历史地、主观地看问题。

四、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坚持和发展

经过延安整风,全党掌握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保证了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迅速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泽东运用实事求是这一真理领导党继续前进,使得在延安成为全党思想财富的东西,进一步在全国人民中间推广开来。这一时期,毛泽东反复论述实事求是的思想,亲自召开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一系列著作。毛泽东和全党同志都十分注意认真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而党不仅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取得了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性胜利,而且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从而继续深化了党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解。

但是,思想路线的解决不是一劳永逸的,搞得不好是会出现反复的。1958年“大跃进”的失误就表现了这种反复。“大跃进”急于求成,夸大主观能动性,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结果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了一次较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2页。

大的挫折。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对彭德怀等同志的批判及其以后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使“左”倾错误造成的曲折又延续了更长的时间。发生“大跃进”、“反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就是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传统作风。

1961年初,毛泽东在逐步发现和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中重提调查研究,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党中央发出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并随信印发了毛泽东《调查工作》(公开发表时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重申“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经过毛泽东的积极倡导和身体力行,党内很快形成了浓厚的调查研究风气。在全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党中央陆续制定了各个方面的工作条例。这样,才使党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1958年以来的“左”的错误,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然而可惜的是,不久,正确的思想路线又受到更大的干扰和破坏,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曲折。毛泽东晚年由于过多地相信以往革命斗争中所取得的经验,较少地去认真研究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并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从而逐渐背离了他自己所提倡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结果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左”倾错误,并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造成十年内乱。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这条思想路线,有一段时间被抛开了,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①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倡导和支持下,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通过对“两个凡是”错误指导方针的批判,党终于冲破了教条主义、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党的事业从此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纠正错误,总结经验,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不但恢复和坚持了毛泽东过去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发展了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

党坚持和发展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历史经验一再告诉我们,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和精髓,是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基础。我们要做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仅要充分认识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中犹如“命根子”一样重要的地位,了解实事求是的涵义和内容,而且必须弄清坚持和发展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和条件。

根据实事求是的涵义,坚持和发展实事求是三个基本方面的要求。一是必须承认客观实际,也就是要“求实”,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最起码的要求。按照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

客观实际的本来面目,如实地承认客观实际,而不附加任何外来成分,不掺杂主观因素,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态度。二是必须努力认识客观实际,就是要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从“实事”中求出“是”来,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又一个基本要求。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承认客观实际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由于种种客观的和主观的条件限制,要真正认识客观实际,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必须经过深入调查研究,详细占有材料,并通过抽象思维的作用,才能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三是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目的和最终落脚点。在辩证唯物主义者看来,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就是按照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以保证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所以,光承认实际、认识实际还不够,还必须坚决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这才算真正坚持了实事求是。

历史经验表明,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要实现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把实事求是变成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自觉地坚持和运用,必须坚持以下一些原则和方法:

(一) 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坚持解放思想

坚持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必然会遇到各种违反客观实际的错误思想的阻挠和反对。解放思想,就是要打破各种错误思想的束缚,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及其发展规律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它在本质上同实事求是是一致的,但又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很强的针对性。对于那些受到教条主义、个人崇拜和其他各种错误思想的束缚,思想上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状态的人来说,解放思想是个首要问题。只有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独立思考,才能冲破各种禁锢,砸碎思想枷锁、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解决问题;只有解放思想,放下包袱,才能轻装上阵,敞开思想,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也才敢于实事求是。否则,如果思想僵化,固守条条框框,书本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搬照抄,不敢越雷池一步,那么,即使有了正确的路线,也不能够很好地贯彻执行,革命和建设事业也不能顺利前进。

当然,解放思想决不是随心所欲,决不是可以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搞自由化。我们讲的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种解放思想是以实事求是为基本前提的。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真正解放思想,也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坚持实事求是,二者是完全一致的,都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精神。正如邓小平所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①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页。

（二）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加强党性锻炼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党制定正确政治路线、纲领的理论基础，它本身就是“党性的表现”，也可以说是最高的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必然会遇到脱离实际的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遇到各种阻力，而我们头脑里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私心杂念，也会妨碍我们坚持实事求是。这就要有为人民利益而坚持真理、为人民利益而纠正错误的坚强党性。无私才能无畏。特别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要坚持实事求是，尤其需要很强的党性，需要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的统一。毛泽东曾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模范，他为了坚持实事求是地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没有屈服于共产国际某些领导人的压力，没有屈服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是无私无畏、不屈不挠，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邓小平也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榜样。早在“四人帮”横行的1975年，他就置个人安危于度外，顶着强大的政治压力，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为消除“文化大革命”的动乱进行了艰巨的斗争，并因此遭受更大的打击。粉碎“四人帮”后，在现代迷信盛行，“谁讲实事求是，似乎犯了弥天大罪”的情况下，他就敢于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敢于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坚持拨乱反正，充分体现了对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体现了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推动和指导下，全党终于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如果没有无私无畏的品格，没有坚强的党性，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一点的。因此，我们应该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增强党性锻炼，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首位，努力加强思想理论修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做到既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又善于坚持实事求是。

（三）坚持实事求是，必须认真进行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科学的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它是实事求是的基础，也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毛泽东总是把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同调查研究的方法紧密结合起来，大力倡导调查研究，把它作为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这是因为：首先，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前提，不作客观实际的调查研究，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就必然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坑；其次，客观情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新问题层出不穷，调查研究不能一劳永逸，只有不断调查研究，才能坚持客观辩证法，而不致走进形而上学的死胡同；最后，客观事物都是具体的，不但从具体上升到抽象需要调查研究，而且从抽象回到具体也需要调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进行调查研究，就不能正确地制定和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就要犯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错误。因此，从根本上说，只有坚持调查研究才能真正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

调查研究包括两个环节：一是调查，就是了解客观事物各方面的情况，搜集丰富的合乎实际的材料，这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客观依据，是认识客观事物的起点和基础，是人们获得感性认识的阶段；二是研究，就是在周密调查的基础上，对所掌握的实际材料，认真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经过分析和综合，判断和推理，找出事物的规律，作出正确的结论，这是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阶段。调查和研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往往调查中有研究，研究中还要调查。只有把以调查研究为基础的两个认识阶段互相结合起来，才能构成完整的认识过程，从而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

调查研究要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调查研究的态度问题，指出调查研究要有客观的态度，要尊重客观事实，坚持从客观事实本身出发，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既不夸大，也不缩小。调查研究还要有虚心的态度，要尊重群众，甘当小学生，和群众交朋友，虚心向群众学习，让群众了解你，把你当作朋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实情况来。毛泽东不但强调要用正确的态度进行调查研究，而且总结自己进行调查研究的切身体会，提出了搞好调查研究的几种基本方法，主要有：“走马观花”作面上调查；“下马看花”，深入实际作典型调查；开调查会广泛收集材料；重点调查，深入研究；等等。

此外，坚持实事求是，还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发扬民主通常属于政治范畴，但它实际上也具有认识论的意义。毛泽东把发扬民主的问题，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阐明了它与坚持实事求是的辩证关系。他指出，不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就不能深入了解客观实际情况，就难免犯主观主义错误。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发扬民主，也是实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重要条件。

自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头等重要的任务。我们一定要在实践中认真学习、掌握实事求是的观点和方法，努力把它变成自己言行的准则。

第二节 群众路线

一、群众路线思想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因此，无产阶级政党无论领导革命还是领导建设，都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承认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明确指出,党的任务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①。党成立后不久,就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工人运动,接着又推动了有各革命阶级参加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领导了更大规模的工农群众运动和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特别是农民运动的兴起,显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民群众联合起来的巨大力量。1927年2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针对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提出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思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虽惨遭失败,却为党后来继续领导广大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在同异常强大、残暴的敌人进行极其艰苦的斗争中,党更加认识到动员和依靠群众的重要性。党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和白区工作等方面,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群众工作的经验。

党的历史上,比较早地使用群众路线概念的是周恩来。1929年9月,周恩来在其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中,比较明确地提出了群众路线这一概念。1929年12月,毛泽东在根据“九月来信”精神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也使用了群众路线这一概念。他明确指出,“过分相信军事力量,而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单纯军事观点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从而强调了树立群众观点的极端重要性,同时提出了“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的工作方法。

1930年至1934年间,毛泽东结合党的各方面工作,特别是结合党的思想路线,在《反对本本主义》、《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著作中,深刻阐述了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并在实际上把群众路线作为党在革命活动中应当普遍实行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在此期间,周恩来、刘少奇、瞿秋白、张闻天、陈云等党的领导人,也对群众路线问题作了一些重要论述。所有这些表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艰苦环境下,经过长期革命实践,党对自己在领导各方面工作中的一般方法问题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和总结。随着党和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以及党对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加重,党越来越重视自己与群众的正确关系,注意总结领导群众的经验,从而使群众路线的思想进一步完善起来。毛泽东又提出了共产党员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他们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的重要观点;提出了共产党员在领导群众同敌人作斗争的时候,必须有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的观点;批评了自由主义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漠然置之,和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72页。

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的错误态度。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毛泽东等又提出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革命的政治家们的任务,就在于把千千万万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为群众谋利益是共产党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群众的意见和经验是党制定政策的基础等重要观点。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1943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这一重要著作中,系统地总结了党在领导方法问题上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把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这一基本领导方法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作出理论概括,科学地阐述了群众路线领导方法所包含的基本内容及其主要表现形式,分析了这一领导方法的各个环节、步骤及其全过程。它表明,党的群众路线领导方法已经具备了完备的科学形态和精深的理论内容,已经成为党在一切实际工作中实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领导与群众相统一的根本路线和根本方法。

二、群众路线的科学涵义及其基本内容

党的七大特别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刘少奇指出:“所谓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①在这里,刘少奇不仅揭示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质,而且高度概括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这就是说,尽管党的群众路线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但可以把它科学地概括为正确对待人民群众的立场、观点和正确领导人民群众的方法这样两个基本方面。

(一) 正确对待人民群众的立场、观点

如何对待人民群众,是一个根本的立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任何政党都有着根本的区别。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在组织群众、带领群众进行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思想,这是党正确对待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和观点,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出发点和基本立足点,是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

首先,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出发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最终目的决定了它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是为了服务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共产党员的一切牺牲、努力和斗争,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解放,而不是为了别的。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8页。

的唯一宗旨。党的一切工作,都是紧紧地和人民联系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的一切言论、行动都必须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党的每一项任务的提出,每一个政策的制定,都必须从实际出发,适合群众的需要,而不能脱离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否则,革命就毫无意义。”^①凡是为了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而损害人民利益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共产党员只有牢固树立一切为了群众的思想,自觉地为人民服务,才能真正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做好各项工作。

要为人民服务,就要对人民负责,就要在客观上使人民因为我们的服务而得益处,获得解放,就要力求不犯或少犯错误,免得造成人民的损失。因此,我们必须树立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对人民群众采取严肃的、负责的态度,不允许采取轻率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力求使自己的领导保持正确,如果不正确要迅速求得改正。同时,还必须了解,向人民负责与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把向人民群众负责与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统一起来。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精神,对自己及对领导机关的错误所采取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以及遵守党的纪律的自觉性,等等,都是对人民负责的表现,也是对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表现。

其次,一切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立足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真正伟大的,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只有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才是不可战胜的。马克思早就指出,劳动者是自己解放自己的。这就是说,人民群众的解放,只有自己起来斗争,自己起来争取,才能获得,才能保持与巩固;而不是任何群众之外的人所能恩赐、所能给予的,也不是任何群众之外的人能够代替群众去争取的。任何恩赐的观点、代替群众斗争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依靠群众,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是群众路线的一个基本观点。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党一贯坚信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时刻注意保持和群众的联系,深信“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②,并一再告诫自己的党员和干部不要脱离群众,不要高居于群众之上,不要把自己看做群众的主人。

依靠群众必须建立在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基础上,必须取得群众的自觉与自愿。如果人民群众还没有某种革命的要求,就去组织群众进行这种革命,企图用包办、代办的方法取消群众的自觉与自愿,那么,这种革命决不会成功。没有人民群众的真正自觉与真正发动,仅有先锋队的奋斗,人民群众的解放是不可能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的。“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①共产党人的责任就是，当着群众还没有自觉时，用一切有效的、适当的方法去启发群众的自觉；当着群众已经有了某种必要的自觉以后，才去指导群众的行动，指导群众组织起来、斗争起来；而在群众组织起来、斗争起来以后，再从群众的行动中去启发群众的再自觉。这样，一步一步地引导群众去为党提出的基本口号而斗争。这也就是共产党人和一切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所起的全部作用。

要做到真正依靠群众，还必须努力向人民群众学习。共产党人除了完全忠实于人民的解放事业、具有充分的热情和牺牲精神以外，还必须有知识、有经验、有预见，为此就必须注重学习。而最重要的学习，就是向人民群众学习。毛泽东特别强调必须首先向群众学习，然后才能教育群众。先做群众的学生，后做群众的先生。领导者和领导机关只有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把群众的知识 and 经验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更高的知识，才能具体地去启发群众的自觉，指导群众的行动，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

（二）正确领导人民群众的基本方法

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②他又说：“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③毛泽东这些论述，科学地总结了党领导群众的经验，完整地提出和阐明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所谓从群众中来，就是把广大群众在长期实践中所积累的经验，把群众提出的要求和愿望，也就是来自群众各方面的、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分析和综合，化为领导的、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形成符合实际情况的工作指示、方针、政策、计划和办法；所谓到群众中去，就是把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形成的领导的工作指示、方针、政策、计划和办法，再拿回到群众中去，让群众照着去办，化为实际行动，并使之在群众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0页。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和生动体现。从群众中来的过程,也就是“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为理性认识”的过程;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也就是“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的过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无限循环,也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往复无穷。因此,要真正掌握群众路线的方法,并把它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必须认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党的基本的领导方法,其内容和形式是相当丰富的,包含了许多具体的方法。这里,我们仅着重分析毛泽东经常倡导的几种主要方法。

第一,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所谓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就是“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①。这是在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过程中必须采取的方法,是这个过程的组成部分。在实际工作中,根据上级的指示进行一般号召是非常必要的。它不仅体现了上级的全面的统一领导,而且可以使领导的意见、方针、政策迅速直接地与群众见面,为群众所了解,起到广泛地、普遍地动员群众行动起来的作用。但是,一般号召又必须与个别指导相结合。一般的重要性只是在于它对同类事物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它能指导我们对具体的、个别的事物进行科学分析,而不能代替这种分析,我们在研究具体问题时,仍然要从特殊(或个别)的事物开始。这里所说的个别指导,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蹲点”、“抓典型”等,也就是经过试点,摸索经验。

第二,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所谓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就是由从群众斗争中形成的、以该地区或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少数的积极分子组成的领导骨干,与该地区或单位广大群众相结合,通过这些领导骨干的带头、桥梁作用,更好地实现对广大群众的领导。这也是在各项工作中都必须采取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领导者应该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些骨干的作用去提高中间状态的群众,争取落后的群众,从而使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好。群众是基础,领导是关键。不论是从群众中来,还是到群众中去,都离不开领导和群众这两头。没有广大群众的力量,事情就办不好;但是,没有领导骨干的力量,事情也办不好,必须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实行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重要的是要有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的、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形成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0页。

的、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有威信、有能力、敢于负责而又作风正派的领导骨干。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个百人的学校，如果没有一个从教员中、职员中、学生中按照实际形成的（不是勉强凑集的）最积极最正派最机敏的几个人乃至十几个人的领导骨干，这个学校就一定办不好”^①。办学校是如此，做其他工作也是如此。

第三，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方法。所谓民主和集中相结合，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它是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组织保证，是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方法。毛泽东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②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厂。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造出好的成品来。而广大人民群众的活动则是这种加工原料的唯一来源。只有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作历史的考察，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才能制定出适合客观情况和群众真实需要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从而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毛泽东之所以把民主集中制引进认识论，把它看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作为重要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因为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制度，实际上就是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就是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

三、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根本作风和基本领导方法

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③他又说：“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④这就指明了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路线、作风、方法的极端重要性。

（一）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

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各项工作、各种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并且都要经过人民群众去进行。因此，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都要有群众观点。离开了群众路线，党的政治、组织、军事及其他一切工作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路线。我们说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正是因为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根据群众路线的观点和方法制定的，并充分体现了群众路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8～899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8页。

线的基本精神。

党的政治路线是党在一定历史时期为完成一定的政治任务而确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它最大限度地反映和代表了这一历史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制定的,又是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的,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为个人或小集团服务的。只有坚持党的群众观点,经过党的群众路线,才能制定出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治路线,也才能在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下贯彻执行好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治路线。反之,就要在政治上犯脱离群众的错误,使革命遭受损失和失败。

党的组织路线是以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为核心的,它是维护党在组织上、行动上的一致,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的基本保证,是群众路线在党内生活中的具体运用。所谓党内民主集中制,就是党内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是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而不是离开民主的个人专断和离开集中的极端民主化及无政府状态。它反映了党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党的上级与下级组织、党员个人与党的整体、党的中央和各级组织与党员群众的正确关系,因而也就反映了党内的群众路线。

正是由于党把群众路线作为自己的根本路线,运用于指导党的全部工作,制定和执行了党在各个方面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才保证了党的事业的胜利发展。

(二)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作风

我们之所以说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作风,不仅因为党风问题的实质从根本上说,就是党能否代表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并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从而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去进行革命和建设,而且因为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归根结底都体现了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虽然主要是解决党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解决党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问题,但是,无论从坚持这一作风的目的和出发点来说,还是从坚持这一作风的实际过程来说,又都离不开作为党的根本作风的群众路线。我们之所以要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正是为了把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变成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手中百战百胜的武器,是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领导者向群众斗争实践学习,与群众斗争实践结合的过程,离开群众斗争实践,就不会有真正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要经常开展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敢于进行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正是因为我们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

点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①因此，只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脱离群众，才能搞好党的根本作风使党永不变质，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个问题，在党成为执政党的情况下，就显得特别突出和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三）群众路线是党的基本领导方法

群众路线的方法，作为党的基本领导方法，之所以是科学的、正确的，不仅是因为，它是以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为其根本前提的，坚持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根本立场；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的，正确地解决了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领导和群众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实现革命和建设主观和客观相一致、理论和实践相统一、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基本保证。

首先，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决。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是沟通主观和客观的桥梁。人们在实践中认识客观事物，又根据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制定出改造客观世界的计划和方案，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进行检验，并根据实践的结果来改造原来计划和方案中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地方。如此循环往复，一次比一次正确，最后达到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目的。这就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提出的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路线的公式。

其次，实践是群众的实践，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又是认识的主体。人民群众的实践是我们认识的源泉，也是检验我们的认识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任何领导者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等等，只能来自群众的实践，并且转过来为群众的实践服务，经受群众实践的检验，这就又形成了群众—领导—群众这样一个群众路线的公式。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化为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又把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提高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把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论公式，与群众—领导—群众的群众路线的公式密切结合，有机地统一起来，这就使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基本领导方法，成为科学的领导方法。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前进、就胜利；违背党的群众路线，严重脱离群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5页。

众,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要遭受挫折和失败。群众路线的原则、作风和方法,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必须坚持的。

四、群众路线的坚持和发展

建国后的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党中央仍然非常重视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并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及时总结经验,使党对群众路线的认识继续深化。党中央十分注意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情况下脱离群众的危险以及可能给群众造成危害的增强;强调要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的居功自傲情绪,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密切党和人民的关系;强调发扬群众路线传统,认真执行群众路线对于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政策的极端重要性,认为采取群众路线,工作中毛病会比较少一些,错误比较容易纠正些;要求党的领导机关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加强对群众运动的引导。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总结了党处于执政党地位七年来执行群众路线的经验,强调了发扬党的群众路线传统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贯彻群众路线必须采取的一系列具体措施。他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①我们必须同这些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现象进行经常的斗争;必须对党员着重进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教育;必须有系统地改善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方法,使领导工作人员有足够的时间深入群众,研究群众的情况、经验和意见;必须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使下级组织可以及时地、无所顾忌地批评上级机关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使党和国家的各种会议成为充分反映群众意见、开展批评和争论的讲坛;必须加强党和国家的监察工作,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种官僚主义现象,及时处分违法乱纪和其他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分子;必须运用过去整党工作的经验,采取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对党员定期进行工作作风的整顿,特别着重检查群众路线的执行。1957年春,毛泽东在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同时,又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

但是,如同思想路线、思想方法的解决不能一劳永逸一样,党的工作路线、工作方法的解决也不能一劳永逸。1957年夏季以后,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发展和党的民主集中制逐渐遭到破坏,也由于不适当地夸大群众运动的作用,把群众运动当作群众路线的唯一形式,把“大搞群众运动”作为开展各项工作的基本方法,助长了形式主义,因而把一些本来体现群众路线精神的形式和方法变成了违反群众路线的东西,并使党长期以来形成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遭到严重歪曲和破坏,使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蒙受重大损失。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页。

1958年底,党中央开始纠正当时已察觉到的“左”的错误。这时,毛泽东再次强调坚持群众路线的问题。1959年3月,他在一封党内通信中指出: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的意见。通信批评一些单位的领导干部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在庐山会议前期分析“大跃进”的教训时,毛泽东还把群众路线列为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然而不久开展的“反右倾”,打断了纠“左”的进程,毛泽东的这些正确认识也没有坚持下来。1961年,党中央在重提调查研究的时候,再次强调贯彻群众路线问题。这年4月,毛泽东在给邓小平的信中,把“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列为“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之一,并提出“向群众寻求真理”的要求。

1962年初,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联系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经验教训,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述了群众路线。他指出,概括地说,群众路线的基本点就是:第一,信任人民群众,相信他们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相信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第二,党必须根据群众的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党的方针、政策、措施都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指出,群众运动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适应于不同的内容有不同的形式,不能千篇一律。把群众运动当作群众路线的唯一方式,是不正确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决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更不是群众路线。违反群众路线的所谓“群众运动”,不仅不能真正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而且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党的威信。他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认真地讨论一下什么叫做群众路线的问题。一切党员干部,凡是还没有真正懂得党的群众路线的,都应该从头学起”^①。毛泽东在这个会议上的讲话中,也结合民主集中制原则阐述了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党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得到相当的恢复,保证了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然而,党恢复群众路线传统的工作又由于“文化大革命”而中断。“文化大革命”给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所造成的严重损失,是根本背离群众路线精神实质的所谓“群众运动”所导致的恶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党又对群众路线作出了一些新的理论概括,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文件。它在科学地总结党的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经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新鲜经验的基础上,从建立健全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和决策执行程序、坚持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和深入群众、加强廉政建设和党风建设、建立和完善党内外监督制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6页。

度等七个方面,要求全党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该《决定》在党群关系方面所提出的一系列正确观点,是对党的群众路线思想的新概括和新发展。

世纪之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只要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这就把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一)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克服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和领导方法

主观主义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一个主要障碍。历史经验表明,主观主义在领导方法上往往表现为从“左”的方面来的命令主义和从右的方面来的尾巴主义。当党在指导思想犯“左”的错误时,党的方针、政策本身就超越了客观情况和群众的觉悟,违反了群众的意愿,领导者却采取强迫命令的办法,迫使群众接受错误的东西,甚至用惩办主义的办法去推动工作,这就不能不严重脱离群众,犯命令主义的错误;而当党在指导思想上犯右的错误时,党的方针、政策本身就落后于客观情况和群众的觉悟,广大群众迫切需要前进一步,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将这种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结果不能不成为群众的尾巴。即使在党的正确路线领导下,如果我们的同志思想超越或落后于客观实际,超越或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也同样要犯命令主义或尾巴主义的错误。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他们都不懂得领导者与广大群众之间的正确关系,或者在实际上颠倒了这种关系,不懂得应该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和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或者在实际上违反了原则。由于他们不是从群众的客观实际需要出发,而是从个人或少数人的主观愿望出发,超过了或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所以,尽管许多在工作方法上犯主观主义错误的人在主观上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但仍免不了在群众斗争中碰钉子,给党和革命工作造成损失。

(二)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克服官僚主义作风

官僚主义是历史上长时期剥削阶级统治的产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着深刻的影响,也必然会反映到共产党和革命队伍中来。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批评过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中的官僚主义作风。抗日战争时期更进一步提醒我们的党员和干部,不要“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①。建国后,随着党的地位的变化,官僚主义的危险和由此所造成的危害,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都明显地增加了。党曾多次指出这个问题,并同官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由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组织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页。

制度等方面所存在的缺陷,官僚主义已经成为“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①,成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一个主要弊端。官僚主义的特征也是脱离群众,是与群众路线的作风和方法根本对立的。由于犯官僚主义错误的人,不是把自己看成人民的勤务员,不是把人民给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服务,而是用来谋取私利,因而必然脱离群众。所以,只有克服官僚主义,才能使党的群众路线得到真正的贯彻。

(三)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

正常的民主生活是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保证。因为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更好地集中群众的智慧,只有靠集体的政治经验和智慧,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而要发扬民主,就要让人讲话,广开言路,使党和政府的下级组织以至所有的党员和群众,有充分的权利批评上级机关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使党和国家的各种会议,特别是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充分反映群众意见、开展批评的场所;就要在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中实行集体领导的原则,反对一个人说了算的“一言堂”现象,反对把个人置于组织之上的专横跋扈、独断专行的错误做法。同时,必须经常检查群众路线的执行情况,及时纠正各种违反群众路线的不良现象,惩处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违法、违纪分子,从制度上保证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

(四)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要经常对广大党员和干部,尤其是新党员、新干部进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教育

首先,要使广大党员和干部,牢固树立起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基本立场和观点。要使他们懂得,在实行群众路线的方法时,必须首先端正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摆正个人和群众的关系,把坚持群众路线的立场、观点与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结合起来。在努力转变我们的立场、观点和作风中实行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并在实行群众路线领导方法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进一步确立群众路线的立场、观点和作风。其次,要使广大党员和干部,时刻注意关心群众生活,了解群众疾苦,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这是搞好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一条很重要的原则,也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一条宝贵的经验,它也涉及共产党人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和感情问题。每个党员和干部都应该懂得,共产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的,没有任何权利高居于人民群众之上,更无权搞特殊化。关心群众生活,了解群众疾苦,帮助群众克服困难,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是共产党人的美德。如果我们把群众的意见和利益放在一边不闻不问,对群众生活的实际问题漠不关心,那就不能得到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也就不能带领群众前进。再次,要使党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努力掌握群众路线的工作方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页。

法。要使他们认识到,只有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基层,运用典型调查等方法了解、研究群众的情况、经验和意见,才能使领导机关的指示建立在正确的基础上,才能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自觉地坚持群众路线的科学领导方法。

第三节 独立自主

一、独立自主思想的形成

旧中国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国家,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具有许多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早在1919年11月,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向东方的共产主义者提出:“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任务就是这些,它们的解决方法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是找不到的”,“你们应当提出这种任务,并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种任务。”^①这就告诉我们,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产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为指导,走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

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的,又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开始领导中国革命的。从1921年党的建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由于没有自己的领导革命的经验,又对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都懂得不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因而还不可能认识到列宁所指出的“根据自己的经验”确定本国革命的道路这一方向的极端重要性。当时,党主要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经验指导革命,党的领导人已经开始存在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幻想沿用苏联模式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但是,即使在这时,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开始注意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领导各地武装起义的基础上,先后把革命武装力量转移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当时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远离设在大城市的党中央和上级领导机关,更远离共产国际这一当时各国革命的指导中心,在敌人的包围封锁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80页。

下,常常几个月才能与上级党组织通一封信,而且往往指示来到后情况已发生变化,时过境迁,无法执行。在这种极其艰难的环境下,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雄气概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向全党指明了冲破教条主义束缚,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正确方向。他强调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①但是,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阻碍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会议。如果说,遵义会议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正确方向和创造精神,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压制和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被排斥,而未能被全党所认识的话,那么,遵义会议则由于“左”倾错误的被纠正和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而成为党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新起点。

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原则,对共产国际和外国经验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实际上抵制了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这就为独立自主原则的确立、运用和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遵义会议后不久,共产国际“七大”决定改变共产国际的工作方式和领导方法,提出“一般不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的组织事宜”;随后,又明确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认为抗战以来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②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主要靠自己的力量坚持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并凭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创造的有利条件,赢得了这一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一面高唱和平,一面积极准备内战,中国历史发展到革命与反革命力量总决战阶段。这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了一种妥协倾向,用国内共产党和革命力量对资产阶级的妥协,去适应国际上几个大国的妥协。中国共产党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独立自主地制定和执行了正确的方针、政策,顶住了国际上的压力,同貌似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正是由于党坚持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不屈服于国内外各种压力,不依赖外援,而是紧紧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进行斗争,我们才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② 参见《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4页。

赢得了人民解放战争和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二、独立自主的科学涵义及其基本内容

独立自主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部活动中,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逐渐形成的一个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原则,它具有深刻的内涵。

(一) 立足于本国实际,走自己的道路

一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走什么样的道路,关系到这个国家革命和建设的成败,而适合本国情况和特点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来寻找、创造和决定,不能由别国的政党或领导人来代替。早在1871年,马克思在谈到国际工人协会的实质时就已经指出:“协会没有规定政治运动的固定形式,它只要求这些运动朝向一个目标。国际是联合起来的团体的网,它布满整个劳动世界。在世界上的每一地区,我们的任务都从某种特殊的方面体现出来,那里的工人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去完成这一任务。”“用什么方式来达到结局,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国际不会就这个问题下达什么命令,甚至未必提出什么建议。”^①恩格斯也指出:“国际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因而这些国家的存在、它们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②列宁更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政党“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③,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在不同的国家又是不同的。因此,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为指导,自己认识本国的国情,“根据自己的经验”确定本国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历来认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是一个分散落后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极端不平衡的东方大国。这是中国革命和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立足于这个基本出发点,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这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和艰巨任务。毛泽东在坚持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过程中,一直同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外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进行斗争。他指出:“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8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4页。

③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页。

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①这就是说,只有本国的革命政党和人民群众最了解本国的社会历史状况,最有实践经验,因而最有权决定自己走什么样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只有由本国革命政党和人民群众自己寻找、创造和决定的革命道路,才能符合本国的实际情况,才能正确反映本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从而保证本国革命的胜利。当然,探索和决定本国革命的道路,不能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也需要借鉴别国的经验,需要争取其他国家革命政党和人民的可能的帮助。但是,立足点只能是本国的实际。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由于坚持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才找到了适合中国特点的正确道路,从而保证了革命的胜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指示中所没有的,是苏联十月革命没有提供的,完全符合中国革命“自己运动”特点和规律的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②

(二) 着眼于本国力量,依靠本国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

一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不但要由本国的党和人民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而且要依靠本国党和人民自己的力量去进行。党中央从相信和依靠群众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一贯强调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坚持依靠本党和本国人民群众的力量进行革命和建设,因而保证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革命在各个阶段都曾得到各国革命力量的援助,这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依靠中国各族人民自己的力量,经历千辛万苦,战胜许多艰难险阻才取得的。大革命失败后,在极端残酷的白色恐怖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各次起义后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深入农村,发动和依靠广大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使革命走上重新发展的道路。这个时期,由于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封锁和“围剿”,中国革命力量同国际革命力量之间的联系实际上被隔断了,就是国内各块革命根据地之间也很少能有直接的互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30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

相支援,处境异常困难。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反动派的屠杀、“围剿”所征服,没有为革命面临的严重困难所吓倒,他们紧紧依靠自己组织起来的革命力量,依靠由于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人民群众所形成的真正的铜墙铁壁,多次粉碎了敌人的反革命“围剿”,胜利进行了土地革命战争。只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李德在军事上武断专横的错误指挥,才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到失败。这次失败究其原因,重要的一点是没有独立自主地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的结果。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处在历史上灾难最严重的时候,迫切需要国际上的援助,我们也确实得到了许多国家和人民的援助,这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条件。但是,抗日战争的胜利却不是靠外援取得的,而主要是靠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取得的。当时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等待盟国的胜利上。共产党内,王明也把希望寄托于外援。毛泽东反对那种依靠别人过日子的奴才思想,他批评了单纯依赖外援的主张,强调中国抗战应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党之所以能在几乎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渡过了抗战最困难的阶段,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并坚持抗战到胜利,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紧紧依靠群众,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解放战争中,我们之所以能打败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也主要是靠自己组织的力量,靠广大群众的支持才取得的。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被压迫人民争取彻底的解放,首先是依靠自己的斗争,其次才是国际的援助。”^①

三、独立自主是革命和建设必须坚持的原则

邓小平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②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不仅高度准确地概括了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科学内涵,而且指明了这一思想的重要地位。

(一) 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独立自主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之一,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首先,它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原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要求人们,认识任何事物,都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而任何事物其内部又都包含着规定该事物自己发展方向和道路、决定该事物区别于其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39~34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毛泽东认为,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是认识事物的基础。人们的认识总是循着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的规律而不断深化的。中国不同于外国,工农商学兵又各相异。我们要想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把各条战线的事情办好,只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按照各条战线的具体实际,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指导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探索和实践。

其次,它反映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唯物辩证法认为,客观世界中的各种事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形成一个相互制约的统一整体;一切事物不但都是运动、发展和变化的,而且一切事物的运动都是自己的运动,有着自己内在的原因。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普遍联系和自己运动的两个基本原则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并阐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对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来说,国际援助是外因,是个重要条件,但能否充分利用这个条件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则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自己领导的正确和中国人民的自觉努力。离开了自己的力量,革命和建设成功是不可能的。

最后,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如同自然界一样,也是一个自己运动的过程。由于社会自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前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表明:人民群众身上的枷锁,要靠人民自己去砸碎;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要靠人民自己去创造。没有人民群众创造社会财富,没有人民群众变革社会的革命斗争,就没有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党提出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是以坚定地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作为基点的,是把群众作为自己智慧和力量的源泉的,这正是坚持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

(二) 独立自主是实现正确领导的中心环节

毛泽东指出:“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①在这里,毛泽东用非常通俗的语言生动地说明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深刻道理。他告诉我们,任何事情,任何工作,都既要有统一性,又要有独立性,不能只强调一个方面忽视另一个方面,而应当使二者统一起来,得到兼顾。否则,如果片面强调统一性,不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允许有正当的独立性,什么都限制得很死,那就将会失去生机;反之,如果一味闹独立性,根本不要统一性,想怎么办就怎么办,那就将是一片混乱。比如,在统一战线中,各个革命党派和团体,既要有建立在共同利益关系基础上的统一性,又要有保持各自的不损害共同利益的独立性;在处理上、下级关系时,既要有下级服从上级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又要有上级允许下级按照具体情况的独立思考和行动;在处理全局和局部关系上,既要强调服从大局,顾全大局的需要,又要不丢掉局部,兼顾局部的利益;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既要坚持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又要允许地方有正当的独立性,等等。这一切,都生动地体现了统一性与独立性的辩证关系,说明了独立自主原则是实现党对全局领导的中心环节,也是一种正确处理上下级关系的重要方法。学会运用这一科学方法,对于搞好各项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 独立自主是一项基本国策

坚持独立自主,必须坚持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原则,把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统一起来。中国共产党人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统一论者。我们历来把自己的命运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命运,同全世界人民的正义斗争和人类进步事业联系在一起,主张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奋斗;同时,我们又一贯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为祖国的独立、统一和富强而全力以赴地进行斗争。

中国共产党人懂得,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因而十分珍惜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珍惜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深知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自己来掌握的极端重要性,因而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①党历来所坚持的这种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观点,从来就是我们制定外交政策、处理对外关系的理论基础。我们爱护自己的民族利益,也尊重别人的民族利益,我们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同我们履行维护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崇高国际主义义务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认为,无论革命和建设,都没有什么固定模式,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干涉别国党和人民的内部事务,只能使别国的革命或建设遭受挫折和失败,从而损害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的整体利益。同时,无论是搞革命还是搞建设,都有依靠什么力量的问题。坚持自力更生,把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这既是独立自主的一个基本要求,又是坚持独立自主的重要保证。坚持以自力更生为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主,还是单纯依赖外援,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方针,也必然会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从总的方面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中共坚持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但是,也确曾发生过违背这个原则的现象,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党中央提出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发展中内因与外因辩证关系的原理,正确解决了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避免了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片面性。

四、独立自主原则的坚持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贯彻到各方面的工作中,使之又有许多新的发展。当然,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也曾发生过某些偏差和错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纠正了过去由于长期被封锁的客观环境和我们在认识上的偏差所造成的忽视同外国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倾向,克服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严重的闭关自守现象,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对独立自主原则的科学涵义、基本内容作出了完整的概括,阐明了独立自主原则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并第一次把独立自主作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提出来,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放在一起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特别重要的是,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验,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要走自己的路的思想,从而把党对独立自主原则的认识提到一个新高度,这也是对独立自主原则的最好运用和最大发展。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

(一) 坚持独立自主,必须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都需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求得自身的发展。毛泽东指出:“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巨大的。”^②因此,我们应当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这种世界性的相互促进作用,学习别的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和整个人类先进的、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争取一切可能的外援。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争取外援”都不能代替“自力更生”,向别人学习也不能照搬照抄。因为,学习别人的长处,争取外援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增强自己的能力,创造出适合自己需要的,具有自己特点的东西,是为了从根本上巩固、发展和壮大自己,搞好本国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页。

革命和建设。任何依赖外援或者拒绝外援的看法和做法,所以都是错误的,就是因为它们都违背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基本方针和方法,陷入了形而上学的片面性。我们既要反对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曲解为自给自足、闭关自守,认为对外经济联系越少就越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甚至把争取外援引进外资说成“崇洋媚外”的错误观点;又要反对那种迷信外国,以为外国一切都好的错误观点;至于为了追求物质享受,在洋人面前奴颜婢膝、卑躬屈节,丧失民族尊严,损害国家利益的丑恶行为,更是不能容许的。我们一定要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继续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不断扩大我国与世界的联系,以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得到更快的发展。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的辩证关系,也具有普遍的方法论的意义。因为,任何一个地方、部门、单位和个人,要做好任何工作,完成任何任务,都有一个正确处理内因和外因、自己力量和别人帮助的关系问题。

(二) 坚持独立自主,必须正确处理统一性与独立性的关系

统一性与独立性的关系,是事物发展中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原理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正确认识和解决二者的关系,是实现正确领导的一个中心环节。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讲到抗日游击战争的上下级的指挥关系时就指出:“一般的方针集中于上级;具体的行动按照具体情况实施之,下级有独立自主之权。”“越是地区广大,情况复杂,上下级距离很远,这种具体行动就越应加大其独立自主的权限。”^①1956年,毛泽东针对我国经济体制中某些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病,又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他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这个问题在过去一个很长时期不但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相反,有不少做法还与此背道而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纠正了多年存在的“左”倾错误,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经济政策,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搞活了城乡经济。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要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统一的僵化的经济体制模式,以便建立一种新的、中国式的、企业有活力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模式的任务,为我们正确处理统一性和独立性的关系提供了良好范例。党的十四大又根据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的论述,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崭新观点。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正确处理统一性和独立性的关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6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1页。

系,就要严格划清要求正当的自主权与闹独立性的界限;就要正确对待上下之间、左右之间、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够有利于从实际情况出发,发挥各方面的优势,挖掘各方面的潜力,真正贯彻独立自主的方针,把国家、集体、个人的事情办好,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三) 坚持独立自主,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艰苦奋斗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光荣的革命传统,是我们夺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一个重要精神武器。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坚持自力更生,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革命和建设,不能不遇到许多困难,要战胜困难,取得胜利,就要艰苦奋斗。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都必然会遇到艰难曲折。党中央历来提倡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并把它同党的政治路线联系起来,号召党员和人民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以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贯彻和执行。毛泽东认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是不能脱离的。没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曾用“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教育全党,勉励我们既要像愚公那样有操之必胜的信心和毫不动摇的决心,坚信自己的事业一定会胜利,不被“山”一样的困难和敌人所吓倒;又要像愚公那样正确对待困难,艰苦奋斗,苦干实干,“每天挖山不止”,为实现党的政治路线而不停地工作。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种愚公移山精神的鼓舞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终于搬掉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又以这种精神初步改变了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现在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还需要艰苦奋斗,将来富裕起来以后,也还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一定要使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继续保持下去,并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再版后记

《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毛泽东思想概论》于 2001 年 6 月出版后，为全国高等师范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普遍采用，印刷 20 次，并被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引入版权。2008 年初，高等教育出版社文科分社与本书主编商定修订本教材。3 月，经主编与相关院校商定，组成教材修订课题组。4 月，由主编提出修订版编写大纲。随即由各位作者按照分工完成修订编写任务并由各位副主编分别通稿。8 月，由主编最后统定稿。

本书由主编田克勤主持修订，副主编肖贵清、马启民、李彩华协助主编工作。具体分工如下：导论，东北师范大学田克勤教授；第一章，陕西师范大学陈答才教授；第二章，河北师范大学肖贵清教授；第三、四章，东北师范大学孙堂厚教授；第五章，曲阜师范大学李安增教授、牡丹江师范学院董一冰教授；第六章，杭州师范大学牛玉峰教授；第七章，东北师范大学李彩华教授；第八章，陕西师范大学马启民教授；第九章，西南大学吴文华教授；第十章，东北师范大学田克勤教授、黄桂英副教授；全书 PPT 制作，沈阳师范大学王虹教授。

修订过程中，编者力求吸收本教材出版后学术界研究的新成果，特别是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毛泽东诞辰 110 周年时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的精神，并注意考虑高师本科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学特点及《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两门课程分别设置的实际，尽量保持本教材在体例和风格上的特点。

本书在修订过程中，得到了高等教育出版社、东北师范大学和各参编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得到了高等教育出版社文科分社领导特别是周亚权副编审的很多帮助，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刘洪森在教材统稿过程中协助主编做了一些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尽管我们在修订中尽了很大努力，但仍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恳请专家和读者多提宝贵意见。

编者

2008 年 8 月 31 日

2001 年版后记

为适应中共中央关于普通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改革的新要求,适应 21 世纪高师本科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毛泽东思想概论”课教学的需要,我们通过向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申报立项并获得批准,编写了这部《毛泽东思想概论》。本书作为高等师范院校本科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面向 21 世纪课程系列教材之一,为了适应面向 21 世纪人才培养的需要,在体例和风格上突出了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较好地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生教材的特点。与高校各专业使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即公共政治课)《毛泽东思想概论》教材相比较,本书不仅在内容方面有所拓宽,而且力求在内容架构和章节体例安排方面尽量突出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以求达到使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系统掌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和基本理论的目的。第二,在论述的方法上,突出理论内容和逻辑关系的展开,重视理论的阐释,避免了简单的论从史出的旧写法,较好地处理了“史”与“论”、材料与论点的关系。第三,正确处理和把握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与教学体系的关系,体现了高校理论教学的特点和规律。第四,吸收了近几年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成果,并注意运用新出版的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

本书由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田克勤教授任主编,负责全书整体框架的设计和统稿、定稿,肖贵清、马启民任副主编,吴文华、孙堂厚参加了统稿工作。全书由十章组成。各章撰稿人是:第一章:陈答才(陕西师范大学);第二章:肖贵清(河北师范大学);第三、四章:孙堂厚(东北师范大学);第五章:王贵权(天津师范大学);第六章:肖贵清、王新华(燕山大学);第七章:李田贵(河北师范大学);第八章:马启民(陕西师范大学);第九章:吴文华(西南师范大学);第十章:田克勤(东北师范大学)。

本书从选题到出版历经一年多时间,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东北师范大学和燕山大学以及各参编单位的大力支持。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张耀灿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王顺生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阎治才教授审读了书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高等教育出版社王方宪编审和责任编辑胡卫红也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编写一部较高水平的统编教材,是一项要求很高而且又具有较大难度的工作。尽管我们做出了努力,但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学者和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编者

2000 年 12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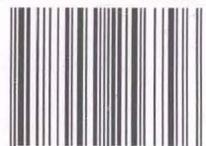
An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高等师范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面向21世纪课程系列教材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第二版）	陈万柏	张耀灿	主编
毛泽东思想概论（第二版）		田克勤	主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田克勤	主编
当代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第二版）*		刘廷忠	主编
法学概论（第二版）	吕鹤云	黄新民	主编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教学新论		刘 强	主编
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		许庆朴等	主编
现代社会学教程（第二版）		张敦福	主编
逻辑学教程（第二版）		何向东	主编
政治经济学*	夏子贵	罗余九	主编
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		姚海明	主编
新编伦理学教程		李春秋	主编
中国哲学教程		郑万耕	主编
新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汪华岳	主编

（带*号为非21世纪课程教材）

ISBN 978-7-04-025679-6



9 787040 256796 >

定价 21.80 元